

青年叢書

本書爲青年叢書之一種。叢書共分四類：（一）青年與性生
活；（二）青年與修養；（三）青年與社會改造；（四）青年
與宗教。每類暫定十二種，共四十八種，預定民國二十三年至
二十五年之三年內出完。欲知叢書內容及其出版日期，或有
意訂購者，請向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青年協會書局函詢。

吳序

一個基督教出版機關，爲什麼要介紹這一本批評宗教的蘇聯的宗教與無神論之研究？這一個問題，恐怕一般的基督教讀者，以至非基督教讀者，都要問的。似乎我們有用幾句話來答覆的必要。

我們相信，宗教是社會上一種動力，同時也可以變成社會上一種阻力；究竟它要趨向到那一方面去，就要看它能夠把握實在，把握真理，到什麼程度。宗教，在它的信仰方面，本來就帶着濃厚的神秘成分。凡是神秘的東西，都是重情感而輕理智的，所以容易流於迷信；同時，這迷信與社會上保守的、反動的勢力，又容易結成不解之緣，因爲保守的勢力所要利用的，是盲目的服從，是不求甚解的信仰。因爲這種種原因，所以宗教容易變成社會上一種阻力。

人類自有史以來，無論何時何地，都有宗教的信仰，這似乎表示人類對宗教普遍的需求；但同時，無論何時何地——除了完全沒有開化的民族，也都有過反對宗教的事實。這一種反對，一方面固然由於反對者對宗教認識的缺乏，但另一方面未必不由於宗教自身所發生的流弊。到了現在，我們居然看見整個國家，以有組織，有系統，有意識的運動來反對一切的宗教，企圖把它們完全消滅。這就是蘇聯自革命以來所發生的一種空前的現象，而也就是本書所要敘述和討論的事實。

一個開明的基督教徒，對於這件事實，應當發生什麼感想，採取什麼態度？我以為第一，他應當承認事實。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是否有迷信的成分？是否有反動的趨向？在蘇聯是怎樣？在別的地方又是怎樣？這些固然都可以有觀察和解釋不同的餘地；但是，事實究竟勝於雄辯，就是在現在，從歷史的眼光，用科學的態度看來，我們已經有了不少可供我們作結論的材料。第二，承認了事實以後，我以為他應當更進一步，問問這些迷信和反動的成分為什麼會發生，要怎樣才能避免。這樣一來，他便不得不對宗教有更清楚的認識，更迫切的追求，去發見宗教的真理，去完成宗教的使命。這一種辦法，一方面是加速了虛偽的宗教的消滅，同時也幫助了真實的宗教的完成。簡單地說，我們要介紹這本書的理由就在於此。

這本書的作者是在俄國生長的，最近的十幾年，也多半在俄國居住。他在美國做過教會的牧師，也做過青年會的幹事，但是他現在對於共產主義，可以說是完全的接受的，雖然我們不能說他是一個純粹的無神論者，因為他覺得，爲他自己，甚至爲社會，宗教還有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從作者的生活背景看來，我們知道他對於基督教和共產主義都有相當的認識，雖然他對基督教不免有誤解的地方；看他在這本書所發表的意見，我們又知道他對於現在共產主義所主張的無神論，也有若干的批評。他以為無神論太過理性化，以爲它現在的力量不在於它對宗教的玄學與信條的批判，而在於它的倫理主張的吸引力。五年計劃的建設，世界革命的完成，以至因它們而起的奮鬥與犧牲——這些，照他看，都是有效的宗教的替代品。然而他以為這還是不夠的。人在生活鬥爭的途程裏容易受到創傷，在

若干的人，生活甚至是一種重擔。在情感的生活上，他們都需要鼓舞與慰安。作者以為現在蘇聯若干文化上的設施，像劇場，美術展覽，音樂會，等等對於這些要求都能够部分地滿足。他覺得這些設施慢慢的可以把舊的宗教完全取而代之，另外造成一種在內容和形式都更高超的信仰與生活的方法。到那時——也許是幾個世紀以後——以前的所謂宗教，便要變成歷史的陳跡。到那時，人們的精神生活，將要放出一種異樣的光輝，因為，從共產主義所產生的沒有階級的社會是精神文化最膏腴的土壤；在那裏，不但新的寶藏——從前的先知，聖者，詩人們所沒有夢想到的——都要被發掘出來，就是若干久已被忘却的寶貴的精神遺產——像耶穌對所留給我們的——也將被重新發見。這就是作者對未來的世代的一個測算。

對作者這樣的一個結論，我們願意表示以下幾種意見：

第一——我們以為歷來造成反對宗教的原因，從大體上說，只有兩個：（一）凡是進步的宗教都包含着高超的理想，這理想自然要向現實挑戰，同時也自然不見容於現實。（二）照我們起頭所說的，宗教因為神秘和迷信的成分，容易被反動的勢力所利用，因而與一般民衆的利益站在對立的地位。我們以為蘇聯反對宗教現象的產生，由於第二個原因的甚多，由於第一個原因的甚少。這是本書所表彰出來的事實，是我們所不得不承認的。然而我們知道，就是帝俄時代的宗教，也未嘗沒有它若干的好處。因為它曾有過不少忠實的信衆，他們雖然受着思想上和社會條件的限制，還能在局部的生活裏表現基督教真正的神。這一種事實，我們希望將來能有人給它一個公正的敘述。還有，現在有些人以為共產主義的所以反

對宗教，是完全由於舊俄時代宗教的罪惡，這也是一個錯誤的見解，因為馬克思反對宗教的主張，是從他的一般的哲學和歷史觀的立場產生的，就是他有若干實地的觀察，他所見到的，也差不多完全是西歐的情形，因為他始終沒有到過俄國。

第二——我們以為宗教的本質，在於事實而不在於虛名。我們曾經說過：「有了宗教的名義的人，未必便有宗教的實質；有了宗教的實質的人，未必都有宗教的名義」（社會福音第一章）所以我們對蘇聯的反教運動，不得不下這樣的一個結論：蘇聯現在的宗教的被逼害，大半是食它已往的迷信和反動之賜；不但蘇聯如此，我們對於別的地方所發生的情形也可以加以同樣的解釋。這就是說，宗教的名義，不一定代表宗教的實質。再從另一方面說：蘇聯現在反對宗教的人，就他們的反對迷信，反對腐惡的社會這一點來說，從我們的眼光看來，就是代表一種宗教的精神——無論他們自己對於這種解釋，是怎樣的反對。

第三——我們認為宗教是人類永恆的需要，因為宗教無非是對於整個的人生和整個的宇宙所不得不有的一種態度，一種信仰，一種生活的方法。所以，我們以為宗教是永遠不會消滅的。但這只是宗教的實質。至於宗教的名義，宗教的意識形態，宗教的表現方法等等，這些都可以隨時改變，甚至可以取得一種與一般人所承認的宗教相反的形式。我們絕不為宗教的名義抱杞人之憂；反之，我們要努力使宗教從迷信與反動的勢力中得到解放，即使解放的結果，似乎消滅了我們所寶貴的若干傳統的名義上的遺產。因此，同本書的作者一樣，我們十分同情於社會革命的運動和這種運動所反對的虛偽的宗教，一方面因為

這本來是宗教自身的一種使命，另一方面，因為社會革命的目的在解放物質條件對人生的束縛，而這一種解放同時也幫助宗教從它現在的迷信和反動解放出來。

第四——我們在上面所取的態度，可以說是極寬容而唯實的，然而我們並不否認，所謂無神論者的主張和宗教論者的主張，除了不相干的成分以外，實在有不少基本不同的地方。據我個人意見，基本不同的地方至少有兩點：一是對於信仰對象的看法，那就是有神論和無神論的分別；一是對個人的價值和與此相連的武力與非武力，自由與強制諸問題的看法。有神論和無神論的爭辯，大半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然而，我們並不像一般人一樣，以為有神論就是唯心論，以為無神論就是唯物論。現在若干的有神論者也同樣的反對唯心論，甚至完全接受以唯物論作基礎的共產主義，因為現在的新唯物論已經不像舊唯物論的絕對與宗教不相容——至少從哲學的立場上說。關於個人價值的問題，這是多數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一種重要的看法，這顯然與共產主義所主張的某些方法發生劇烈的衝突——無論在事實上宗教信徒是怎樣違反了這一個重要的教訓。以上兩個問題是息息相關的，也是深刻地影響到許多其他的問題上去的。關於這兩個不同之點，我們都不能在這裏討論。我們只希望雙方對於這些問題多有一點深刻的研究，這樣，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在這一部門的思想裏，可以增加了我們能夠共同接受的真理。

末了，我們對於本書若干的細節，自然也有不能同意的地方，不過因為它們沒有影響到我們對此書

整個的態度，所以就不在這裏討論，留給讀者去作他自己的評判。

吳耀宗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

原序

在蘇聯，就各方面來說——地理，種族，文化，——都是東西交匯的地方，可是當二者相互見面的時候，却沒有綜合的現象。反之，東方的舊俄羅斯的出世理想，那種神秘的，禁慾的，和否認生命的東西，却和西方的，新俄羅斯的，把握生命的，熱情的，理智的，馬克斯主義的，以及強毅的東西互相死鬥。是不是後者將消滅前者，大獲全勝呢？抑或將由這場爭鬥露出一種更高層的，綜合的文化，其中富有力量，思想和美呢？關於這問題的研究，就希望對於它們有所闡發。

宗教在共產主義之下的命運，是許多誠懇用思想的人們所非常關心的。我個人就老是覺得這問題極有興趣，常從各方面去研究它，已經有十五年之久。在本書裏受篇幅的限制，我只得單講在蘇聯的宗教與共產主義。關於這問題，西方的思想家們的見地，也很能令人有所心得。無論如何，蘇聯是現在唯一的國家，在那兒實際的大規模的破壞宗教，以便清出地盤來，讓給那正在發展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

這本書所要講的，就是宗教思想，宗教組織，與激烈的無神論思想及共產黨組織之間的鬥爭情形。在以前一本書，蘇維埃制度下的宗教（一九二七年美國出版）裏面，我把那時候在蘇聯的宗教的現狀寫了出來。寫那本書的時候，有組織的戰鬥的無神論在共產黨的保育之下正在初成。從那時候以來，

它已經變成了一種擴大的運動，到現在也許發展到了極峯了；所以，本書所要注意的，還是那些以俄國人民的宗教史作背景的反宗教勢力。

願意繼續研究這問題，而又有閱讀俄文的能力的人們，可以在我那本蘇維埃制度下的宗教裏找到一個精選的圖書目錄，而在尼可斯基教授 (Professor N. M. Nikol'sky) 最近寫的俄羅斯教會史 (一九三一年) 中，還可得一個比較多的圖書目錄。關於最近幾年間的反教情形，最好去讀俄國一種月刊，名反宗教 (Antireligioznik)，那是一九二六在莫斯科發行的。要研究共產主義和宗教，必須懂得共產主義的哲學理論，作一種哲學基礎。這在我的莫斯科對話中就可取得，因為那是關於赤色哲學之一批討論。

在本書裏，我是懇切地把這問題盡力用客觀態度來對付，但也不掩飾我自己的信仰。我這信仰不但是理論研究的結果，我在蘇聯與它的宗教和共產主義有多年的直接接觸，以及我的意識經過長期痛苦的適應，也是這信仰的來源。

黑克 一九三三年二月於莫斯科

目次

目次	次
吳序	一
原序	一
第一章 問題的說明	一
第二章 人民的宗教	一三
第三章 教會與國家	三五
第四章 俄羅斯的反國教派	五三
第五章 反宗教傳統的起源	七三
第六章 宗教與革命運動	一〇一
第七章 知識分子的尋求上帝及托爾斯泰的宗教無政府主義	一二五
第八章 共產主義的宗教觀	一三五
第九章 教會和革命的衝突	一四五
第十章 反宗教運動	一六五
第十一章 集體化及無神論宣傳	一七九

第十二章	反宗教宣傳的組織與方法	一八七
第十三章	前途的瞻望	二〇一

第一章 問題的說明

文明人類用得着宗教麼？有思想的人們越來越愛這樣問，而答覆却有許多不同。神秘家們和代表有組織的宗教的人們都無條件的說有。別的人是有條件的承認，即如蕭伯納那種堅定的理性主義者們，一方否認一切有組織的宗教，另一方面都主張一種無定形的宗教就是『生命力』。別的如孔德派和近代人文主義者們，都把人道建立在神壇上，主張無上帝的宗教，換句話說，就如古典派的雅典人似的，有他們的神壇，獻給有知的不可知的上帝。在西方文明中，自由知識分子們裏頭只有少數真正堅定的無神論者；唯一的只有共產主義運動主張澈底的絕對的反對一切宗教，不管是正統教派，人文派，或哲學派。

所以我們的問題第一要看共產主義運動之所以取這種不妥協立場有些什麼理由；其次我們要以近代社會科學與哲學的眼光來考察共產黨的理由是否有錯誤的地方，並且再看反對宗教的共產黨，它對於宗教的觀念如何，同時也看那些承認宗教的人們所取的另一種解釋如何，其中是否有什麼誤解。這需要名詞上的統一。

宗教究竟是什麼？既成的定義不下幾十個，而差不多凡對於這問題下考究的思想家們，也有他們新作的定義出來。有些定義很够真確的了，但也不過修辭學上的詞句，另外一些，也不過因為他們的作者認

爲那一點最要緊，就注重在那一點上。

試看德國古典派唯心論的哲學家，如康德也就認宗教是意志的一種正當的態度，由於相信道德制度的道德性和最高權威而發生的。席乃馬赫 (Schleiermacher) 則反對康德那道德論的宗教觀，他以爲宗教起源於虔敬；這虔敬他解爲是一種倚賴的情緒，一種和絕對的最終的真實直接發生的關係。黑格爾與康德和席乃馬赫都不同，他推崇宗教之智的方面，以爲那就是永遠的真理。所以，無論是意志或感情或理智，都會被德國唯心派的古典作家們當作宗教看待。

由哲學家轉而來研究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我們看出他們認爲宗教純是種社會產物。例如杜克罕 (Durkheim) 就認爲社會集團的權威，乃是宗教的來源，所謂神聖的就是由社會承認的。別的社會學家如吉德 (Benjamin Kidd) 認爲宗教是對於個人的社會行爲一種極度理性的承認；吉丁斯 (Franklin H. Giddings) 下宗教的定義是「相信生命的可能性」；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說：「就宗教最好的地方來看，它是生活意志的昇華與評判。」另一位社會學家愛渥德 (Charles A. Ellwood) 把宗教和整個的人性與人的社會生活聯合在一起。在他看來，宗教是一種多方面的現象。簡短的說來，愛渥德接受了巴爾吞 (Barth) 的公式，就是說：「以宇宙作爲一種社會的倫理的力量，宗教就是人對於這種力的態度。」別個今代學者也有同樣的定義。所以克爾德 (Caird) 說：「一個人對於事物的整個意識之總的意義和大旨，就是他之所謂宇宙，而他對於這宇宙的最終態度，表現出來就是他的宗教。」這些定義如果拿來與

人類在史的過程中所經驗的宗教比較比較，要不是太寬不着邊際，就是太狹隘了。俄曼教授（Professor John Oman）和容澈（Runes）的意見一樣，以為宗教所包含的方面非常多，使人簡直不能給它下一個八方週全的定義，這是對的。所以他情願把一種宗教意識作為宗教域裏的指南：『如果我們有宗教趣味和宗教意識，我們就知道什麼是屬於宗教的，什麼不是。』這種見地使宗教倚賴於主觀的標準，其價值的權衡常常改變。在某一人看來全是迷信，或竟是病態心理的幻象，或是潛意識的與昇華了的性衝動，而在另外一個看來，就成了有永存價值的宗教實質。

司彭格勒（Oswald Spengler）以為宗教乃是人類之文化發展的一階段。他給宗教下一個定義，說它是人類的覺悟，在這覺悟的時候，人統治了他自己，又否認了毀滅了他自己的存在。那就是說，當那時候，他克服他的獸性意識。因此恐懼和愛成了宗教的兩種基本情緒。宗教就是人的解放要求，要從意識的磨折和憂勞中解放出來，要從緊張的思慮和默想中得到弛緩，這種思慮乃是由恐懼產生的，同時也消滅那種孤獨的意識，不要以為在宇宙中自己的自我乃是孤獨無偶。自然是有條件的，有生，有老，有死，而宗教正是要逃脫這種限制。宗教使人懂得這種恐懼的原由，因而能勝過它。於此，理論批判家成了預言者，『技術家』成了祭師，發明家成了先知。在一切宗教的根底，都有種非意識的衝動，一種內在的呼求，要使自己的一件全與自己不類的，即所謂宇宙的東西相調和。這種與別者調和融洽的方式，免不了漸漸形成為教派和崇拜，司彭格勒稱此為『技術家』的作用。許多近代的定義都忽略崇拜這一點，但無論如何，它是不可

丟在一邊的。以我們看來，它是一切宗教的主要點，沒有它，就沒有宗教。

最後，於是人們努力把剛才提到過的主觀經驗和社會經驗加以理性的說明。這是有組織的宗教發展到某一時期所不可避免的現象，它預備下了神學的基礎。由此我們看來，宗教是情感、理智和意志的共同產物。它有主觀的經驗，也有客觀的根據；有智的構成，也有社會的實用。其所以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定義，自然是因為宗教經驗甚微妙，又是多方面的緣故。以它所生的效果而論，有的人說宗教就是無條件的對傳統習俗屈服，有的人則把它當作躲避艱苦醜惡的現實生活的工具，在第三人，它也許是鼓起人來行動的東西，在第四個它又是種麻醉劑，麻木人的理智作用，刺起他的想像活動，這個人要說宗教是統治別人的力量，那一個又說它使人有一種神祕的默想，美的欣賞，滿足人對於宇宙的好奇心等等。

近年來研究宗教的心理起源的人們，又在努力以直觀的非理性的方法來發現上帝的所在，他們認為宗教與理性觀念全不相干。

研究宗教之非理性的起源那一派中，嚴正的學者如阿陀教授 (Rudolph Otto of Marburg) 即神聖 (Das Heilige) 與感情超世俗 (Das Gefühl des Überweltlichen) 的作者，是應該提出來的。阿陀有種假設理論，認為人類秉賦了一種虔畏 (Sensus Numinis) 的感覺，這種內在的特性，表現出來成爲一種思慕，對於『非現世的』、『神聖的』、『神的』與人的本性『全不相同的』。(用阿陀所最喜歡用的詞句，如 das ganz andere) 某種東西都有一種思慕之情。所以阿陀的理論就是『宗教起源於它本身』。這並不

是說，人從一起頭的時候就存了一個現成的宗教，意思只是說，他秉賦了一種基本原素，這原素是凡宗教，由最原始的到最高的，都有的。這就是所謂虔畏的感覺。當這感覺創造出神異的存在的時候，就產生了上帝的觀念。上帝是一種動人虔畏的存在，他有種無抵抗的吸引力，引人向他，同時人對他的反應乃是一種懺恐的畏懼和忘我的愛。阿陀又廣汎的研究東方宗教和各種各樣的基督教神秘主義，對於這種虔畏感覺，他發現了不少的真憑實據。因為他的理論對於共產黨學者們的無神論立場是一種嚴重的挑戰，於是我們要看那一方面對於這種挑戰作何答覆。

人類諸本質如理性，論理估價，宗教與美術的欣賞，都有種先人類的基礎，這是很容易指出來的。無論他的特長在那方面，凡深刻的學者都不會否認人類的共同祖先是一種類人猿。如果我們承認人類有這種虔畏的感覺，我們竟可稱之為宗教本能，那麼，天然我們要問它的動物基礎是什麼。僅僅說它是人性中一種先天的本質是不够的。人類是動物類的延續，但他自有一種質地不能完全變為獸類。這不能完全變為獸性的質地，就是他的理性，他的倫理，美與宗教的感覺。人類理性雖不能全變為獸類理性，但若不了解獸類的腦經，就不能了解它。所以先有獸類理性，才有人類理性，不過在人類，這理性是高一層的。什麼東西使之升高？是什麼把這延續性打斷，使人類性質發生實變呢？共產主義者說這就是辯證法中由量到質的轉變，較大的人類腦經有一種新質，是獸類腦經所沒有的。有機物的高級組織天然就有那種反應。這就是自然的法則。假如人類智慧是獸類之高一級的突變和產物，那麼以我們看來，所謂虔畏的感覺，同樣也

是一種獸類特性的產物。阿陀以爲原始的虔畏的感覺，乃是由於虔畏和恐懼所生的情緒的發呆。這是種常見的獸類特性。鳥驟見蛇就發呆，連飛走都不會。自然現象的震恐，在獸類所發生的作用，和在人類是大抵相同的。我承認人類的虔畏與獸類的恐懼不同，它有種新的質素，正如人類中一切別的獸性本能，在具有新的質素一般。獸類在意外與震恐之前所表現的發呆的懼怕，在人類就成了宗教的種子，即是虔畏。這和康德的道德之感的學說，正是很相當的類比。他以為道德之感，或絕對的命令，在獸性時期是一種『社會性本能』，到了人性時期就是種有意識的社會責任心，即絕對的命令。在獸性時期，虔畏的感覺是一種『發呆的恐懼』，到了人性時期，它就成了一種對這類恐懼之有意識的欣悅，以及對於它的神異的存在 (Wunderwesen) 的沉思。這種解釋，使一切論虔畏之感，是種先驗經驗的說法，都成爲不必要，同時也並不因爲它的獸性祖先而縮小了宗教之感，道德之感，或人類智慧的意義。一切的人類心理特質，都是種新的東西，但這些新東西只能由某種生物的或羣性動物的基礎上才能發生。它們一方面是延續，一方面又是新的產品。對於那些以辯證法來解釋進化的人，這些突變絲毫沒有什麼奇怪。它是一種自然法則。

共產主義的理論一方面承認宗教的多面性和主觀因素，另一方面它都把這問題簡單化，只是暴露它的客觀基礎，把這基礎歸之於社會經濟諸條件。他們相信只要改過這些客觀條件，主觀的經驗就會發生重大變化，把宗教完全丟掉。

對於近代文明需要宗教與否這問題，共產主義者的答覆是要，不過所提文明只就將死的資本主義

文明來說。在那種場合，在危機的壓迫之下，在不安定與恐懼的霧圍中，對於那些被歷史判定了要趨於滅亡的諸階級，宗教就是他們的避亂所。同時對於某些小資產階級分子，與那些還未取得階級意識的落後勞苦大眾，它也是必要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不安定，恐懼，與個人的孤獨性同時消滅，宗教，至少是目前所知的宗教，一定也會消滅。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們，在無神論的引領之下，要走向有目的的生活去。

反之，尼布爾對於宗教在近代文明下的命運這問題，作了有力的研究。他相信資產階級的社會雖呈了死亡的情狀，可是還有反老還童的日子。機械文明以近代科學作支柱，使宇宙表現為一個非人性的東西，這種文明對於人類人格之完整性有極重大的影響。在這種宇宙裏，人類精神似乎『縮成了某些勢力的蒸騰，僅不過比那些力更能持久而已。』機器之殘毀宇宙的人格性，殘毀文明的人格性，正是那種妨礙人格，而且洶洶然要毀滅它的力量。在尼布爾人格『乃是一種有自我意識，有自我決斷的現實。』他以為這種現實要能健壯有效，除非能處在有創造自由的宇宙裏，在那兒不但個人的創造自由，連宇宙的創造自由都要能發展綿延才行。這種抱怨，表示一種機械文明和機械化宇宙的反抗。

按照這種說法，如若宗教要延長下去，它必需造出一種新的玄學來適應人格所需的這種要求。這是問題的一方面，此外，還有另一方面。近代宗教的真正悲劇，『在於許多人不信宗教，就因為宗教不能使文明成為道德的東西，而不在于它不能維持它在知識方面的體面。』依階級社會的邏輯，有組織的宗教已被垂死的統治階級所統制，替它服勞，但社會化民生主義的道德要求，對這種階級却無所希冀和求告。首

先，產業工人大衆已經遠離了教堂，對於宗教漠然無所關心。有什麼東西能維繫他們麼？尼布爾的答覆是能。他說：『不實在的永遠變爲實在，非真實的永遠變爲真實，對於這種情形的疑問和探求，使人不可救藥的變爲信宗教的。』這就是探求人性中所包含的一種理想。一切有機物都求取得一種道德的目的和倫理的自由，以達到自己的完全。這使人能超乎目前的衝突，以宗教希望的支持，防止失望。由於要求完全和自由，宗教才得產生；但因現世界不能給人自由和完全，於是人乃變得『出世』起來，於非實在的神秘境地謀取酬報。

對於這位思想家的開明意見，共產主義者的答覆如何？我們相信他會說：尼布爾所發現的兩點，資產階級社會主要的害處，共產主義哲學正要把它們掃除。第一，由於使個人從屬於機器，因而殘毀了文明的人格性。對於這一點，共產主義制度要使機器變成奴僕，而不是主人，由機器的幫助，人不致於要倚附於自然，同時也可以克服有階級的社會，因為無階級的社會是獲取真正自由的唯一條件。其次共產主義的辯證法已經勝過了機械論玄學，賦予宇宙一種法則，這法則使宇宙的必然發生意義，使自由支配的有目的的生活成爲可能。在共產主義無階級的社會，人不需要逃入別的神秘社會去，因為人可在現世界中自由的過度一種完滿的生活。這生活的本身已足剷去宗教的立足點，使它自己死去。對於我們的問題，共產主義者說無階級的共產主義文明不會有宗教，但它自有一種精神文化和一種完整的人生哲學。

研究共產主義無神論的人不但震驚於這種精透的理論，而共產主義無神論所用的戰鬥的策略和

它那週備的機關也足動人，以那機關，他們能系統地進行工作，來毀壞一切既存的宗教機關，來剷除它的一切踪跡。自有人類歷史，不見過有這種先例的了。在蘇聯目前宗教的生活力已是受着極大的試驗，它也許已經顯出了新力量。那是我們現在還未顯出來的，但是那些產生出俄國人民的宗教史的表面努力，已是衰竭了，共產主義正在那兒給正統派宗教開掘墳洞。在過去十五年中，俄國教堂已經封閉了，毀壞了一半，或作了別的用處。這辦法現在還在進行，不過慢一些罷了。不過看情形似乎在下時代，目前有組織的宗教都要滅亡的。

要完全了解這一過程，我們必須以俄國的歷史背景來研究它的宗教悲劇。在這本書的頭幾章，我們將略述千年來俄國基督教的發展經過，由發軔到現在為止指出人民如何的信仰它和它的社會意義。

俄國歷史上國家與教會的關係值得特別注意，因為教會目前的情形，大部分都是由於這種非神聖的聯合所產生的。同時它又產生了非國教運動，這種運動的傳教形式至今還可以，到某程度為止，與共產主義宣傳相競爭。因為在目前，至少佈道的基督教比正統教會更有綿延下去的機會，理由下文再講。

除了佈道派的大眾運動和民間的通俗宗教之外，還有些舊知識分子的殘餘，他們拚死努力要在近代科學與機械文明的侵入之中，謀得他們那種宗教要求的地位。既不能和這些抵抗，他們就逃入一種默示錄式的神秘主義之中，要不然就像托爾斯泰一樣，絕對的完全拒絕近代文明，跑回到一種原始的，前資本主義的農村生活中去。這種知識分子，人稱爲『上帝奮鬥者與上帝尋求者』，他們的勢力在蘇聯差不

多完全沒有。而在西歐和美國的俄國僑民中却非常之大。

一方面注意於宗教思想和它的傳統，同時我們也要略述俄國反宗教的淵源。這淵源起於十八世紀，而發展成共產主義的反宗教運動。教會與革命的衝突也是好長久的歷史。這種衝突為時約一百餘年，產生了無產階級革命和教會之間的深仇死恨。

在講到反宗教運動的諸章裏面，我們將論到這一廣大運動所使用的方法和組織，指出目前在蘇聯戰鬥的無神論和宗教之間的爭鬥。本意並不是要模糊這一點，而是要把現狀暴露出來，指出它對於一切教會之可悲的影響，不但對在蘇聯的教會，全世界凡共產主義的宣傳和組織所到之處的教會也是如此。在研究中，本書將注意無神論者國際。它的任務是組織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自由思想者與無神論者，不但對有組織的基督教，凡一切宗教都有戰鬥的無神論來對付。在無神論的中心地點，如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別的大城市，都有專門家來研究方法，以與猶太教、回教、佛教、沙門教（Jainism）以及東方各種大的宗教鬥爭。

論共產主義的人們，往往有種傾向忽略宗教方面，要不，就當作是種誤解，以為共產主義反對有組織的宗教，只是反對宗教的壞處，而不反對純正的宗教本身，這是大錯而特錯了。共產主義，特別是列寧主義，老是注重在改良的，近代化的，社會化的，以及一切別種進步的宗教，以為它們比正統派反動的宗教更不好。事實上，共產主義對於反動的宗教，要比對近代化的理論更進步的宗教寬大得多。列寧努力和黨中一

切宗教的痕跡鬥爭，把它們剷除，且盡力防止任何新的，社會化的，近代化的宗教出現。

共產主義對於宗教之不容情使批評家得一個結論，說共產主義的本身就是宗教。他們的理由是這樣：共產主義者認為只有自己所知的才是真理，這種絕不容情，正是任何新宗教的第一種確實的性質。共產主義的目的，與基督教的最高目的並無不同之處。共產主義理論首先要相信良善，自由，合乎倫理的生活是可能的事實，同時他們又相信將來的希望就在於一般平民身上。這後一點，由科學的見地看來，是全靠不住的。共產主義在信徒之中鼓起一種信仰，使他們具有一種傳教徒式的熱誠以身殉道，像這種情形，只有宗教史上才有個先例。最後，共產主義對於前途的展望，是有所默示的，它所希望的目的，只有在與階級敵人作一場決死鬥爭之後才能有，這是與默示錄的世界末日的大戰一樣。

這種比較，共產主義者認為不對。他們果是樂觀的信仰平民的力量，不但不否認，反之，它是共產主義進行工作的理論根據，他們常常依經驗所得加以修正，由試驗工作推而至於特殊的心理學實驗室。但是共產主義者自己却反對稱他的信條與運動為宗教。他不反對稱那是種意識，在科學的事實上建立起來的，他使用實驗科學來幫助他的工作，是一切別的社會運動所趕不上的。不過有一點它公然承認，在這一點，共產黨教義也類似宗教教義。它是公開的有黨派性，它接納無產階級的偏見，而拒絕一切所謂客觀的，非人性的，或超階級的科學與哲學。

共產主義大不喜歡宗教的名詞。為這原故，他們頗吃一種反對討厭的名詞的偏見的虧。這自然是人

之常情，大部分人的共同毛病。在研究中，我們不以共產主義作宗教看，不管是就名詞來說或由心理比較去類推。那樣作，不但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且混亂了論點。自然共產黨也是人，不管兩種敵對的哲學在意見和論理上是多麼不同，可是在他們底下總有共同的人性作根基，在這根基上我們可時常彼此相見和了解。

第二章 人民的宗教

從前帝俄時代，俄國廣大民衆，連烏克蘭人，喬治亞人，以及別的弱小民族都在內，所信的宗教，乃是那所謂的『神聖正統教會』（Holy Orthodox Church）或『希臘正統教會』傳授給他們的；其名是正統派基督教。當基督教教會的東西兩支互爭雄長，差不多要決裂時，這一派乃由比善庭姆（Byzantium）傳入俄國。東西兩教會在一〇五四年正式分裂。比善庭姆的皇帝被回教徒所侵，又被野蠻民族不斷的騷擾，乃要使野蠻民族基督教化，借以取得他們的擁護。於是在第一世紀的中葉，巴爾幹的人民都基督教化，此外在南俄，特別是在浪遊的武士們中，也有些基督徒團體。

俄人正式受洗的年代是九八八年。這是當時的統治者，伏拉底米（Vladimir of Kiev）親王吩咐舉行的一種羣衆儀式。這人之所以領起人民來作這宗教的改進，一部分因為他自己傾向於基督教禮拜儀式，但是大部分還是為的政治作用，想要和比善庭姆皇帝關係弄密切一點，因為他和皇帝的妹妹結婚。此外因為他的軍隊中有好些兵士是基督徒，他也想得他們的擁護。娥嘉王妃（Princess Olga of Kiev）於九五五年信了教，也勸伏拉底米作基督徒。不久她被勅封為聖尊，為俄國基督教中第一位聖人。

俄國正統教的特點之一，就在於它和國家的密切關係受皇帝的卵翼，從最初已是如此。這一點是它

與羅馬教會不同之處。在那兒，教會對國家有相對的獨立性，並且老是想管住國王和皇帝，而不是被他們管轄。俄國教會的第二特點在於它那時（十世紀）所採取的基督教，乃是一種將死亡的國家的宗教，這國家很快就喪失了比善廷姆帝國的光榮國風。因此伏拉底米由那兒所弄來的基督教，已經是完全定型了的正統教，失掉它那使徒時代的熱烈與青春氣了。以這樣的宗教，被一個專制國王栽埋在人民頭上，它簡直就是接在一種既存的野教上面而已。這種野教的踪跡至今還在宗教禮拜和平民習俗中看得出來。

異教的存迹

奉異教的斯拉夫人，其宗教并不很高深。他們崇拜白龍（Polevo）雷神的名字，以及許多別的自然之神。他們也敬拜死人，敬拜祖宗，還有一種先動物性的崇拜，凡神秘的引人敬怕的東西都受敬奉。俄羅斯民歌裏有圖騰主義的遺迹。通常他們都認為動物是很講交情很有幫助的，很溫柔的，稱之為『狼乾媽』『狐乾媽』『熊沙皇』諸如此類。馬老是被當為能力的象徵，因為從前牠的主人都是武士和親王之類。雄山羊特別受大眾歡迎，認為牠可以駭跑惡鬼，幫助穀類生長。他們把最後收來的稻穗瓣在牠的鬍子上，又把新烤得的麵包供奉在牠面前。在俄國有些地方，到如今鄉下青年們還穿起山羊皮，帶着雄山羊當吉神，在田間走來走去的唱：『山羊所過，百穀齊生。』

這種基督教化的野教頗有力量，都由於它的古久性，由於那種奇怪的美；此外，也由於它雖然自誇為

正統派，但它並不沾染那種空想，那種清教徒式的道德和個人主義。舊斯拉夫的異教與比善庭姆基督教混合，其後變為俄國正統教會。它含有許多粗糙的神人同形說，和宗教的唯物主義。不過這很適於那種封建社會的人們所經營的原始經濟和社會生活。他們仍然崇拜灶神，日神，樹林裏和水中的神們，他們用魔術和念咒來抵抗病症，『壞運氣』，『鬼眼』，旱災，水災，以及別的自然勢力，凡原始人們覺得自己無力抵抗的都歸此類。甚至於像『求上帝的恩典』這樣不可捉摸的話，都有很多的物質意義；到如今沙馬拉（Samara）的農民常請牧師來家作禱告的時候，要把窗戶煙筒全關閉起來，把牆上的裂縫都塗上。這樣小心，為的盡量保險，不使禱告中的恩惠從任何可能的地方溜出去。

為的滿足這些原始要求，牧師們和從前的魔術和藥師的行爲一般無二。由於受了聖職，他就被賦予了賜恩的能力。他穿着和尚的道袍，帶着十字架和聖像，擦了神聖的香膏和聖水。這一切東西，也使他有了賜恩的能力，只要他引用適當的『字眼』和『記號』，那麼，這權力就能拿人們所切要的保護與解救給他們。牧師作為一個人的人格，智慧和道德都與恩賜之有效與否不相干，只要禮節是按舊規矩行出來，行禮的價值又不太貴，教民們就大大心滿意足了。

一直到十八世紀，鄉村牧師多半照規矩不認識字。在授職之前，他們把作禮拜要用的字都背熟。然後把它們背出來，一點不懂那些字有什麼意思。對於這種羣衆的半異教，名人如神聖會議（Holy Synod）的大檢察長，俄國正統教的權威，蒲比葉多羅切夫（Pobjedonostzer）都不能否認。他統治了教會與國家

差不多六七十年，死在一九〇七。他說：「我們的牧師們所教很少，也不常教。對於不識字的人們，聖經簡直就和沒有一樣。在……遙遠的村子裏，人民絕對不懂作禮拜時所作禱告的意義，甚至於主禱文都不懂，念起來時常常弄錯，把意思全失了。可是在這些原始的腦經裏，正如在古雅典人一樣，已經建立了一個上帝的帝壇，他們把生命交給天命支配，認為是極自然的事。」

原始的斯拉夫人崇拜死者的習慣完全存在，與基督教禮拜相合。原始的靈魂觀念是非常之粗糙的。物質觀念，認為它像個蜜蜂，或小鼠，或蝴蝶，或小鳥。這東西躲在頸與胸部之間的小巢裏。人睡了或死去，這小小靈魂動物就離了他。不過睡時是暫時離開，死則是永久的。在基督教的影響之下，靈魂由小動物變為一種抓不着的東西，但却是種實體，所以必需要加以照顧。

在有些落後的地方，如白俄羅斯，照顧死者靈魂的事，還是件很嚴重的工作。在沒死之前已經開始了。他們認為非常要緊的，是不可使靈魂失蹤，所以就放一枝蠟燭在將死者的手裏，燭是着的。人一死，立刻就

把燭吹滅，燭烟所飄的方向就認為是靈魂所去的地方。如若死者的眼睛偶然逢着是打開的，那麼就認為死者要找一個同伴陪他去，於是快快多方設法閉上他的眼，有時用重東西如大銅錢壓在眼上不許他開。死人不能由親人洗，要叫生人洗，因為怕弄得他不舒服，惹他生氣。用生人用他不認識的人來作他死後的事，是更平安一點。反之，晚上守夜却要親人，為的是叫死者知道家人愛他。要請唱詩班來念詩篇，安慰他，只要死者還沒送葬，念詩日夜都不能息。葬了之後，家裏要擺設祭席，擺些食物在墳上。第九天，第二十天，第四

十天，當他們以為靈魂最後升天的時候都要這樣設祭。死者也許還要回來，於是就有半年祭。

據尼可斯基教授說，在白俄羅斯，禮拜死者的事至今還在『祖宗的日子』舉行。每年春秋兩季，特別是秋天，他們預備一場家宴，爲着這事房子要大加掃除。於是擺上許多酒肉，全家都在桌旁會齊，然後家長把『靈魂洞』(The Soul Trap 那是天花板上的一個小洞)打開，請祖宗來赴宴。家長說：『皇皇祖考，我們相邀，皇皇祖考，請下塵寰來吧！我們家裏一切俱全；皇皇祖考，如若願意，我們求你降下來吧！』食的時候，大家把肉塊和酒湯等丟在桌下去，吃完之後，就請祖宗走。家長又說：『皇皇祖考，你們已經來到，宴饗已過，請飛回府去吧，如要什麼，請告我們。』以後，敬請升天！』由這種異教的存迹，正可以看出基督教的靈魂不死觀念，和這種斯拉夫人敬拜死者的原始行爲相合。

在統治者的卵翼之下，教會的財力與權力同樣增加。在俄國，那淒涼的原野上很快就星羅棋布地列出些奇怪的葱形的圓頂，這些圓頂在城中和居留所劃出美的天景。不過並非所有各處的人都像基夫人那麼無抵抗的接收這新宗教。羅夫哥拉據編年史說，就是用刀劍幫忙，遠放火幫忙施洗。在北洛思托夫(Northern Postov)有三位主教，因爲想把那兒的偶像都燒掉，逼得要奔走逃命。不過，慢慢的人民大被比善庭姆基督教禮拜時所用輝皇的禮節和華麗的美觀所吸引，而變爲基督徒，其實教會的教義，那班野蠻的斯拉夫人還是很不懂。以後他們就算表面的『歸了化』，且在民歌裏面表現出來。人民歡迎這新的聖像禮拜正如他們從前喜歡那些家庭偶像和物神一般。舊日的魔術儀節和冥會日子，都不過改了新的名

字罷了。這種情形自然不單斯拉夫教會如此，凡用武力強迫野蠻種族信教，或令他們大批信教的，都有這樣情形。

俄國教會在初期，頗在邊遠鄉村作了些殖民工作。在曠野所興的僧衆居留地，往往變成商業的核心，以後常常變成大城鎮大都市。教會很快的就了解自己拓殖的力量所到之處，他們都佔有大塊的土地。十七世紀的時候，教會擁有全國土地三分之一，有農奴幾千人。以後到十八世紀時，沙皇們往往用剝削方法弄走了他們一部分土地，特別是加撒琳第二，她把許多土地從他們奪來，歸於沙皇和她的親信貴族們。

教會文化

基夫，羅夫哥拉，莫斯科，以及俄國別的大都市，就文化上來說，都是教會城市。它們最有價值的東西都屬於教會。例如莫斯科在三十年前，它的人口只有五十萬的時候，這都市有十個大寺院（Cathedral），十五個修道院（Monastery），九個尼菴（Convent），兩個女執事所（Deaconess Centre）三五一一個教堂（Church），三三三小禮拜堂（Chapel），一一三三三個牧師人等，此外還有幾千和尚，尼姑，職業歌人，預備在教堂裏奏樂的。這麼多的禮拜堂打的鐘聲，宴會日子所用的華麗儀仗，音樂的美妙，儀節的神奇，充滿了全城空氣，使它自成一種特質。舊莫斯科只至克雷林（Kremlin）牆沿為止，在那裏面還有一片的教堂和宮殿，僅留小塊地方作方。後來城市越來越大，包圍了克雷林，在每一個城門和大路上都有個教堂。

莫斯科的主要教堂是克雷林的「聖母升天大寺院。」它是十四世紀所建築的，毀了多次又重建了多次。敵人侵入時，它總是大遭劫掠，可是以統治者的虔心和擁護，往往又充實起來。最後一個來搶的是拿破崙。他先從這教堂裏搶去了一三〇〇鎊銀，和七二〇鎊金以及許多寶石。這些寶物都是用來裝飾祭壇門戶，以及莫斯科的親王和大主教的石棺石槨的，這些人就埋在這教堂之內。教堂裏面裝有三七五個聖像，此外牆壁上，圓頂上，大柱上又有許多極精緻的壁畫。

偉麗的沙皇加冕禮就在這兒舉行。大主教牧師總監們的授職也在這兒。由這兒常常有各種大的遊行儀仗，出發到城中各處，到莫斯科河上去，為諸水諸河祝福。這種儀仗，總在國家歷史上的大紀念日舉行，如驅走了韃靼，波蘭，尤其是拿破崙，保全了莫斯科的日子。此外在教會的大節日如復活節新年也有。

在這種「十字架的儀仗」這樣游行這樣叫，熱烈地進行時，千千萬萬的人民所有好的唱詩班，所有莫斯科的牧師人等都來參加。有位正教徒作家稱此為「動的教堂。」他說「什麼廟宇圍牆能包容如許聖的物品，這麼多的牧師，歌人，和廣大的民衆的集合，像這十字架的儀仗呢？克雷林和附近教堂裏許多鐘所發出的節日鐘聲宣佈儀仗啓行。全副儀仗的開頭是一隊穿得極其華麗的詠詩班，由男孩子和男人們組成。其後牧師們都穿得禮服齊全，有一個主教帶領，信教的熱心家們則帶着聖像，十字架，以及裝飾輝煌的十字架，三尾旗（Gontalons）整個的是一種極其動人的景象。儀仗的中間，在一個高壇上是兩個聖像，一個是伏拉底米聖母，另一個是伊比利安聖母，說是會「作奇蹟。」頭一個本來在克雷林的升天大寺院

裏；另一個稱爲是『守門人』，歷數百年都在現在的紅場大門外一個小祠裏面。那壇拾得很高，好使底下能行人。特別熱狂的先生們，相信這些聖像的神奇本事，就在地下叩頭，躺在那兒，盼望這些聖像經過他們，就可以把他們的弱點都洗乾淨。『魔住了的』女人們看見這些聖像就歇斯底里的怪叫，常常弄得跟行的羣衆更加瘋狂起來。男的旁觀者們見儀仗來，當脫下帽來，要不然，行列中的熱狂分子就要把他打下去。俄國正教的神聖與其宗教熱誠就在這兒表現出來。

聖像與遺蹟崇拜

俄國基督徒還有種最得意的用來表現宗教熱誠的方法，就是到全國各地各聖祠去巡禮。他們老是要找奇跡。於是惹起那些僧場尼院來保有那些產生奇跡的聖像和遺蹟。這種遺蹟通常都是不能毀的某聖人，他的木乃伊，這東西認爲是確乎神聖不可侵犯的表誌。起初在聖經中有這麼一句：『你也不可以讓你的聖殿親見毀壞。』他們加以隨便的解釋，致成這樣的觀念。自然，修道院若找不到掘不出真真的木乃伊，便來假造，把些特地爲他們製備的假貨拿出來，給那些渴求神蹟的人們。他們並且鼓動起什麼治好癱子的事，以及別種聳人耳目的神蹟。有時也有些真的，因信仰，即使信的是個假聖人，可以有移山的力量，而自我暗示也可以作出些奇怪事來。

由於這樣爭着收集聖像和遺蹟，產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當封建統治時期，那些封建君主們常常

使盡心力去謀那些出風頭的遺體，或是打仗，或是圍着遺體所在的城市和寺院行搶，武力不行，就用欺騙及賄買的办法。他們相信這種遺體的魔力，相信得利害，若不奉什麼遺體在軍中，誰都不敢有上戰場的勇氣。有許多遺體聖像，背後隱着一大串戰爭的歷史。有許多聖母像負有盛名，因為抗拒它過許多外來的侵擾，同時又戰勝了奪取了許多新的土地和人民。

聽聽某聖像的歷史，也許是很有趣的。

聖母的伏拉底米聖像就在克雷林的升天大寺院，這我們已經提到過的。據說自有基督教以來就有這像。說是聖路加畫的，送給馬利亞耶穌的母親。馬利亞接着就致辭說：『看哪，從今以後，天下後世的人將稱我爲福主。』隨着她又說：『我和我的兒子的恩賜將與這像永永同在。』第五世紀時，像給人由耶路撒冷帶到君士坦丁去了；到十二世紀中葉，又被帶到基夫城，獻給烏里道戈魯基王(Prince Ury Dolgoruky)在一個處女庵展覽過不久的時間。以後安得烈王(Prince Andrew)烏里的兒子，一次北伐的時候，帶着這聖像一道作爲保護；行至蘇大城市(Suzdal)的時候，離伏拉底米有十英里遠的光景，載聖像的馬忽然不肯前進，安得烈就認爲是那聖處女不肯前進了。同時他又看見聖處女對他顯靈，說要在伏拉底米住下。安得烈立刻遵命，就吩咐建立起一所教堂樣子的房屋來。他使用大批的金銀寶石來裝置他的聖像。有位歷史家說，爲這件用處，光金子費了三十磅。自此以後，這個就稱爲是伏拉底米聖像。她的聲名揚於遠近，使許多王侯君主都嫉慕不已。她參加了許多戰爭，打了不少的勝仗，不過也有碰釘子的時候。一二三七年

韃靼人圍了伏拉底米城，克服了它，他們在城中大搶，毀了那教堂，把那聖處女的許多珍珠寶石都搶去了。不知怎樣這像莫名其妙的保存下來，不久又供在一個新教堂裏，伏拉底米的喬治王又把她輝輝皇皇的裝置起來。

一三九五年，鐵木兒 (Tamerlain) 帶着他的騎兵縱橫擾攘於俄羅斯平原，以莫斯科爲目的地。莫斯科王巴斯 (Bas) 認爲除了仰賴伏拉底米聖母像之外，別無方法可免毀滅。於是當克雷林派遣高級牧師，許多作代表飛風的跑到伏拉底米去利誘威脅無所不至，終於把那位聖處女弄到手，全城的人民爲此哭泣悲哀，不勝其傷心。大批的人民陪送着聖像，致使費了十天功夫，才把她請到了莫斯科。到了城門口，無數人民跪在路的兩旁高叫：『上帝的聖母呵！救救俄羅斯吧！』莫斯科所有的牧師和高級貴族都去迎接聖像，在偉麗輝耀的十字架的儀從中護送她到升天大寺院，在那兒把她去安置好了。當這些事在莫斯科發生時，鐵木兒在帳中瞌睡，忽然見了異象，一座高山朝他移來，由那兒降下許多聖人帶着金杖，在他們頂上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神光燦爛，一位女人在光中飛翔，許多武士環繞着她。他看見大吃一驚，立刻招了他的哲人謀臣來會議，問他們這異像是什麼意思。他們說：『這位神光照耀的女子是上帝的母親，基督的保護者，所以我們是打他們不過的。』鐵木兒就吩咐退兵，人人都以爲驚異。那位史家又說：『爲着底米特里維支王 (Prince Vasily Dmitrievitch) 盛德的生命，上帝加給基督光榮，他的純的潔聖母的神奇聖像，那由他自己的神聖的代言人路加所畫的聖像，來到這兒施救，使俄國得免於那班無神者鐵木兒

阿克撒加 (Temir Akaka) 鐵木兒之手。』一三九五年，那聖處女入莫斯科的街道，取名爲司烈吞加 (Sto-tenko)，就是『歡迎之路』 (The Street of Meeting) 的意思。她走過的城門爲司烈吞加門。爲着要紀念這件事，在門邊築了一個砲台式的修道院，稱之爲司烈吞基修道院。自此以後，聖像留在莫斯科，據說演了許多神奇事來抵抗侵入者，保護這城。所有的君王，沙皇，武士們都在這像前宣誓忠於國家。它現在仍然在克雷林的升天大寺院中。這在一方木板上畫的像，十二寸寬，七英寸長，像中是聖處女抱着嬰兒耶穌，嬰兒抱着她的頸。像是在銀盒子裏，木板週圍是金子和寶石作的邊，爲值十萬元美金。

這位伏拉底米聖母雖然在莫斯科君主們方面是很有名，但在莫斯科決不只她這麼一個有名的聖母像，基督像，別個出名聖人的像還有幾百。這些像比剛講的那個在民間反更出風頭，複印的像片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有。

這些神聖的像片還有奇怪地方。照樣，複作出來的，也和原物同樣有作神跡的本事。手邊很好的例子，就是伊比利安聖母像。這不是真的。原物在希臘聖伊多斯 (Holy Mount Aethos) 山上一個修道院中。這像希臘人稱爲伊比利亞的守門人 (Portaitisa of Iberia)。伊多斯山上的和尚們沒錢用，就請求俄國那位虔信的沙皇阿勒色斯 (Alexis) 讓他們去俄國化緣，他們將送他一張伊比利安聖母像的複寫像。他們問沙皇和他的大顧問以後，大主教尼康 (Nikon) 擔保說，複寫像也一定像原物那麼靈。那修道院的院長巴和美 (Pakhomius) 寫封信給沙皇和尼康，詳細寫出伊多斯山用如何如何的方法，使原物的神

奇本事能傳到複寫像。這信最初在一八七九年發表，我把該奇怪歷史文件多多的徵引一些如下：

『承奉陛下¹的意旨與新司巴所夫修道院(Spassov monastery)聖長老(Archimandrite)尼康陛下²的台教，我一回到我們的修道院來，就招集我們全體僧衆三百六十五人來祈禱唱詩，由黃昏直到日出，我們用聖遺體（就是死去聖人們的身體上的遺物）爲水祝福，以後就用這種聖水傾倒在聖守門者有福聖母的聖像，會顯聖的聖像上。我們又用隻大臉盆把這水收集起來，再三再四的把它傾注在那塊新像座上面。那是柏木作的。隨後這水仍然被收起來，以它我們開始熱誠的舉行神聖彌撒祭。祭完之後，我們把這聖水和聖遺體都交給尊嚴神聖的聖長老羅曼洛夫殿下(Lord Yamlikhon Romanov)，那位畫聖像的人，使他把這聖水調和遺體與顏色，用來去畫那神聖而有福的聖像，這樣，木架和顏料是和那聖水聖遺體溶在一起的。在他畫這聖像的時候，他只在禮拜六和禮拜日才吃東西，他老是靜默的，他歡欣而努力的完成了他的工作。』

信上又說當羅曼洛夫畫的時候，巴和美與其他三百六十五位僧衆齊作夜禱，由黃昏直到日出，每禮拜兩次，此外每天舉行神聖彌撒祭，這樣經過兩禮拜，到聖像完成爲止。

讀者切不可爲我是在掘出中世紀的聖者故事，來把俄人的輕於信仰開玩笑，以爲我要不把這些事提出來，它們必是早已被人忘了的。其實不然。伊比利亞聖像在革命以後仍然存在，它的祭祠還在紅場大門前，直到一九三〇，蘇維埃政府要展寬馬路把它才挪開到一條死胡同的小禮拜堂去，那兒離尼基次

喀亞街(Nikitskaya Street)不遠，差不多剛好在音樂傳習所對面。雖然是搬到這比較安靜的地方來了，它現在還是在『顯聖』並沒有什麼街上的標誌，寫明這聖像在哪個地方，可是信女善男還是找出它的所在。那小禮拜堂一天開到晚，信士施主在那兒舉行許多禮拜祭事，也歸他們付錢。

在正教徒看來，只有在聖像之前才能作禱告。在中世紀十三至十六世紀之間，每一教區裏面的人都是除了自己家裏供一位聖像之外，在禮拜堂裏又各有各人的聖像掛着。作禮拜時他竟去那聖像前禱告，不用理會牧師或別的人。要是有人敢於在他人的聖像前祈禱，那就要鬧出亂子來。意思就等於偷別人的『恩賜』。那聖像的主人是大大不喜歡這一套的。禮拜堂裏面有人各向一方自去祈禱，那樣子一定很可笑。可是這種情形至今仍不缺少，作禮拜的時候，許多人各自跑到一個角落裏去對他的私所聖像禱告。所以聖像不但把上帝照臨的事提醒人，它也就有上帝在它當中，它是充滿『恩賜』的聖像活着，有感覺，能見也能聽。它照顧一家的生活，若是在它面前點着燈燭或把它裝上金銀寶石，它就歡喜。這些深入人民腦中，使他們至今不肯捨棄，甚至於知識分子們在別的生活上即使非常有理性的，也都還相信着。

人民之禮拜聖像和道體，定下宴會日期，和僧侶的作用，都是就實利方面着眼，這些事都為的用來抵抗惡鬼，疫病和飢餓。教會的教條倒在其次。他們之所謂的正統，不過是遵守舊儀節和舊方法，與聖經的教訓，和教堂的根本教義並不相干。人民大抵不知有聖經，也不會去讀它。讀聖經的人們都有嫌疑，被人認為有傳道派的分派主義。事實上俄國傳道派的產生，就由於外國教會散播聖經惹起來的。

教義的特點

如若考察一下俄國正教的教義，就知道他們是注重宗教的靜的方面。它認為教會的諸神父長老已經把真理交給了俄國正統教會，所以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保守這真理。世上並沒有別的新真理，這麼想想都是犯教的。『全俄歸化』的第九百年紀念時，代表的教會職事人等發表了莊嚴的宣告如下：『因為正統教會是真理的根基和台柱，因為上帝的神靈與它同在，保佑它脫離過惡，所以只有它才把這神聖的教義照原來交給它的樣子保存下來，且將保存到永永遠遠，對於原來的真理絲毫不能減，也不能增。』

這剛好就是希臘正教的教義。它認為自己的任務只是保存，不能發展，也不能尋求真理。所以正教的神學家們只得賦予自己的學問以一種謙卑的職務，小心提防一切改革的企圖。上文所提的所謂神，『神聖的教義』指的奈辛信條 (Nicene Creed) 和七大全體會議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 的法規。頭四次會議的理教經如加丁寧皇帝 (Emperor Justinian) 認為與聖經有同等的地位，五次大會對於這點又加以承認，這樣的勢力早已由俄羅斯正教承認了。

這些會議裏所討論所定出的教義，至今在俄國正教中還有勢力，這教會且要保存它直到永遠永遠。這些教義究竟是什麼，且讓我們將它作個簡短的敘述。三二五年在尼西亞所開第一次會議，因為其中有天主教代表，當然毫無問題，是所有這些會議中最緊要的一個。它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給神性 (God-

head) 下個定義，這件事對於那些哲學頭腦的希臘人似乎是極其要緊。爲着它，阿留斯 (Arius) 和阿善那修斯 (Athanasius) 的門徒起了熱烈的爭論，特別是在亞歷山大。那地方在基督死後幾百年中，是哲學思想神學思想極其有名的中心。

大家都知道，這場爭論轉而集中於三位一體及諸神聖人物之間的關係問題，注意到字眼之極其精微抽象的方面，這種方面只能在希臘文字中才求得解釋來。在人類思想之最抽象的範圍加以如此過分的武斷，而這武斷反作爲『神聖的教義』受人尊崇，簽名蓋章來擁護，且以呪詛來保衛它，希臘正教至今還是它極其熱烈的擁護者。

製作信條的人們雖然起心要把它弄成個完全的東西，『永永遠遠』不再更動，可是在四五一年第四次大會中又有些增減。從這以後就再沒有更改過。

這些會議所注意的一些別的問題，主要的是懲辦犯教人，凡在這爭論中不肯服從多數決定的教士們，都歸此類。此外會議中又規定教師們的行爲，漸漸的希臘正教發展出一種宗教上的職位層級。至四五年第四次大會，就建立了大主教職位的制度。第七次，也就是最末一次，大會由俄教會承認，它定下來要尊崇神聖畫像，凡要毀壞這些像的所謂破除偶像者，都遭定罪。

這是七八七年。從此以後聖靈不能夠顯示『神聖教義』了。正教已是定型，教會裏的神學家們只能挖空腦經來防止人把這教義加以絲毫增減，這樣爲時互十二世紀之久。

東方教會，希臘的俄國的都一樣，它的教義定型化說明了它與西方教會，天主教基督教都在內的不同點。特別明顯的是它們的教師教士中沒有有學問的人。既是不必找什麼新的真理，他們自用不着念書也未嘗不有些學者，他們專講傳統的神學，抵制那些敢於推翻正教信仰的犯教人們；至於有創發性的思想在正教教會既沒用，也立腳不住。也許因為這原因，俄國儘少的有創造性的幾位宗教哲學家，出身都不是領教職的而是普通人民，其中最有名的是柯馬牙可夫（Slavophilii Khomyakov）以及最近的梭洛維夫（Vladimir Solovier）。不像西方教會，俄國教會並沒有組織研究世事學問的機關。俄國從不會有過教會的學院和大學，從前所有的神學學院等，通常倒保有相當的學術程度，但已經關了門，教會對此似乎一點都不感覺到損失，它自己很可以不要有學問的教師們，獨行其是。

在西方，修道院通常是學術的中心，在俄國則不然，至少在文字方面不然。有學問的和尚被人懷疑。『要書本』容易使人精神方面驕傲起來，他們以為那是魔鬼的一種工具，用來把人的靈魂抓進地獄裏去。從有名的佩切斯基修道院（Pechersky Monastery）傳出一件故事，據說有位師兄尼基塔（Nikita）遇了異象，有一位天使告訴他要求學問，以後有人來求他指導時，他可以教導他們，他就來背讀聖經，弄得能够把整本舊約全書都背下來。所有的師兄師弟，以為師兄尼基塔是被魔鬼指使來作這樣蠢事，於是不斷的勸他，為他禱告，結果成功了把魔鬼等趕出去了。故事末了說：『尼基塔的學問全丟了。』

因為缺少學問，俄國教會不但不能把它所受的教理發揚光大，甚至於連保持它不變都不能夠。米留

可夫(Paul Milinkov)那位關於俄國文化的歷史家斷言俄國教會『必然會很容易很自然的採收她以前那些異教信條。只要把東方的基督教簡單化，把它弄成個完全物質化的東西，就可以達到這結果。簡單化了，物質化了，東方信條就變成了特有的俄國民族的正統教。』

倘若有正當了解的話，崇拜偶像和遺體對於信徒們本有美的和象徵的價值，但是在俄國教會採用這制度的時候，它已經完全失掉了它的精神性質。我們知道聖像是俄國人民宗教生活中一種重要的成分，因此我們不能不了解俄國教會採用它的理由。教會的應用聖像，本是由那些會議加以解釋和承認了的，如今教會仍然以這解釋為根據。七八七年第七次大會在尼西亞開會，會中主要的是關於毀壞聖像的爭論，其後仍然決議尊奉神聖的畫像等。主張尊奉聖像的理由在會中被列舉出來，至今還是由俄教會奉行。

在爭論毀壞聖像的時候，一位擁護聖像者聖梅多丟斯(St. Methodius)寫1封信給他的論敵們說：『你們以為這樣崇禮聖像就是把它們變成神了麼？可是你們，這正該你們去教導人民如何去尊崇他們。假如有一個鄉下人，一個村中莽漢忽然遇見了皇帝的聽差，就把他當作皇帝自己，就對他說：「陛下皇恩浩蕩，請賜恩於小臣。」那麼你就要吩咐把那個受禮的聽差和致禮的聽差都一齊殺掉麼？（因為他藐視皇帝）自然不能，因為他是出於無知。知道的人們就該對那沒經驗的講說那不是皇帝，因為皇帝高拱深宮，除了他自己高興出來一現色相之外，是沒有人能見得着他的。照樣，你也該對那些把基督的像當神拜

的人講，說那不是基督自己，却是他的像。因為基督住在天上，以我所知，就沒有人見過他，直到他第二次再來審判這世界的時候。這樣他們一定就懂得，也會按規矩的來禮拜了。主教牧師的任務就是這樣，教人民信仰和禱告。」

在初期教會中，聖像之使用，主要的是基於它的實際功用。對於不學的人們形像就是書籍。實際上，在那些較古的教會中，畫像的確代表正統教的救世計劃和教會歷史。在莫斯科大學院有一種古典的升天顯示，人都認為是基督教正統觀念之最完全的模範。它的神龕，陳列祭壇的地方，分爲許多層級，層層都擺了一長串各種聖像。這些聖像的基本觀念是表示逐時逐代的「聖人們領聖餐」這倒是基督教中美而真實的教義。

上層的是摩西時代以前的聖人們，安息日的主在這一中間。此外有亞當塞特以諾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以這些人象徵着由衆生之父傳出來的神聖生命。第二層是舊約中的諸聖，由摩西至基督。以聖處女在中間。在她左右的先知們擎着紙捲，其中是對於彌賽亞的希望。再下一層是福音書中的歷史，以十二件事件來代表。在第四層（正在御門上面）是基督的統治，他坐在一個天上的寶座上，是永生不息的大祭司爲人類的罪孽作解救；在他兩旁是他的母親和施洗約翰，這兩位是正在他來以前爲人類的罪孽求解免的人，是代表人類之全美的，他兩人是在作禱告的姿勢。這兩人旁邊是所有的使徒，爲首是聖彼得和聖保羅，他兩人是宣傳福音和奠定教會的人，這一層所表現的是基督教會本身。以後由正堂裏壁從上而下，

畫的是教會的發展，是無形的聖人們領聖餐。

這教堂中的四個中柱所表現的是殉道者，他們的血變作了教會的力量；神龕的御門上是天使報信的聖像，還有四位傳道者。在南壁上畫的是幾次大會議，這些會議所定的教條，和信條藏有俄國教會的教理，在西壁上是最後的裁判。除了這些以外，還有許多別的聖像，畫着聖母聖人們，爲的這些人都是創造俄國教會的基本成分。

不過聖像之解釋教義，並不僅在象徵的方面。據聖達馬星（*St. John Damascene*）則聖像乃是聖子的化身，這人的觀念在七次大會中是得了勝利的。這種意見，一定和現在在俄國流行的所謂「上帝顯示」的信仰有關係。在俄國有幾十個聖像，教會揚言不是人手所造，而是上帝從天上送來的。證據就是它們有「產生奇跡的能力」。我很疑惑，不知會議中的那些先哲長老相信這種神話否。但聖達馬星既宣傳那種意見，這也不過是那意見的一種自然產品，同時也是米留可夫所謂俄國基督教觀念之物質化的顯例。

除了聖像敬拜之外，替死者作禱告也是正教中一種最要緊的教義和行爲。我們已經說過，這種敬拜與俄國慎終追遠的舊習很符合。教會的發財，大都是從這種迷信榨來的。王公們往往約請修道院和教堂爲他們的死者天天祈禱，而以送錢送財產給他們，作爲酬報。教義中有所謂生前犯罪的報應，要免除報應，只能靠教會作禱告。這教義是牧師輩的有力工具，他們盡量的利用它。甚至於現在，牧師收入的大部分來源都由於此。大部分正教徒家庭裏，每年還至少有一次請牧師上家中來爲死者祈禱。當然教會所賣

的這種免罪狀，會在人民中產生不道德的結果，同時也造成俄國基督徒喪失道德的明顯現象。

人民的倫理

宗教對於形成俄國人民的道德規律和道德行爲，沒有多少關係。因爲牧師的澈底無知，沒有學校，沒有宣講機關，而一般人民和鄉村牧師又一個字不認識，所以要想有系統的把十大誡命，山上的講道，以及一些別的基督教觀念傳播於人，在初期的俄國教會差不多是不可能。斯拉夫族的舊俗習以及他們那原始的經濟與社會組織和初期教會的倫理不合。在這樣中止不前的情形中，人民的社會關係總是由多年的習俗和社會方便去支配。

俄國民謠中的故事，格言，韻語，諺語等都含有人民的智慧。愛古的人們收集起這些東西，加以一度分析，發現某一團體的格言通常與那一團體的社會的道德的要求相符合。有些民謠預言，由基督教傳入俄國，其中大部分是一種混合品，原始觀念與基督教觀念與聖經中的話混合。範圍所及至於一切人類的需要和興趣。格言有關於上帝的，關於人民對主上忠心的，關於婚姻的，關於財產權的，關於罪犯的，收稅的，條約的，有效的，關於某些食品飲料的禁止，關於貧，窮，病，和健康等。有名的俄國法律學家相信俄國的普通法是根據民謠而成。關於疾病和醫療的格言中，有許多非常正確的觀察和好的意見，就是今日的任何大夫也不過能如此。

關於上帝的諺語，則注重一些專制皇帝共有的特點：『只有一個上帝和一個沙皇，』『上帝在天上，沙皇在地上，』『一切是上帝為沙皇的權能，』『上帝有恩，沙皇有威，』諸如此類。這種把上帝和沙皇比類的說法有幾十條，不過也還有些注重比較民主的諸點，如：『人為私，上帝為公，』『人走道，上帝領路，』『人建議而上帝處置。』諺語中也有不少講到神愛護人及施恩於貧者的地方，如：『上帝給我們牙，也必給我們麵包，』『上帝給我們身體，也會給我們健康，』『上帝不窮，其恩無盡。』一方面注重上帝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有成語來鼓勵人自己努力，如：『純潔生活者，上帝一定助他，』『守真理的會蒙上帝酬報，』『自己小心的得上帝保護，』『上帝不是力，却是真理，』諸如此類。

諺語中的基督老是受苦受難不記人過的。『沒有十字架就沒有基督，』這是很受歡迎的成語。罪和罪犯 (Sin And Crime) 差不多是同意思的。不過罪人並不遭摒棄，他總是被人當作是『不幸的，』往往遭憐惜而不受藐視。罪被認為是生命中不可免的東西。『只有上帝是無罪的，』這句話常被引用。『有所禁止，就有所犯罪，』『你若無罪，你不會悔改，——你若不悔改，就不能得救，』這就是正統教罪人的邏輯。『凡火都有煙，凡人都有罪。』有一句諺語說：『甚至於天主教俄了時也要偷盜。』

俄國正教中常提到罪，可是要緊注意的還是饒恕和恩惠。『與罪惡相爭，與罪人相善，』『施恩於罪，如注水於火。』雖然一方面對罪人講憐恤，格言中都不鼓勵人去和惡人混在一起。『惡人如炭，要不燒你就要污你，』『和狗同睡帶來蚤蟲。』

格言中讚揚善交際，睦鄰里，好客，友誼，憐憫，寬恕，謙卑，忍耐，簡單等等：『團結堅固，狼子不入，』『對人對己，良善溫和，才是正當的生活，』『愛在那裏，上帝也在。』正統教有一陣子是寬恕的精神佔優勢。在人民的普通言辭中都有表現。所以至今告別的話還是(Proshchaity)，就是寬恕的意思。俄國人很能寬恕，忘記得很快。革命過程中的痛苦早已忘掉。勝利者與失敗都已丟掉已往的苦惱。教會現在雖受罪，它倒是忍耐從事，以為這是過去罪惡的報應。

不過要說俄人有深刻的責任心，都不合於事實。新教人民那種玄想默認的無上命令，決不是俄國正教基督徒的倫理。在封建與資產階級時代，俄國農民和工人階級的卑辱地位，並不能構成一種社會根基，在上面建起嚴格個人主義的信條，來深刻的尊敬個人的財產，與了解人格的神聖。社會革命現在已把舊的掃除了。在這過渡時代，社會關係正在重行整理調和，而新的道德也正在形成。將來的道德觀念還沒有十分明定，但是事實是很清楚的，在新社會制度下將有新的倫理產生了。

第三章 教會與國家

俄國教會與國家的結合實是造成教會的麻痺無能的原因。俄國教會從最初起就和皇帝發生了聯結關係。一開始，教會就倚在國家的懷抱中，俄國人民之變成基督教徒，我們已知都是統治者們的直接領導。有時候當俄國沒有皇帝或皇帝是軟弱無能之流時，教會就起而代掌政權，但是貴族階級們又太強，太有勢力，放不下讓教會獨享政權，所以教會勢力老不過是暫時的。有時候又逢皇帝和大主教出自一家，像羅曼洛夫朝初葉的情形；米加爾第一（Michael I）是大主教非拉烈特（Philaret）的兒子，於是大主教在事實上就是全國的皇帝。在俄國教會與國家的種種升沉變化之中，他們從來不會分開過。不過大概說來，政府越來越更強大，到十八世紀時，教會完全被其統制，像政府屬下的一部，管理人民良心的巡警似的。

按教會與國家雙方平行的發展，我們可以把俄國歷史分為幾期：封建制度時代，國家與教會的中央集權制度時代，農奴時代，政府對教會之官僚式的統治時代。

封建制度下之教會與國家

在十三至十五世紀中，封建制度盛行於俄國，在這期間，名義上教會還是統制於君士坦丁大主教的

治下，實際上則全屬於本地的封建王侯們，這些人很不喜歡外來大主教的干涉的。其後韃靼人侵入俄國，回教人又伸入君士坦丁，使教會不容易和君士坦丁的基本教會發生聯繫。結果俄國的封建王侯就來選派主教，由他們管理教會。這些主教們大都是貴族或富商，年齡衰殘了，就進入修道院為僧。他們常常建築自己的修道院，自己作大院長，與那些管轄教區的主教們不發生關係，是獨立的。教區主教對於這些王侯貴人的修道院，一點權力都沒有；那裏面的和尚多是那王子的從人，農民只可以進去為他們的舊日封建主人作苦工。

主教的職務，主要的在於為指定教區的教堂收錢。封建王侯和大地主常常建立自己的教堂，指派自己的牧師，但這牧師必要得主教來授職，他們的教堂也必得主教獻為神用。這些事只能由一個主教來作。作這件事的人，得問那封建主要一定數目的錢，每到教區來一次也要錢。此外主教又從地方牧師收什一稅，又從教會財產收到大宗錢糧，這些土地財產，往往是封建主或富商給那教會的。有些土地很大，例如十七世紀的記載，說維亞特加 (Vyatka) 的主教擁有三十村莊和左近的土地森林。在這時期，有十五個主教在城市和鄉村所屬二萬八千戶，而大主教私人就享有七千戶。這些主教們把財產分租於人，或者仿效貴族王侯們的方法，用一個特別收稅人去剝削。

王侯們仍然保有土地治理權 (Dominium directum)，從主教們的財產那兒收稅。他們同時還有權利可以更換自己領域中的主教。修道院長與王侯的關係，和主教與他們的一樣。在這種封建情形之下，教

會不能有真正的團結，封建領主之爭雄奪勢的常態，也出現於教會中間。每個領主都要弄到一個出名會產生奇蹟的遺體或聖像。如若本地沒有這東西，他們就要和鄰地領主與主教論價收買，有時還組織武力去搶那切要的神物。

在封建制度期間產生了許多本地的禮拜和自己的恩聖 (Patron Saint)。常常這些恩聖就是本地的領主，因為他虔敬，又大量的送給教會錢財，於是教會就尊崇他為恩聖人。俄國的本地基督教特別的智識落後。大部分牧師和教民一樣的不認得字，教會中的主教和神學家們就討論象徵主義的問題，引為絕大的興趣；討論畫十字時該用兩個指頭還是用三個；討論人應該有長鬍子不加修剪，並且不許修剪，因為他們以為那樣就破壞了人所表現的上帝的形像，在聖像上所畫的上帝，老是鬍子和他們自己的一樣的。念禱告是認為有魔力的。據說有些禱文如果念得够多，那人一定會有上帝「附體」，並且在生前念了一定的次數，就一定會得救。如果為死者的靈魂也念這同樣的禱文，也會有同樣的結果。因為如此，所以作禱文專家——和尚越來越多，其結果修道院弊端百出，發財無算。

國家與教會之權力集中

十五世紀末葉，莫斯科的總監督和王公們開始進行將國家與教會的政權集中，主要的以克服別的小領主們的方法來實行。此時莫斯科皇帝是約翰第三那狡猾腳色，混名為加力答 (Kalita)，錢袋子的意

恩，因為他又刻省又吝嗇。他的支柱是總監督約拿（Jonah）這人有種野心，要把俄國教會從比善庭姆統治下拉出來，同時把莫斯科的地位提高，使之變為第三個也就是最後的羅馬。於是他起始來宣傳，說比善庭姆教會背了正統教信仰，說君士坦丁之滅亡，都由於該教會不虔犯教的緣故。他寫一封信給他所屬的主教們，他罵該教會如下：『孩子們，你們自己都知道保加利亞人和波斯人曾經圍攻那皇城（君士坦丁）像把它鎖在網裏面共有七年之久，彼時那城受了怎樣的罪苦，你們也知道；可是只要那些希臘人始終虔誠，它還是保全了下來。只等他們一失了信仰時，你知道他們免不了的要受怎樣的難，他們是怎樣的被人俘虜屠殺；他們的靈魂如何，只有上帝才能知道。』結論是很明白的。俄羅斯再不能對於希臘教會有什麼盼望了，該教會已經失了它的長子權了。國家現在一定要把教會的福利拿到自己掌中來，不但如此，它並且應該保衛全世界的正教信仰。君士坦丁那第二羅馬已經滅亡，而莫斯科還在，且有『極度信的』皇帝領主們。它是被選擇來作第三羅馬的，它將永存，直至第二次主降臨的時候。它的皇帝王公將成爲『真正的基督徒皇帝，十字架的保衛者。』

約翰第三喜歡這意見，就決心負責自己來當那『虔誠的』皇帝，君臨一切王統教域，爲的便於他的野心。他就安排自己和君士坦丁的蘇非亞公主結婚（一四六七）並且在莫斯科建築大寺院，以代替君士坦丁那被褻瀆了的聖蘇非亞大寺院。

約翰錢袋子一方面很成功的把俄國教會由比善庭姆統治下解放出來，另一方面他又出兵去打北方

各領主，也是一樣的成功。他并不毀壞他們的聖殿和聖像，却把這些集於莫斯科放在他的新寺院升天大寺院裏面，這寺院於是變成了全俄的中心萬神殿了。同樣的，他從伏拉底米大寺院把聖母像，從羅夫戈拉(Novgorod)把教主像，從卜士可夫(Pskov)把聖母像，又從司牟能士克(Smolensk)將另一個聖母像都搬了來。這些地方聖像，起初只能為封建領主的光榮，現在都齊來為莫斯科大城的能力和榮耀添彩。同時約翰為的要把牧師中之最聰明的分子收集到他的朝廷來，於是他頂高興的聽他們講第三羅馬——神聖的莫斯科——到來的哲學。有位有學問的和尚非洛丟士(Philothens)寫封信給約翰，很可作有趣的例證。他說：『因為阿巴林那內士(Apollinarius)犯了教，古羅馬的教會遂被毀滅，而第二羅馬的君士坦丁教會又被哈加爾的子孫破壞，可是這第三羅馬(莫斯科)——即專制政府的——神聖使徒教會都光照日月，兩個羅馬都已滅亡，只有第三個矗立不倚，以後再也沒第四個的了。你就是全世界基督徒唯一的沙皇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莫斯科君王們毫無困難的把教會置於國家之下。約翰和他的忠心教徒們所已開始的工作，自有以後諸沙皇來完成。

恐怖的約翰第四(John IV The Terrible)繼續這政策，將俄羅斯都置於莫斯科統治之下，趕走薩剌人。他也注重於把俄國教會由比善庭姆的分開。在他的時代，才開始流行那種神話，說聖使徒安得烈在尼泊爾河(The Dnieper)岸上傳教，這自然是很快而人都相信的。『為什麼你要我們去跟從希臘人？』沙皇對教皇大使波色芬(Possevin)說，關於佛羅倫斯會議，那大使要俄國教會隨着希臘人。『希臘人又不

是福音書。我們不信希臘人，只信基督。當最初有基督教會時，安得烈使徒彼得的弟弟，去羅馬時路過我們這兒傳教，我們在那時候就相信。所以我們接收基督教和你們在意大利是同時。」

就這樣俄國也算有了理論根據，它的教會是直接由使徒傳下來的，同時沙皇之被稱為全正統教會之唯一的皇帝也更有力量。因為要完成俄國教會的獨立，且證明它是正統教會，俄國的教士們就覺得很需要俄國自己的真正奉聖的聖人。以前教會所尊崇的聖人和殉道者都是外國人，大多數是希臘人，這似乎像俄國教會都沒有自己的為信仰作神聖見證的人。為着要勝過這種困難，俄國主教們就來考察他方團體所崇敬的俄國聖者，看他們作了什麼虔敬事業。一五四七年舉行大會，各主教報告自己所調查的結果，共得聖人二十二位。於是大會把他們都進封為聖了。第二年又繼續調查，一五四九年重召大會，又封了十七個。有些教長們敢於反對以莫斯科作第三羅馬的，都遭了大會的詛咒。這種反對是教會第一次經驗到的，它來自東南方。在伏爾加下流有一個修道院居留所，是梭羅基（Nili Soroky）所建，他是有深刻識見且有學問的人，有很多徒眾，他一直反對莫斯科那些國家主義教士們的帝國主義傾向，有五十年之久，最後他還是被莫斯科大會壓迫下去。

伏爾加的和尙們，反對教會與國家結為一起，以為彼此應該對彼此獨立。他們說教會的牧師們不該怕政治權力。他們應該擁護精神方面認為正當的事，政府不應該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宗教是個人良心上的問題，政府不該因人的宗教意見而加人以迫害。

現在俄國教會還缺少一件東西。自己還沒大主教，免不得要受君士坦丁大主教的支配。要找一個又不容易，必得比善庭姆主教的許可。卡冬羅夫（Boris Godunov）俄國那位狡猾的篡王到底從希臘大主教耶利米（Jeremia）那兒得到了許可，這人是在一五八九年到俄國來募捐，爲比善庭姆的窮苦教會的。俄國的教主約伯於是被封爲俄國第一個大主教，自此俄國教士們要求獨立與尊嚴的大變算已實現。一方面成功，同時另一方又產生了一種新的形勢，使俄國教會不能免於衰落。

俄國現在有了兩重權力，一是主教，一是沙皇。於是大主教要實現他的精神統治，與沙皇們的輝煌寶殿競爭，雙方衝突就明白的不可避免了。

魯力克朝（Rurik dynasty）絕緒了之後，各種各樣的篡王都登王位，國家亂得不堪，於是強有力的大主教非拉列特恢復了秩序，把他的小兒子米加爾羅曼洛夫作了皇帝，實際上就是他自己終身爲王。到阿勒色斯第二個羅曼洛夫皇帝時，尼康作了大主教，他毫無問題是俄國十個大主教中之最死幹的。歷史家常稱他爲俄國正教的培開德（Thomas Becket），他是第一個與沙皇及貴族衝突的人，他們怕他，以爲這有力人物是超專制主（Super Autocrat）。這種懼怕很明顯是有理的。尼康也感到自己的權力和職務的尊嚴。有一次，沙皇的強有力的貴族們得罪了他，他說：『你要知道，並不是我們從沙皇皇帝們那兒接受我們的神聖權威，反之，那些治國者還是被我們施了膏才作皇帝的。同樣的，牧師職務比皇帝的要偉大得多，』這是很危險的教理。膽小的沙皇也怕了這大主教，這位他從小就喜愛的人。但他并不阻止他的

貴族們設計倒尼康，倒成了功，尼康一倒，教會於是不可救藥的隸於沙皇之下，不久連大主教位也都取消，這是幾十年後由彼得大帝幹的。

所有有勢力的大主教中，尼康是最末一個，人常常認爲他是俄國教會的改造者。他在正教會禮拜方面是有許多改變。這些改變，下文將要提到的，惹得那些保守派的熱心家們大起反對，弄到後來實行清教，把大部分最忠度的教會分子都驅逐出去，自此以後，俄國教會所引以自豪的統一，於是破壞了。

教會與農奴制度

在俄國教會史中，十七世紀是所謂的俄國大主教制時代。它也可稱爲是俄國的農奴制度勝利時代。在這一世紀，莫斯科沙皇的權力集中，又有貴族和高級宗教職員擁護，他們盡量的壓迫自由農民，強迫他們作勞役，把他們所有的土地財產都給搶去。此時大主教，主教們，以及各修道院擁有百萬農奴，幾乎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他們和貴族王侯們一樣的榨取農民，同時他們彼此相互地維持教會與皇帝的尊嚴，這是於雙方都有利的，他們雙方都祝福農奴制度，並保護。

於是教會因爲靠着皇帝以保護它的財產，就變成了他的工具。此時沙皇已經有了特權，來選擇大主教，以及其他各主要宗教職分的候補者，同時沙皇和上帝一樣變成了地上的萬能者，教會各處宣揚這樣的教條，直到一九一七革命把專制政府完全推翻爲止。這樣，自然農奴是在沙皇和大主教的雙重壓迫之

下，而低級牧師的地位也就和農奴的差不多，這情形自使他們生出極大的不滿和反抗來。

從十四世紀末葉起，至十五與十六世紀，俄國發生了最初的羣衆反抗。首先是所謂的司特力戈尼克運動 (Strigolnik movement)，因它的領袖加爾卜 (Karp) 的職業而得名。這人是個裁縫。司特內卡 (Strigolnik) 這字就是剪布的意思，以後也許他的從者都是裁縫也不定。司特力戈尼克運動由卜士可夫傳至道威爾 (Tower)，羅夫戈拉和莫斯科，被認爲是一種危險的犯教派。他們主要的是反對教會中那些封建式的弊端。這運動大要還是凡人所興起來，傳入於各同業的行會中去。他們宣傳鼓動，攻擊上層宗教職員，爲的他們濫用權力，買賣牧師職業，很多不好的人都可以買得一個牧師職。這些初期的俄國反對派開始讀聖經，從那當中找出很充分的辭句反對教會中的整個教職團。他們指出聖使徒保羅鼓勵凡人去傳教宣講，他懲責酗酒和愛錢之類的事。他們說既然牧師們都是些醉鬼，和壞東西過酒肉生活，又從活人死人徵收金銀財寶，那他們簡直就是狼子披着羊皮，人一點都不需要他們。這些凡人自己來作自己禮拜，甚至於舉行自己的聖餐禮。他們反對敬拜死者，不許爲死人作禱告。有些極端分子甚至於連教會整個的不要，以爲要得救並不需要教會。於此俄國的非正統派已經就把一切反對教會的主要條件提出來了。

無論如何，教會與它的禮拜，人人很深很有力，傳統信仰不能驟除，同時凡人之中能讀聖經，能擁有聖經的又相對的少。只要一切無所變動，同時牧師們所要求的又不太過分，那麼人民雖有點點不滿意，也就讓這種既成現象延續下去了。

大主教尼康之所謂的改良，就是在儀節方面導禮書(Orphee Book)的條文上有所改變，這改變又惹起一種新的羣衆脫離國教運動。我們知道在封建時代羣衆分立，有許多的地方禮拜乘時興起，大與比善庭姆的儀制不合。尼康想要改訂舊書，使一切教堂的禮拜都歸一律。習慣上畫十字時都是用食指和中指，尼康把它改爲將拇指食指中指屈下象徵着三位一體，人民和下級教師大加反對。還有一件事，是把耶穌這名字的斯拉夫文拼法 *Isus* 改爲 *Iisus*。信徒們覺得這是大不可忍，平加一個「i」字，使 *Isus* 這字失掉了它的魔力。這些以及別的改革不但使凡人生氣，就是那些稍稍認得幾個字的鄉村牧師們也不贊成，認爲這些改變根本沒有實行的可能。他們都是用死記的方法把那些舊儀式條文背下來的。現在這些新法子，需要他們會讀，這是不可能的。同時他們又恨主教團收稅越來越多，自己一天天的變成奴役。這種反抗與那些窮困化的農民，反抗的市民合流，構成了一種廣大羣衆脫離國教運動，歷史上稱爲是舊信徒派(Old Believers)。同時這也是一種羣衆運動，要求逃掉那不能忍受的農奴制度。千千萬萬的農民脫離故鄉，流徙到人烟稀少的邊疆，到西伯利亞的曠野，以及南方的草原去。

這種分裂之主要領袖，是莫斯科的大牧師阿發古姆(Arch-priest Avvakum)，他是個絕不妥協的熱心家，也是舊信仰的殉道者。在莫斯科的貴族中，他也頗受歡迎，那些貴族因反對尼康想要推翻他的權力，於是勸得阿勒色斯第一來恢復從前的舊習慣。他們果然把尼康弄倒，但不能阻止改良運動的發展。這時候這運動已經在上層階級中都得到了擁護，城市牧師們也贊成他們。於是一六六六——一六六七年中

召集大會來解決這分裂問題，阿發古姆和許多別的人們被趕到各處逃亡，分裂者都被斷為罪人。

白海諸島的梭洛維次基修道院 (Solovetsky Monastery) 是舊信仰的堡壘之一。和尚們都反對尼康的改良辦法，把新導禮書都毀掉，用起武力來抵抗沙皇強迫接收的命令，尼康有一次把這修道院所存的莫斯科殉道總監督非力卜 (Philip) 的屍身搶去，梭洛維次基的和尚們因此特別恨他。那位殉道者因為敢於當面數說恐怖約翰的罪惡，被他殺了的。到羅曼洛夫朝非力卜被迫封為聖人和殉道者，從俄國各處有許多巡禮者來梭洛維次基敬禮他的石槨，梭洛維次基變亂削平了，領袖都被破了頭。一六六六，即教會開大會將分裂者定罪的那年，給人當作是一個神秘的數目，它是反基督 (Anti-Christ) 與世界末日要來的確實記號。當梭羅維次基修道院被圍困時，就發生了反基督的觀念，阿發古姆的文章激烈的祇罵大主教和沙皇，說他們是反基督的使者。這正義宣傳者被囚在地下獄室裏有許多年，其後他仍然繼續的攻擊沙皇和他的新教，以致被焚於一六八一年。阿發古姆的講道文有些被保存下來，在人民中流行頗廣。那些文章之啓示的和革命的性質，對於既存現狀是很危險的，因此惹起對於舊信徒派極嚴重的迫害。

阿發古姆宣傳，那國家與教會聯盟反對人民。撒但的使用人不但是尼康也是沙皇，沙皇給尼康自由活動，且和他一同毀壞舊教。尼康與沙皇是啓示錄中那猛獸的兩隻角。沙皇與尼康飲耶穌的神聖見證者的血，狂飲大醉。沙皇尼康及一切別的有權威者都是反基督的徒從，在他面前稽首。阿發古姆的門人後來又把這意見加以發展。所謂反基督就成了撒但的三位一體：蛇、猛獸和假先知。蛇是撒但，獸是沙皇，假先知

是大主教。

阿發古姆及其門徒勸信徒們逃難離反基督及使用人，說寧願燒死都比投降好。結果大批羣衆出亡到曠野去的事於是開了端。不滿意的農民與平民工人都從家中逃亡，躲避有權威者的追逼。被捉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逃進去的房子放起火來，免得被抓住。這是所謂烈火的洗禮，乃是虔敬的最高等。在十七世紀後幾千年中，就這樣自焚死的，至少有九千人，而十八世紀中新的熱狂奮發捐生捨命之流，仍然不斷出現。

國家對教會之官僚式的統治

彼得第一決心要把俄國近代化。他看出大主教職的存在，不但危及於絕對的專制主義，且妨碍這近代化的進行。有幾個甘心贊他的野心，作走卒的教士則幫助他這樣進行。一七二〇年，他取消了大主教的位分，使教會完全受了國家的統治。他組織了一個教士院來代替大主教職，同時由他派一個凡人來作領導。這機關後來改爲神聖法院，是仿效新教徒的國家教會而形成的。改良的用意在於把教會完全置於政府之下，使它能鞏固集權的專制政府。彼得對於精神方面的諸問題不大感到興趣，所以他和他的從人們都不理會教會中什麼教義問題，儀式問題。事實上，這神聖教院並沒有釐定法律的權能，他不過是管理教會，在這方面它又被政府所統馭。以後的教會歷史顯出了這教院在延長俄國沙皇的專制制度上，很是個

有效的工具，至專制主義不但是不必要，而且極有妨害。俄國進步的時候，它的作用還是這樣。國家支配教會，使教會在精神方面的發展大受妨碍，這一層以後會提到的。彼得對教會的進攻，乃是俄教會精神腐敗的主要原因。要了解這一點，我們必需完全了解神聖法院的組織和任務。

神聖法院是由各階各級的牧師集合組成的。他們都是皇帝所派，但年限長短不等。這些人共分兩種，有主動的有助理的，主動的是長期在職，永不更改，助理的是準備隨時諮詢，期間是暫時的。院中人數無定，隨時增減都以皇帝的意向為標準。彼得堡、莫斯科和基夫的總監督是長遠在位的。同時喬治亞的監督（*Exarch*）也是永遠在位。彼得堡的總監督被尊為第一位，同時照例他是院長。別的主動分子是四五位高級主教（*Archbishops*），主教和僧院總管（*Archimandrite*）們。他們的期限都有一定的。此外另有幾位白牧師（結過婚的），其中有一個通常是聽皇帝懺悔的人。

神聖法院的助理員大部分都是主教和有勢的牧師。在必要的時候，就向他們諮詢，若不然，就沒有事。神聖法院的總執行是那位大檢察長，皇帝的代表。彼得說這大檢察長的職務就是作『沙皇的眼睛』，他的本分就是看教會中所行所為是否合於皇帝的法令。他在政府所屬的一個部，在政府內閣中有人出席。他除了對皇帝之外對誰也不負責。當這職務的人都是凡人，彼得與別的沙皇都喜歡用有堅強品格的軍隊中人，使他用軍隊紀律來制服就班牧師。在尼古拉第一朝中就是一位騎馬帶劍的軍官卜洛塔索夫伯爵（*Count Protasov*）當大檢察長，威臨着這班教會的羊羣。

大檢察長的權力和任務是特別的大，凡教會要作什麼都得經他許可。沒有他的簽字，教院什麼事也不能作。如若教會通過的條律，在他看來有碍於國家法律，他就把它否決。

神聖法院所管的法律範圍有幾種。它檢察宗教書籍期刊，如遇牧師犯法和犯教就由它審判。這些事主要的都由法院中的教士分子來幹。至於教育財政之類的事，則由大檢察長及他的大批助理員與書記來處置。教會的一切事權集中得非常，連主教都不許到他的教區以外去旅行，若要必先得神聖法院法官的許可。每年總有一萬至一萬五千的案子要處分，而每一場案都得經過無數層的官僚機關。

在各省組織了神聖法院的分支，名為教區法院(Diocesan Consistories)，是仿照神聖法院而組織，用以幫助該區主教的。神聖法院的大檢察長遣派凡人去主持事務。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注意牧師們的訓練，以及結婚離婚諸案件，神聖法院為這總地方組織的上訴機關。

神聖法院提名於皇帝，由皇帝派為主教，同時皇帝又可自由的封人為高級主教和總監督，這些被封的人隨後又派入神聖法院；這樣很明顯的教會的統治階層與神聖法院，一同自願地當了專制皇帝的工具。政府也就利用這班人來專謀自己的利益，犧牲了人民和教會的真正福利。其所標榜的統一，也不過僅在表面而已。

那些比較更有靈性意識的教會人士，厭惡這種為政府作奴隸的現象。十七世紀中對尼康大主教的改良辦法之反抗，至此因政府的直接統治而更加擴展。他們派彼得為反基督徒。這種分裂者及其徒衆越

來越多，而教會的最好的有靈性的分子都往那方面流。這種情形自然更促進國家正教會趨於衰落了。

尼古拉第一之鐵的專暴主義，使全俄知識分子都起而反對專制。雖然遭受了各種各樣的壓迫，這反抗仍然繼續下去，直到一九一七年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剷除了舊的統治。俄國專制主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於是動員所有教會的在職階層及神聖法院來參戰。這樣，遂使教會遭遇了空前的黑暗時期。因為它與政府聯合合作，失去人民的信仰，就這樣為以後羣衆的無神論奠下了宣傳的根基。

在這最反動時期，教會方面的領袖是神聖法院大檢察長，蒲比叶多羅斯切夫（K. P. Polyedonov），他死在一九〇七年。他是個很能幹的政治家，頗有學問。他忠於皇帝和專制政體，且喜愛國教。皇家全體都完全相信他，亞歷山大第三和尼古拉第二的教育都由他一手擔當。

蒲比叶多羅斯切夫一心要保住既存的秩序，對於分支派革命黨和猶太人特利嚴峻，這些人他認為是教會和專制國家的仇人。他倡起高壓的憲法，又組織他的「傳道部 [Missionary departments]，主要的用於替神聖法院作秘密偵探。牧師受命與沙皇的秘密偵探合作，把牧區作革命宣傳的人報知警察。一般的牧師們都要參加這種普遍的壓迫工作。因他們報告的結果，一萬以上的學校教師被捕坐監，或充軍到遠處去。

相信使人民無知，是最好的抵抗宣傳的辦法。蒲比叶多羅斯切夫於是壓迫公立學校，努力組織一種牧區學校制度置於牧師的監視之下。他更利用嚴厲的檢察制，比較受了教育的人們的思想。一般說來，高

級牧師都贊成他，受他領導，來傳佈他的反動政策。有些人甚至於利用懺悔制來偵探，許許多多毫無情情的天真的俘虜，就在這種殘毒的偵探制下犧牲了。這種舉動自然并不大常見，就在高級教士中也有人反對這種辦法，把教會變成專制兇殘政府的姨太太，可是神聖法院很快就把它們壓迫下去。如提可芬斯基長老 (Father Tikhovinsky) 和培特洛夫 (Gregory Petrov) 都是；他們的名字將與歷史而長存是正義的先知是殉道者。

下層牧師們既然從上面得不着什麼好處，而自己又主要的仰賴着教區人民的好意，所以通常對於國家的命令，要他們把職業變成政治上的傭奴時，他們總是消極的抵抗。由於傳統習慣，他們通常對於政治并不感覺興趣，也不理會神聖法院和上層教士的政治努力是什麼。一九一二年參加選舉時，雖然他們之間投政府黨的票佔多數，但那多半是上頭壓着他們幹，并不是自願的。

教會最大的恥辱是前沙皇時代拉士普丁的行爲，教會因此蒙羞被拖下十八層地獄去了。尼古拉和他的顧問亞歷山大天生迷信，老是爲自己和自己的皇位擔心，於是他們就趨向神秘主義。朝中老是請來一些神秘的人物，沙皇的家事都依這人的預言和巫術的消息來處置。有一陣子是一位大言不慚的巫者非力培 (Philippe) 得勢。接着是希力俄得 (Hiliodor of Tzarizin) 作得寵的「聖人」，不久他又被他的敵手拉士普丁 (Gregory Rasputin) 代替了。這拉士普丁混名爲格力席加 (Grishka)。他是個淫蕩無知好色的鄉下人。他有種有力的粗暴的人格和獸性的吸力。這吸力使歇斯底里的女人們都落入他的網中。

他在西伯利亞巡禮，有一次遇見個闊婦人，這婦人將他帶到莫斯科來稱爲『神聖的人』以後逢皇太子害病，皇后本來就經常爲他的健康和生命着急。這次病就有人將他介紹到朝廷裏來。皇后所常患的腦出血，連醫生都無法救治的，不知如何給拉士普丁治好了。因此皇后相信他的神力。拉士普丁又大言不慚的，叫皇后放心說，不但她孩子的命靠在他手上，就是帝國的安全也有他負責。她一直相信這騙子直到他死了爲止。他是被人借着某皇族宗室的幫助謀殺了的。拉士普丁非常狡猾，以此他掙到了作皇后的精神顧問的位置。凡是他爲他或他的親友求什麼，沒有拒絕他的。那些要在政府或教會中作官的人們，於是奉承他求他祝福，以此得他的幫助。那些敢於反對他的人們，總是立刻被他奪了位置。甚至於有人相信大公爵尼古拉，俄國軍隊的大元帥之被遣送去西伯利亞，都是他幹出來的。

因爲容忍拉士普丁這樣胡鬧，教會的名譽於是大受損失。神聖法院中的人們不敢反對他，怕於自己的位置有碍。撒馬林 (Samarin) 神聖法院的大檢察長，因爲不大趨奉拉士普丁的寵信們也被趕走。借拉士普丁的力量，許多無價值的人都當了主教，甚而至於總監督。卽如馬加留斯主教 (Bishop Makarius) 曾於一九〇五年當湯木士克戲院 (Tomsk Theater) 中有許多人民聚會時，放火把那戲院燒掉，害死了許多生命，但借這全能的拉士普丁，他竟作了總監督。他的敵手希力俄得稱他爲『神聖的魔鬼』。全俄人都恨怒他。後來當他被謀殺了時，大家都非常稱快，除了那羣皇帝的私家顧問，皇帝和皇后，他們還是爲他們的『聖人』傷心。教會地位在政府長期的統率奴使之下，既已十分削弱，又遭拉士普丁的無道獨裁，地

位完全失掉了。革命一爆發出來，教會中的好分子都表示歡迎，只有高級教士們習於倚在政府有力的懷抱中，才抱着兩樣意見。它怕丟了自己的權力，所以努力幫助反革命派，因為後者應許恢復他們已往的位置。

從歷史上各種情形下來，教會就變成了一個國家的有力機關，它的發展與俄羅斯中央集權的發展是平衡的。由最初起，教會統治階級就與政治上的統治者聯合着，到彼得第一的時候，教會遂淪為國家的工具。教會既為政府的姨太太，於是所有舊統治的惡名都同樣的加於它身上。教會與國家聯合的結果，在俄國也正如在別國一樣，又是一場失敗。現在脫離了舊日的羈絆，正教已經復歸本來面目了。是不是它還有生活力來證明自己的生存權利呢？這問題，要待將來才能答覆。在目前它已經很快的失去了在羣衆間的勢力，並沒表現出絲毫重生的特徵來。

第四章 俄羅斯的反國教派

從教會和政府方面感受了壓迫和冤枉，又不能依法申訴，分離運動於是乎自然產生了。在俄國可以作合法申訴的機會，比歐洲任何國家都要少些，因此反對國教及分派別的現象在沙皇治下的俄國是常見的情形。

在俄羅斯的反國教派共有兩大支：一是由舊信徒派運動出來，另一支起於自西方來的德國傳道派，且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前章已提過舊信徒派中有一部分莫斯科的貴族，主要成分是城市商人及手工業者，還有更多的是受壓迫的農民。舊信徒派貴族後來慢慢又與既成教會和好，因為對於他們的社會地位和那些與平民分離的教徒來往是很不利的。所以俄國的反國教派只在中層及下層階級發展，和歐洲的反國教徒一樣，同時他們所發生的社會上經濟上的效力也和那差不多。反國教派的較高的道德水平，以及互助和團結，使他們發起財來，不久他們都變成了俄國的大商人，製造家，和銀行家。這些有錢的舊信徒派慢慢的趨於妥協，而窮苦的手工人和農奴分離派則更走極端，以此又分出了許多的支派。這些人絕對不和『反基督』接觸，凡真正的分離者，在戶口調查時不肯報上自己的名，不要蓋了『反基督』的圖章的護照；不繳租稅。若遇官方壓迫，他們就逃徙到邊鄉遠村去避免追及。一種各項都有的運動，顯示出一切

漆黑的反動的，漸發展而成爲宗教的，社會的，政治的激烈主義，差不多就是哲學的無政府主義。在這兒就有了俄國革命運動的曙光，經歷幾百年的苦鬥，終於把反基督的專制政府之可恨的統治推翻了，這說法并不是誇大了的。

舊信徒的派別

只有一位主教保羅 (Paul of Kolomna) 是舊信徒派，他被革出了教會，又被抓住，死於獄中，沒有派出一個人來繼續正教教職的使徒事業。由於這件悲劇，舊信徒派弄得沒有個主教，從而沒有牧師來供奉神祇，主持聖餐等等。怎麼辦？於是有些舊信徒們以爲基督教不可一日無祭師或牧師，提議從國立教會去請牧師，以便推行舊信仰：『即使跟從了尼康而犯教，』他們說：『他們的使徒能力并沒取消，他們還是可以繼承使徒用接手禮來授聖職於主教及牧師們。他們授職是有效的。我們只要從正式教會等回個牧師來照舊禮行事就夠了。』更激烈的分子却又所見不同。他們說：『不，既已丟掉了舊書，既已詛咒了舊的風教，那麼尼康派已是失掉繼承使徒的權利。正式牧師團再也不能說是教會，只能稱爲魔鬼的集團而已。和這種地獄的主者發生關係就是罪，被這種變節的主教授職是污辱。俄國教長如此的詛咒舊禮，而東方大主教都承認他，連那大主教也來參加他們的犯教行爲。教主取消了，正教也就滅亡，再也不能有繼承使徒的人，也沒有合法的牧師。』

爲這緣故，舊信徒派於是分裂。一部分跟着那般統治階層的，稱爲蒲蒲維支 (Popovtsy) (牧師的，) 另一部分稱爲別士蒲蒲維支 (Bespopovtsy) (無牧師的。) 蒲蒲維支派決定盡一切可能方法，從正式教會弄個牧師。他們用賄賂，用收納逃亡牧師的辦法，極盡艱難的，倒頗成功，弄了充分的牧師，來把教會禮拜及聖餐的事維持下去。直到前世紀中葉，他們才找到獨立的牧師，才算了事。這些舊信徒派不知情，以爲近東的正教還是忠於舊信仰，所以就在塞爾比亞和希臘的主教中找人，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找着一個希臘人前波斯尼亞 (Bosnia) 的主教，名字叫阿不落士 (Ambrose) 這人不知爲點什麼事，被君士坦丁的大主教褫奪了位置。他們在比洛克琳尼舍 (Bioko Krinitze) 近俄國邊界前奧大利的地方建立一個富有的修道院；這修道院變成他們的主教的教宮，以這兒作爲管理他們教會的機關。這樣，這般『牧師的』舊信徒派才能維持他們自己，不致於喪失他們的遺教和信仰。

道德謹嚴的舊信徒派後來大發其財，建立了許多修道院，尼菴，學校，和孤兒院等，捐贈它們許多財產。二十世紀之初，他們特別活動；一九〇五年革命後，舊日對他們的限制：如不許建築教堂，不許印行文字及公開宣傳他們的主義等等都已廢除，他們大大發展。舊信徒派與國立教會不一樣，他們的工作差不多都是凡人擔負進行，他們的力量也就在這兒。他們的牧師的作用僅僅在於主持聖餐，以及一些依照教規非牧師等凡人不能辦的禮拜事務。他們有錢，特別是莫斯科的他們，可以把小孩教育得很好，到二十世紀初年年青的舊信徒派頗能將古今鑛爲一爐，一方面遵守古信仰，另一方面又採納西方自由思想與較高的文

化水平。有些俄國藝術之最高尚的產品，如莫斯科藝術劇院，都是這般人弄出來的。在政治與社會改造上，他們和自由主義者是一流，也產生了一些戰士在革命的初期効勞。

和『牧師的』舊信徒派有關係，而構成它與國立教會中間之連鎖的是另一種運動，稱爲愛丁諾維爾支（Edinovertsy）或『聯合教會』。

在一千八百年時，亞歷山大第一在位，政治頗屬自由。有一羣舊信徒派請求國立教會讓他們在莫斯科有自己的教堂，主教與牧師由國立教會派。只要這些牧師按舊信仰舊禮儀去作禮拜，他們就可接納他們，不對他們施用那種照例的反尼康的詛咒。政府認爲這種妥協是一個好機會，可以乘此在舊信徒派當中打一棍，於是接收了這種請求，供給主教，但並不守約給他們預備特別的主教。直到一九一八年，梭波爾（The Sobor）才那麼幹，已經是定約之後一百多年了。

除了莫斯科，別處並沒有幾個自動加入愛丁諾維爾支的，於是政府就來強迫人們加入這種新的教會。在尼古拉第一時代，凡不肯加入這愛丁諾維爾支教會的都遭迫害，都被放逐，他們的教堂被沒收，交由政府的牧師主持，這些牧師就像愛丁諾維爾支教會的牧師那樣做，就是採用舊禮。這對於舊信徒派是很大的打擊。不過有好些人還是不屈服，他們躲在秘密地方作自己的禮拜，叫逃亡的牧師來舉行。

『無牧師派』（別士蒲蒲維支）和原來教會分離得更遠，自己又分成許多派別，有些人趨於非常極端的地步。他們的口號是『逃離世界，不與反基督者妥協』。既拒絕了牧師，他們於是委任了一羣凡人

中的長者們作領袖，這些人盡量按教會成例所許可的範圍來主持禱拜，就是讀經講經，替歸化的人們施洗。這些行為本來希臘正教會就允許凡入中的男子們去作。這些別士蒲蒲維支們進而讓女人也這麼作去。施洗通常都作為是種聖禮，不過關於形式，是各人的意見不同。有些人保守希臘正教會的方法，使嬰兒在水中浸沒三次，但不替他施用神聖香膏，因為不能使他奉聖的緣故；別的人以為成人該在晚上自己投身在急流的河裏作為施洗；另有別人簡直就用自己的手為自己施洗。其他的聖禮若不是完全放棄，就是加以精神方面的解釋。有若干派的人就在一個長者之前對聖像懺悔，那長者當顧問的資格這樣說：『願你的罪得到饒恕。』

由於取消牧師和聖禮，人們遂趨於極端激烈的地步，特別是關於婚姻問題。有些人完全拒絕這件事，主張絕對獨身生活，有些人主張弄姨太太，可以保護肉體上的弱點。但有些人又爭論說，結婚並不是一種聖禮，不過是社會的結合，為了綿延種族而有的。這件事由父母的贊同和祝福，及男女雙方神聖的誓言而變為神聖。舊信徒派的婚姻辦法並不會像一些批評家所猜到的，產生不道德的行為。雖沒有法定限制不許解散婚姻，但因習俗與在舊信徒中流行的家長制度，這種情形也不能為害。在那些獨身主義的人們中間，也常有放縱色慾的事發生，因此而生的反動便是那瘋狂的制慾主義，這情形後來流於閹割，變為太監之流。

無牧師派對於既存社會與政府，比別派更加敵視。由這一派中產生了那種運動，要『逃離世界，逃離

反基督的統治。』最極端派的首領，是一位蒂俄多休士(Theodosius)，時在一七〇六年。他的口號是『逃到曠野救你自己。若是被有權威者追到，你要自焚，否則自殺，這樣你可以掙得一個殉道者的冠冕。』用自殺與火洗來得救的觀念，深入廣大的極端派羣衆的心理。聖經中所說的『天國遭受了強暴，強暴者以武力奪取它，』經他們拿來加以字面的解釋。要使小孩們免於落到反基督者的手中，他們就把他們殺掉，往往全村全家自動地把自己當作焚祭，獻於上帝。他們把自己關在倉庫裏面和房子裏，將這些東西放起火來，彼此互相管住，不許逃出這種試練。有些人奔逃到曠野去，寧可餓死或凍死。據估計總有二萬男女大小是這樣自盡了的，另有幾千死在他們的官家敵人的手中。

舊信徒派多屬於北俄羅斯人，這些人本性就是病態的，頗歡迎這種需要大量犧牲的宗教。老是要逃避那些迫害他們的人，這班舊信徒派越來越往北走，最後才定居在上伏爾加的森林區域，烏拉山一帶，以及白海海岸。另外有一些逃往西南波蘭邊界，由那兒有些又越境到東普魯士，自成一村社的住在那兒，至今不遷。有一部分更不安分的跑到東邊西伯利亞，在高加索與頓河一帶的哥薩克人中找到了新的同道。無論在任何曠野棲身，他們總是組成會社式的小村，在那兒靠着勤苦的工作與合作，很快就發了財。在開發屯殖方面，他們的成績頗足驚人。俄國之所以能把北方與西伯利亞俄國化，功勞還該屬於他們，因為以前那些地方都是疏疏落落，由芬蘭與韃靼族散居着。

加撒琳第二常自以爲對宗教問題有自由態度，甚至於寬仁地允許他們在莫斯科設立他們的村社。

有錢的舊信徒派特在莫斯科附近捐贈墓地，因為他們很特別注意這點：死者要按着他們的信條，埋在特別奉聖，作為葬場的地方。在墓園牆內建立了教堂，圍在牆外成立了許多居留地，信徒們都上那兒去，至今這種地方還是他們的運動的中心。牧師派有拉戈次基墓地 (Raguzhsky Cemetery)，無牧師派有普列歐不拉生斯基墓地 (Preobrazhonsky Cemetery) 都在莫斯科附近。

極端派

一七七〇年，有位攸非繆士 (Furmenko) 派人起來反對居住在莫斯科者的妥協，認為不對。他反對城市生活，認為那是巴比倫。他號召信徒們放棄土地財產，他以為那是使人民淪於安定生活的主要羈絆。他申明說：『土地應屬於上帝，人民只有集體的來使用它，却不可以擁有它。』

他們的口號是『丟下你的父和母，背起你的十字架來隨我走。』以這口號攸非繆士的弟子們吸引了不少的信徒，逃出城市和鄉村去度那遊牧生活。他們被稱為比貢尼 (Pegunny) (逃人) 或司申尼基 (Sheniki) (遊方者)。他們的宣傳毫無疑義的在農民中散布了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觀念。歸入這『真正基督徒』社團的分子們以後都要變為『遊方者』。在歸依之始，要施行『遊方者的洗禮。』在夜裏於人跡不到的地方舉行。他們把自己的護照毀掉，另得一張紙，上面畫的十字架，另有一行文字如下：『這是真正的護照，由耶路撒冷簽發。』遊方者帶着一隻木碗，湯瓢，和一個小聖像。他們都要獨身，可是為着肉

體的軟弱，即有非法關係，也只聽之。他們認爲那樣總比結婚好，「一結婚的人就永遠落到罪惡中去了。」

這一派發展以後，因爲人多了就不能人人都去遊方跑道；並且，因爲他們遊走時必須有朋友招待食宿，於是他們就造成一種「居留人」或招待者，這些人的義務就是供給他們食宿，且保護他們不被巡警撈到手，因爲巡警從政府受了嚴厲的命令，要抓這些「神怪的流蕩人」和那些幫助他們的人們。這班居留人等乃是這一派的新入門，直到他們能捨棄家庭財產，來執起遊方者的杖，才能算是完全個中人。這班人往往等到老了，或自覺年歲將盡時才去遊方。政府用盡方法去剷除這一派，可是遊方者越遭迫害，跟從他們的人越多。在尼古拉第一那極端壓迫時就是這樣。這不過是對於現存社會及其農奴制度，長期軍役，以及官僚式的壓迫之一種不可避免的反抗。這班遊方者是粗型中的革命家，以他們那反基督的哲學，共有土地的觀念，慢慢地損毀了政府和教會的權威。

除了這些激烈的遊方者之外，在舊信徒中還有許多別的支派。有所謂加培爾（Capors），他們相信上帝要賜他兒子的血肉給信徒們吃，在聖禮拜四舉行禮拜時，他們站着拿嘴大大張開，盼望有天使來將那神聖的餐食喂給他們，那是他們的靈魂所需要的。

有一派稱爲莫哈尼基（Mohaliki）（沉默者），他們要求發誓守沉默，要不然就得和那些遊方者一樣生活，也許就是由那一派分出來的。有很多人被捕，但無論受什麼酷刑，他們總不說話。

有一派稱爲尼叶牟厲亞基（Nyemolaki）（不禱告派），這一派否認一切到底。他們拒絕一切表面

的禮拜和儀節，認為聖經不過是一種寓意、理性化了的故事。他們把一切都當作是『精神的』，『靈的』，相信他們自己是生活在聖靈的時代，所有的禮拜和了解都只能從靈的方面進行。

和不禱告派一樣的是否認派 (Denyers)。這一派以為自從反基督派當權以後，一切神聖的東西都已挪回天上，所以只有直接與救主靈感相通，方可以禮拜。以上兩種都是所謂神秘派。

一方面，舊信徒派中間有了這些神秘派，另一方面又有一獨立的支派，全講靈的方面，流播很廣，與上文神秘派相似。這一派稱為黑列士提 (Hlesty) 或基督們。他們和舊信徒派不一樣，從最初起就反對教會的儀式主義，他們的教義和歷史的基督教不同。研究這一派的人們中，有的認為這種教派和從前的諾斯替教 (Gnosticism) 有許多地方相同。黑列士提是鞭打者的意思，因為當他們作他們那種靈的密祭時，常把自己鞭打到瘋狂，所以他們就得了這名稱。他們自己則歡喜稱自己為魯狄波什叶 (Ludy Bozhye) (上帝的人民) 或克力士托夫琴那 (Kris'ovchina) (基督社團) (Community of Christ)。黑列士提派並沒有書，所以他們儘管受靈感，受啓示，毫無限制。他們說：『我們必需要讀的生命之書就在我們心裏。』按他們的傳說，真正的真理曾於彼得大帝時代由上帝親自帶下凡塵來，上帝降臨到伏拉底米的一座山上，在那兒取了人形。以後他的名字叫作但以理非力拍維支 (Daniel Philippovitch)，這人自己說：『我就是先知們所宣揚的上帝，第二次到人間來拯救人類，除了我之外，再也沒有上帝了。』

但以理是軍隊中一名小兵，開了小差之後，他就稱自己是『萬軍之主』的新的化身。據傳說在他一

百歲時，他以理生了個兒子，就是基督，生後但以理就回天上去了。這個兒子的名字叫作伊凡蘇士洛夫（*Ivan Subov*）是那屬什金家族（*Narishkin Family*）的一個農奴，但他作了這一派的大先知。他挑選了十二個使徒，定了十二條誡命，這誡命據說是『萬軍之主』就是但以理非力拍維支交付給他的。據黑列士提的傳說，伊凡蘇士洛夫，那第一個基督挨了鞭打，受了迫害，被釘在十字架上受了兩次酷刑。可是每次都重新活轉，仍然住在地上，直到末了，他也升天和他父親合而為一。黑列士提派相信人人無論男女都可以成聖為『基督』或『上帝的聖母』。只要有聖潔的生活就可成聖，這一派中已經是產生了不少的基督了。他們的誡命是禁慾的信條，不許喝酒，不許參加筵宴婚禮，不許結婚和有性行為，不許偷盜，也不許發誓。

密密不使人知的祭儀，儀式中的極度興奮與狂歡，就是他們的主要禮節。在晚上他們穿着白色長衣，聚集於幽密之處，組成一個圓圈，參加的人都唱歌旋轉，起初還數好節拍，以後慢慢增快，一直弄到後來大家疲乏發狂。歌士底里的男女們震顫，怪叫，啼泣，這種現象就認為是聖靈附體的表示。有時候這種夜晚的密祭，感情的興奮，會引起不道德的行為，這是可能的，就因為懷疑這點，政府就壓迫他們。黑列士提的辦法如此吸動人，漸侵入修道院尼菴之中，甚至大家貴族的居室及朝廷中也有這種情形。平民中那無生命的正教，高級社會中那無生命的懷疑主義，使在朝在野上下人等都接受了這種教派。革命以後黑列士提仍然存在，現在蘇聯各地特別是鄉村，也還有這樣的團體。

司卡孔尼（*Skakuny*）（跳躍者）也是黑列士提一流的宗派。首先他們出現於彼得堡，起源則由於國

外的影響，最初只在芬蘭人新教徒中盛行，後來俄人也來仿效。這班司卡孔尼也是唱歌跳躍，弄到自己發狂的地步，也有性的放縱行爲。按他們的規矩，赴秘密會的人該是一對，等到大家都到了狂歡失神的時候，大家就走到黑屋子裏去紀念『對基督的愛』。政府調查了這些派別之後，察出其中兼有禁慾和縱慾兩種。禁慾者是一班教友會的人，照他們的約法，他們的禮拜只是『唱神聖的詩歌，讀聖經，彼此行禮，表示友愛，彼此撫慰，表示基督徒的仁慈；同時有那種牧師受聖靈的感動，起來作虔聖的演講，最後就是禱告，身子震動，跪着，叩頭，哭泣，咕噥，呼喊，依受演辭所感動的深淺而異。』另一團多半是年青人，並沒有什麼神秘意味，不過在宗教的外表上，作縱情縱慾的舉動。這些派別組成秘密的居所，黑列士提稱之爲柯芮布（*Korobas*）（船），每個船中有一男先知或女先知作主持者總理全體的是一位『基督』。

黑列士提最近又分出一支，名爲削洛巴次（*Skolopats*），在一八五〇年才知名。他們是公然共產的，一切東西都是公有的。

卜力亞桑雷（*Plasunny*）（*Plasunny*）（*Plasunny*）也是和黑列士提有關係的。表面上他們還是屬教會的。此外還有別的支派，都有同類傾向。

還有一派，必需講到的是那班禁慾派，自殘身體的太監們，他們叫作司科卜齊（*Skoptsy*）（也稱太監）或『白鴿』，像他們自己稱呼自己的一樣。這一派全與黑列士提和司卜孔尼派的縱慾主義相反。他們在一七七〇年出現。創始人是彼得格勒的黑列士提社團中的一分子，一個不識字的農夫名塞力凡諾

夫(S. I. Lovga)的他自稱是萬神的神，萬王之王。』他到世間來，要以信徒們的保護和幫助，建立彌賽亞的天國於俄羅斯。塞力凡諾夫除了自命爲天上的聖者之外，又自稱爲『俄國的沙皇』，因爲他是彼得第三的化身，來恢復他那被加撒琳第二篡奪了的寶座。司科卜齊派的基本教義，就根據着幾句聖經，加以字面的解釋。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節就是他們的信仰與行爲的根據：『因爲有些太監，是天然在母懷裏已經就那樣子的；有些則是人工作出來的；有些人則爲了天國的緣故，自願獻身作太監。誰能忍受的誰就可以那樣作。』

他們認爲人類第一對父母的肉身結合就是『罪惡的淵源』，他們宣傳自戕，也那麼作，相信以此借手術的行施，他們可以達到完美神聖，純潔到和天使似的。他們熱心宣傳，召集信徒，不顧一切阻礙。像俄國大部分的諸派別一樣，司科卜齊也是極樂世界派，他們相信基督會來，白鴿的統治將到，他們的信徒將增至十四萬四千人。他們熱心的要完成這個數目，盡心竭力不顧艱難，以求達到目的。

由於警察們老是監察注意他們，於是他們也就秘密組織起來，和黑烈士提派一樣，也稱自己的住處爲柯茵布。彼得堡的住處，有一個『基督』管理着的，稱爲是『御船』(Royal Ship)也是像黑烈士提派穿着白衣，旋轉跳舞，一直弄到瘋狂地步，女人也可以參加這派，和男人有同樣地位，有時變成重要人物，被稱爲『上帝的聖母』。他們的手術便是將乳房割去，使她們不能餵小孩。這種血的典禮在夜間在秘密地方舉行，舉行的時候總是乘那個犧牲者到了最發狂的地步才動手。司科卜齊派通常都有錢，彼此相助作

買賣。

表面上他們還是遵從社會秩序。當他們還沒受剷刑時，他們有的也娶妻生子。用刑之後，自然他們那柔弱無力的面孔和女性化的嗓音立刻使人認出來。他們會賄買警察，不被抓去。凡有洩漏他們的消息的，就要被他們殺死以爲報復。革命之後，不久起了一種運動，反對身體上的殘毀，把聖經上的話加以精神方面的解釋，要把司科卜齊派變成一羣自願的獨身主義者，停止這種野蠻辦法。他們雖沒有完全消滅，但是社會情形却已大變，使他們不能如何發展並維持舊觀。

十七世紀是宗教運動產生得最多的時代。那時還有好多派別，在教義上頗類似貴格會（Quakers）
 俄國得荷里波派（Dukhobory）（聖靈的鬥士）大概也是由黑列士提分出來的。托爾斯泰聽見了他們的共產主義觀念，又聽見他們的天國在人心裏的教義，頗對之發生興趣，他於尋求真正的宗教時，就採取了這種共產觀念。得荷里波派相信上帝與人不能分開，如果和人離開了，上帝就不能存在。三位一體就是記憶、理智和意志。他們否認那種超自然的生活，要建立樂園在地上。他們所敬拜的是人心中上帝，他們的禮節就在於恭敬的鞠躬，彼此行禮。在起初，他們也有他們的『上帝的聖母』許多人也享過如黑列士提派中『基督』的尊稱。他們不承認聖經的權力，而相信活在人心裏的書文。他們是蔬食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尤其是共產主義者。他們反對國家，故常遭壓迫。托爾斯泰幫助他們，因此有許多逃到坎拿大去，在那兒他們很發財，生活也多是以共產聚居式的。

革命既攪動了正教會，同樣的它也破壞了這些派別衆多的黑暗工作。在他們之中，也弄出了青年與老年的爭鬥。舊信徒中的青年輩願與正教會中的改良者合作，老的一輩却不許與梯洪派（Tikhon Faction）的反動者握手。不過一般的說來，舊信徒派已都失了舊日那種奮鬥的動力。他們的敵人國立教會也和他們是一樣的軟弱。並且，在城市中的舊信徒們，本是有大富商製造家供養，於今失了這班人的支持，他們的居留地不免窮荒起來。他們並沒有什麼復活的機會了。但是，凡研究近代俄國的人們，若要研究其背景，就不能不注意這些派別給與民間的重大影響。

傳教派

十九世紀初葉，當亞歷山大第一在位時，他很對傳教派的虔敬主義表同情，對於其他派別也算寬大。於是神聖法院就印行了白話聖經。同時大英及國外聖書公會所印的聖經傳播甚廣，使傳教運動得以推行。目前俄國的傳教派已有五六百萬信徒。他們的起源和精神，都與上文所述的那些神秘派或理性派不一樣，有區別之必要。

傳教派的最早者爲莫洛干派（Molokans）（吃牛奶的人）因了他們在禁食的時候吃牛奶而得名。正教會是不許這麼幹的。

貴格會中教友有拜訪了莫洛干派的，說在許多方面，俄羅斯傳教派的信仰與他們貴格會中的相同。

莫洛干派奉塞門洛夫(Semenov)和維倫丁諾夫博士(Dr. V. I. Ponomarev of Moscow)作他們神靈的長老。前者是傳教派在俄國的第一個殉道者，於十六世紀時被殺於塔木波夫(Tambov)。後者當伊利沙伯在位的時候，感受了西方新教運動的影響。維倫丁諾夫博士的聖經摘要，變成了宗教教科書。莫洛干派的工作是一個叫作西門烏克林(Simon Ushakov)的農民所作的。他在前世紀初葉，他宣傳鼓動，反對正教教禮，號召信徒們來過精神生活，作一個『精神上的基督徒』。烏克林攻擊一切的聖禮以及一切有形式的教派。他認為聖經是開啓默示希望的源泉，只承認它的寓言的意義，而不從字面上接收它們。對於當時的社會制度，它和得荷波里派差不多是一樣痛恨。他聲稱一切人類都是平等的，不應該有貧富，不應該有所謂民，不該有奴隸主人這種分別。戰爭，發咒，軍役都反乎上帝的旨意，脫離軍隊生活乃作正經事。在危極的貴族平時，莫洛干們可以服從君主的統治，但只在神聖律法的範圍許可內去遵守他們的規條。烏克林取得信徒數千人，亞歷山大對他們頗寬大，并允許莫洛干派所請，讓他們在伏爾加與道達省(Taurien Province)邊區居住。以後迫害繼來，他們逃到西伯利亞去，在那兒他們至今還是聚族而居；另有些則已逃往美國。由於他們的和平的宗教觀念，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中莫洛干社集中了許多人，本良心所驅使的反對世界大戰。

莫洛干派後來慢慢消滅，而為俄國的施洗派或浸禮派運動，這一派於十八世紀入俄，主要成分是德國移民中的虔敬分子，司屯派(Shundists)，以及德國的浸禮派。這些浸禮會的傳教師們又努力，又有組織，

又燃燒着一種先知的熱情，不久就由那些隨隨便便的莫洛干人手中把宗教事務管理權奪了過來。結果是凡有莫洛干人聚會的村社，也必有一個浸禮會的教堂。

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間的革命運動，使傳教派所受的壓制漸漸解除。於是傳教派乃進而對正教會作宣傳工作，這使後者大吃一驚。其後因為正教會內部分裂，同時因為共產黨的反宗教宣傳，倒反幫助他們進展得很順利。

反宗教的宣傳家們走到村中去，總是有很多歡迎他們的聽眾。當他們一離開，牧師們就被趕走了，正教會的教堂作了俱樂部。可是遲早總有一個巡遊傳道師，浸禮會徒，或別個有同類信仰的人跑來講什麼得救的道理，宣傳他的所謂『真正的福音』。幾個月之後，那種表面上接受了共產黨的無神論的村社，因為所見不深，於是又高唱起一般西洋人所習見習聞的福音書讚美歌來，不過都用俄國文字而已。

這班神聖的遊歷者所俘虜的正教教徒不少，大著成效，弄得正教的法院在一九二五年開了個特別會議，討論這困難情形。大會中列舉出許多理由為傳教派成功的原因，主要的一個，是正教會本身的解組。它設立起一個國內傳道部，來詳細考察這問題，並且研究傳教派的方法。正教大會所列舉的理由，顯示人民為何信從傳教派，其中有一點頗有意義。它指點出傳教派，降臨派諸如此類所持的教義中，採用了『與共產黨觀念相同的社會的與政治的口號，起初他們這樣宣傳，曾受壓迫及迫害，現今在新政府之下，他們可以自由宣傳了。』

十年之中，傳教派運動在俄國勝利地進展，不受正教的妨礙，也沒有遭蘇維埃政府的壓迫，直到一九二九年嚴厲的憲法通過了之後，他們就受了限制。也許他們免不了就得倚賴着侵略正教而維持下去，但不是永遠的，同時他們中間的年青人們，還該好好地訓練。他們的有些領袖人們倒也承認這一點，但他們還沒有肩負這項工作的準備。

俄國的浸禮會却不能維持統一，免不了要分裂為兩大團體。浸禮會有位領袖卜洛罕諾夫 (T.S. Prichanov)，他是從莫洛干派歸依過來的。他覺得浸禮會這名字是外來的，而它的教義與組織都不大與俄國人的心理相合，於是他就來自己組織一個獨立的教會，與浸禮會分開。這一派現在稱為傳教的基督徒的組合 (Union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s)。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九年間，宗教宣傳全無拘束地活動着，這一派也飛快地發展了。成立了一個有效的組織機關，有一個出版部，一個訓練學校，以及許多地方組織。浸禮會本身也設法改良組織，雙方的人數發展，現在差不多平衡的。莫洛干派從前雖是極其強盛，現在却不能迎合時代的要求。他們已經失了那種青年熱忱，且又無組織，無領袖以領導活動。

除了這種傳教派之外，又有所謂第七日降臨派 (Seventh Day Adventists) 新以色列派 (The New Israel) 以及別的團體。一切諸如此類的派別，都乘着沙皇倒了之後的自由時代，大大地發展。蘇維埃政府之所以容縱這些分支派，理由是很明顯的。在舊統治之下，所有的分支派都遭迫害，有許多人都被監囚起來，或放逐到西伯利亞，與這些現在當位的革命家為伍。在放逐期中，共產黨頗能了解這些精神上的

革命者，舊制度一倒，共產黨即位，他們自然是對這些分支派表示同情，同時也要得他們的擁護。（譯者按：當時蘇聯實因外侮內憂，無暇來推行這種廣大而深刻費力的反宗教運動，在當時是首先建立自己的權威和信仰更要緊。立刻的積極的普遍反宗教，是等於反俄國的廣大農民。）

此外，又因為分支派中有些共產主義的傾向，所以政府也因此容納他們。蘇維埃政府司法部早年所發的文告中說：『這些支派雖然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使他們的共產主義觀念着上了宗教的形式，但他們却很快的接收了蘇維埃政府之一般普通的社會條律，而且組織方面參加了蘇維埃各級組織，成為農業的核心。蘇維埃機關對於這些組織的任務，主要的在於使這班共產主義組織仍取原來的習慣和形式，作為工業的農業團體，使之發展，且以科學及高級技術把它們武裝起來。等他們以後取了更高級的形式時，它們就變成一種實例，使勞苦大眾知道共產主義在他們中間是可能的也是有利的。』

那時以後，對於分支派的容縱態度已經大大改變。傳教運動的飛速發展，在有些地方頗擾亂共產黨及青年團的工作。並且這些支派們常常對於政府的農村集體運動不熱心，且對之仇視。這理由是很容易懂的。他們大部分都是很有錢的，比那些不屬於他們的宗教團體的農民實在富得多。所以要他們奉自己自己的田地去加入集體農場，乃是這班人很大的損失。他們反對政府的計劃，在受了壓迫的時候就宣傳一種理論，說他們的宗教信仰，不許他們和那班癩神的人坐在一起集會，他們念出詩篇第一篇來作藍本。末了，他們承認組織集體農場，但只肯限於他們自己宗教團體中的人們，政府又不許這一着，一定要有非分

支派的集體農場，勞苦農民也可加入。爲了這些原因，這些分支派和政府鬥起來，有時就得對他們採取高壓手段。由於這些事實，也由於它們之飛速的發展，政府就改變了政策，對宗教宣傳不予縱容。一九二九年四月，憲法修正條通過容許信仰宗教的自由，却不許自由宣傳宗教。這修正條又禁止教會機關有特殊組織來作社會的和教育的事業。

當這種政策起了變化時，傳教派的組織機關遭了封閉，出版停止，訓練學校也關了門。現在他們的行政機關已經稍有改良，要集中起來，重行開始活動。現在只在首都有一個小而有力的管理部，但無地方組織。傳教派於今再也不能像憲法未改變時那麼自由的作公開露天的演講宣傳了，不過在他們的小禮拜堂裏，還是照樣作傳教講道及施洗的事。就觀察中所見的來說，參加禮拜的人也不算少。目前已註冊登記的浸禮會及傳教的基督徒團體共有三千左右，他們正在向全國四面八方找活動的範圍。

政府對付這些分支派時有一個問題，就是後者對於軍事訓練與服紅軍軍役的態度。在舊統治的時代，這班和平主義者算不了什麼問題，政府總是加以殘酷的迫害。內戰時代，蘇維埃政府就碰着了這班良心所驅使的反對者。本來憲法關於這一點是有了確定的明文的原則。上一切人民需服軍役，不過如有例外，則依人民法庭的判決而定。有了這種良心主張的問題時，法庭就留心到這反對者的本教會是什麼。有那種教會在戰前是取無抵抗主義的，那麼它的所屬教友就可免役。因此許多的浸禮派教友不能倖免，爲的是浸禮教會既不勸徒衆抵抗參加世界大戰，那麼他們不能對於參加紅軍發生良心問題。最近幾年來，

政府對於良心反對者越來越不肯稍示寬大，已經被免了軍役的人們，現在都被強迫加入軍隊服勞，但是不帶武器。政府怕的是這麼的寬待宗教分子，會鼓勵那些本來並非和平主義的人們。

俄國的傳教派所欲對付的中心問題，就在於如何能使舊時代的宗教適應於這機械時代的活動，經得起近代自然科學的打擊，這也是全世界傳教者的問題。在俄國，他們雖有暫時的情感方面的成功，但他們沒有訓練的學校來造成領袖人才，使與政府那些能幹的宣傳員相抗。大家不可忘記，如今在蘇聯，凡至十二歲的小孩，都授以最進步的進化科學。這種觀念，當然對於這些分支派神學家的古氣昂然的教理是不能兩立的。傳教派對於這點威脅却很忽視。他們之間沒有人能夠把『聖潔西門』的福音教訓，與工業時代的科學要求相調和的。如若傳教派的基督徒還要發展下去，他們必須將這麼一個困難的公式造出來才行。似乎是他們所要作的意見的調整，要比西方諸國的基要派的命運，還更使他們痛苦。

第五章 反宗教傳統的起源

俄國的宗教有它不可動搖的傳統，所以無神論也是一樣。過去，這種無神論並不那麼彰明較著，斷然地稱自己為無神論，如今日的共產主義似的。很久很久，他們是十分小心，不冠上無神論的名目，而用『啓蒙』、『自由思想』、『自然神論』、『人文主義』等等來作掩護。但主要的，這些派別運動都反對舊日的神衆說，而代之以理性、人道、和社會革命的觀念。

俄國正教起源於東方及斯拉夫族的異教遺風，而無神論却完全是西方的產物。在俄國的無神論者被稱為西方派 (Westernites)。俄國的無神教思想源於英國的自然神論及法國的唯物論。可是到了俄國，因國內社會政治的特殊現象，這些觀念都順着它本身的邏輯發展到它的結論去了。俄國人的脾氣不肯停在半道上，不歡喜妥協，不歡喜將舊廢的東西和新的理想和在一起，像英國人似的。俄國人的脾氣很喜歡把舊的毀了，即使他還沒把新的試驗好，也要那麼幹。在性質方面，他們就是破毀偶像派，不過不如法國人那麼容易衝動而已。

布塞維克的反宗教運動，雖然它的哲學來自國外，它的組織也是國際的，實際還是帶着許多俄國人的根本品格。它公然稱自己為別士波什尼克 (Bezbozhnik)，即『無上帝的』。共產黨藐視西方那種不真

不假的情形，把無神論藏在『自由思想』、『不可知論』、『人道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名詞裏。

無神論的觀念常有它自己的淵源。從前曾經被稱為無神論者的人，現在都不管他是這麼一個。所以蘇格拉底因為不承認舊神，定為無神論者，要處死刑。可是我們知道，他不過是要喚起人民，來有意識地考慮到生活及其道德目的。他乃是古典的唯心派哲學的創始者，這哲學由他的弟子柏拉圖非常精妙地完成了。既是個唯心論者，他就不能稱為無神論者，因為依共產主義的理論，無神論不但否認上帝，或羣神管領着宇宙，且拒絕一切超自然的，一切唯心論的哲學，由蘇格拉底到柏格孫。

如若無神論僅指不承認神，則印度教的梵教制度(Brahma system)與佛教都可稱為無神論，因為這些宗教都注重自我訓練，及不承認有一個超於自然的上帝。可是我們總不能說任何宗教的信徒是無神論者，即使以梵教的唯物主義，和佛教與婆羅門教的汎神論都不成。

俄國無神論的國外來源

當十八世紀下半世，公開的戰鬥的無神論創始於法國，作法國大革命的先聲。在它之前，還有那比較小心的英國自然神論，這種理論不使上帝和宇宙有直接的接觸，對於宇宙，他除了是『第一因由』之外，什麼都不是。在自然神論中，神學理論步武着政治哲學。自然神論者和上帝的關係，等於英國民主政治對於在憲法限制下之英皇的關係，這種制限即十七十八世紀中所鞏固的建立起來的。皇帝既把自己專制

統治的特權讓與國會了，自然神論者也同樣地把上帝當作一個任由萬物，依自然法則以自動的創造主。自然神論者想要在人類的教義中產生出一種自然宗教，這宗教不需要任何禮拜、儀節、任何奇跡與啓示，這樣，他們可以在科學的基礎上建立起對上帝的信仰。

霍布士(Thomas Hobbes)創出一種純物質的宗教觀，以爲這觀念始源於對自然的恐懼，由此遂產生了一種對於自然力的神人同形說。由此而生的拜神舉動，變成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同時宗教發展到最高形式時，就成了政治生活的一方面，爲着國家的利益而受管理。霍布士的宗教的唯物論來得很苛刻，而赫伯特爵士(Lord Herbert of Cherbury)却柔和些。這人號稱是使自然神論構成一個系統的鼻祖。他舉出五個要點：即上帝的存在；禮拜的義務；悔罪的必要；賞與罰。勃朗特(Charles Blount)爲十七世紀下半世的自然神論學家，又把英國自然神論的妥協性推廣下去，承認奇跡的可能，以與正教觀念相合。不過，他削減了超自然界的意義，以爲它只是宗教上不可少的東西。他認爲基督教及其教義乃是社會進化的產物，及普遍的對自然律的反動作用，這樣，他使基督教有了合理的存在理由。

英國的自然神論運動對於法國十八世紀的那些啓蒙哲學家有很大的影響。在英國這種自然神論成爲一種護教的理論，被用來適應牛頓的物理學以及一般的近代科學，而在法國則因社會背景不同，又因那強有力的封建教會，遂使法國自然神論轉爲反對有組織的宗教的武器。

法國之最著名的解釋傳播英國自然神論者就是福祿特爾(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

（那位公認的法國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的大宗師，他的影響散布國外，他去到普魯士，使普王腓特列第二（Friedrich）讓他在他的朝中講學，同時福祿特爾主義在俄國上等階級中成爲一種流行的信仰，以後會提到的。

法國革命家們尊福祿特爾爲國中自由思想的領袖。他們把他的遺體搬入萬神殿中（Pantheon）去，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以下的文字：『他與無神論者及瘋狂者戰鬥；他主張解放；他在封建制度與奴隸之前，宣傳有天賦的人權；他教訓我們去得自由。』此處雖然說福祿特爾與無神論戰鬥，却不如說他爲那種理論修好了路程。歷史中少見有這麼強大的腦力能够以那麼多的諷刺，那麼多的破壞的批判，來攻擊有組織的教會，來培擊假冒爲善的牧師階級。『他手中的筆，就是謾罵默德在西方的刀。』賈士特爾（Joseph de Meziere）爲法國革命時代之有力的評判家，他責備福祿特爾，以爲他用那瀆神污聖的思想毒害了法國人的腦經。所以福祿特爾雖反對公開的無神論，擁護『第一因由』的必要，實際上還是由於牛頓與洛克的哲學使然。不但如此，他也不欲破壞上帝的觀念對於無知之流所加的一種限制。

福祿特爾認爲上帝不過是一個方便而不可知的假設和道德的需要。他說：『要否認那永在的形學家，未免太蠢。但這位形學家究竟何在呢？在一個地方或無所不在，或不佔據空間？我什麼都不知道。他由自己的體質創出了萬物麼？我不知道。他無質無量的無限大麼？我不知道。我所知道就是必須要對他俯首，公正正的作人。』他只承認到了一部，就退而入於斯賓諾沙的觀念，以爲上帝與自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東西。根據這種理論，世界依其內在的法則而運行，人不過是永遠被決定了的代理人。在他的哲學字典中，他說自由意志是神學家所自造。他說：『人類主要的還是機器，依永不可變的法則的制定吩咐而動作，由必然的因果的鐵鏈而行動。』

福祿特爾在其悠長而活動的生命中寫的東西，卷帙繁多，其中的思想大不一致，由實用的有神論，至模模糊糊的汎神論都全。他是他的時代的寵子，第三身分的利益的代表人，也是它的理論家。他與羅馬天主教會爭鬥，稱它是不名譽的 (Unlabeled)，而同時他又保存宗教，作為抵抗統治階級的專橫暴虐，以及羣衆之無政府狀態的武器。因為他是有錢人，他是很怕羣衆的。這可以說明他的主張：『如若沒有上帝，就該造出一個來。』

並非所有的法國啓蒙哲學家都把上帝當作理智與道德控制來承認。所以拉馬提叫 (Lamotte) (一七〇九——一七五一) 完全否認人類的快樂需要宗教。他也是普魯士王腓特列第二的寵人。在他的有名著作人類機器 (The Human Machine) 以及他的靈魂的自然歷史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oul) 中，拉馬提叫採取了笛卡兒的理論，說動物是機器，以此比類，他達到他的邏輯的結論。說人類既是動物，那麼人類必也是機器。拉馬提叫說：『這種強有力的類比，強迫一切科學家和真正的評斷家承認如下的事實：那般驕傲而虛偽的生物既不能以「人類」這名詞來顯出什麼不同，更不能以驕傲達到這目的；它主要的還只是立直了來活動的動物機器。』在診斷『靈魂』時，許多神學家都說它是有神聖來源，且能永

生不滅的東西。而他的結論則說靈魂乃是一種思想的作用，不過是種特殊質料，與電力同性質，能活動，能有吸力的。至所謂事物的『第一因』即自然神論的上帝，如若是有話，拉馬提叫以為完全與知識不能相容，而是在實驗科學的範圍之外的，只有這種科學才能供給真實的材料。他以為無神論可以使人快樂。『如若無神論能傳佈普遍，那麼一切宗教都必遭破壞而消滅，以後就再也不會有宗教神學的戰爭，宗教的戰士，那些令人可怕的戰士，就會沒有了。於是被神聖的毒藥浸染了的自然，才能恢復它的權力與清潔。』拉馬提叶相信自然的道德，而反對宗教的戒律。他比福祿特爾勇敢得多，但因此他被牧師們壓迫得很利害，不得不逃走保命。他逃到腓特列第二的朝中，在那兒一直住下去，到死為止。

在革命前的法蘭西，所有的輝耀特出的思想家中，底德羅 (Denis Diderot) (1733—1784) 站着主要地位。他是有名的法國百科全書的編輯負責人，同時他也就獻上他的畢生精力智能於這件偉大的事工上。據說他是個手工業工人的兒子。『他肩負着十八世紀像古代的阿提拉士 (Attila) 肩負着全世界一樣。』他也被稱為是法國革命的第一個先鋒。當他的同時人福祿特爾等正在以知識自滿而底得羅却獻身於那偉大的共同目標——百科全書，隨後這書就變成了法國革命之知識的衝毀機。它以其堅定不變的批評，以其提倡實驗知識，摧毀了教會的暴虐，及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底得羅的幸運全與俄羅斯緊密的聯繫着。加撒琳第二當其正在風行自由政策的時候，有力的幫助他。見百科全書禁止在法國印行，她就提議將它拿到俄國來出版，她又給底得羅很高的年金，讓他繼續去作編輯工作。教會限制百

科全書，也有它自己的理由。直接的或間接的，百科全書中的文章總是攻擊教會制度及其教義。有許多文章是底得羅自己寫的，另有許多是由底得羅鼓勵人寫的，也有他編的。底得羅的腦力真是無限，它本身就真是百科全書式的排列着。他感覺到機械的唯物的缺點在他的與達蘭貝爾談話（*Conversations with L'Ambert*）中，他已經指出唯物論辯證法的問題，百年之後，馬克思派就把這工作擔負起來了。

底得羅起初受的是耶穌會的訓練，教以基督教理的基本觀念，末了他變而為無神論者。不過他並不是個熱心的戰鬥的無神論者，他以為羣衆的程度還不夠。他說：『國內大多數人民還是會停留在無知的情形中，被恐懼所浸染，因而迷信無神教只能老是少數人的，它永不能成為大批國民所接收的道理，也不能被智識低下的分子所了解，而保存下去。人們還是會相信上帝的存在，而它的舊根也不會消滅。如若這些舊根就這麼自由生長下去，誰也不知道將來會生什麼可怕的根芽。』共產主義無神論者却不這樣。他們在羣衆前廣汎的宣傳無神論，並不怕有什麼道德上的破壞。

法國無神論者中間仍然對於共產主義思想有影響的，是霍兒巴哈男爵（*Taron P. A. d'Holbach*）

（一七二三——一七八九）他是底得羅的好友，同時也可以說是他的門徒。他本來是個福祿特爾派的自然神論者，後來以底得羅的幫助，霍兒巴哈自成了他的彰明較著的無神論，他以自己的博學文才，熱心的宣傳這思想。他的主要工作『自然之統系』（一七七〇）（*Syst me de la Nature*）可當作是法國唯物論思想的自然產物，它被稱為是『唯物論的福音』以及『哲學的紅帽子』這一劃時代的著作擦起了

天主教的恨惡和恐懼其中根據於對宇宙之唯物論的假設，收集了十八世紀所有的爭點，而加以系統化。其評判不但反對了封建宗教及其教會，且及於整個舊政治的本身。莫雷（Morel）形容霍兒巴哈的著作說，他把百年中各批判家零星的炸彈集合，而成爲整個革命與破壞的機器。一般人都承認沒有這麼第二部著作會在人類心腦裏掀起這麼偉大的革命浪潮，其影響存留至今不滅的。列寧提議把它譯爲俄文，作爲在蘇聯作反宗教宣傳的武器。

這本書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先定原則，認爲宇宙自有一種永存自在的物體，一種機械的動的物質，依此，他建立了唯物論的範圍。第二部是著者自己的無神論思想，同時批評現代宗教哲學的理論。在霍兒巴哈的統系中，人是自然之一部分，不過組織得更精更好。並沒有上帝，沒有永在的靈魂，因此也無所謂君王皇帝的神聖威權暴君與牧師把人民封鎖在無知和迷信中，而他們自己，以及一切的錯誤與欺騙，却來造出許多罪惡，大自然對於這罪惡，必須加以救濟。這部書鼓勵人們要有勇氣及信仰人類的理性，能合理的根據社會效用和服務，以建立生活。這就是霍兒巴哈的使命，以後他在別的著作中，把這種使命通俗化，讓它可以廣爲流通。這種要使唯物主義無神論民治化的努力，不但使政府和教會又恨又怕，乃至那些啓蒙的哲學家都吃了一驚，他們覺得這位通俗的自然之統系的作者未免太過。福祿特爾來批評這部書，但越這麼作，它越流行。底得羅留心注意於這種爭論，並在一七七一年他寫着說：

『火焰已飛揚起來了。自由和獨立的觀念，起先只藏在少數有思想者的腦中，現在却已成立起來，公

開的被承認了。每一時代必有他本身之獨特的精神。我們這一時代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對於迷信之最初的攻擊，是騷亂激動的。那是只要人民敢於攻擊宗教的基礎，那最可怕最尊榮的機關時，就再也不能停止攻擊了。他們既已將震怒的日光射到了天上的御前，那麼不可避免的，不久也就要將它們轉向於地面上的強者，細綁人類，堵塞人類咽喉的繩索，就是這兩條繩交織起來的。若不把兩個都弄斷，就一個也不能倒。」

除了霍兒巴哈之外，另有一羣人也幫助推翻舊信仰和舊統治的勢力。他們的觀念不一，包含由自然神論至汎神論乃至公開的無神論。他們的文獻中有赫非休士（Hepheist）的兩本書，關於精神，關於人（*On The Spirit, On Man*），可是誰的都沒有霍兒巴哈的那麼率直，那麼勇敢。

於此我們考察了法國啓蒙哲學，因為它對於俄國反宗教傳統之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這影響直到如今尚在，雖然它對於宇宙和宗教之機械的解釋，已不合於近代科學，這是共產主義哲學早經承認了的。其中許多理由，特別是批評宗教制度的地方，它的戰鬥精神，都使共產主義無神運動歡迎他們。

俄國啓蒙運動的發端

福祿特爾用口號（*Forasaz Yinfame*）『打倒無恥的人』來攻擊教會，立時不但久遭陳腐正教及教會主義所壓迫而不能思想自由的西歐對之起了回響，甚至遼遠的俄國也聽到了它，且讓它有一短期間

在加撒琳第二朝中興盛起來，其實即在彼得第一朝，也已經有許多自由思想家在接收並擁護西方來的影響。

俄國的宗教傳統本就與那活潑有力的知識活動不能相合，同時彼得第一的教會改革，簡直把教會變成國家所屬的一部，明明白白的用來使羣衆如化於統治階級的勢力之下，彼得自己已不是什麼熱心教正的教徒，他那頑強的品格，不受拘束的熱情，常常可盡量發展，至於沉湎陶醉，這時他們就來扮假面的宗教戲，他自己當『教皇』，他的朝廷作他的『教臣從屬』。這班狂樂的人們就來『舉行神聖燻撒祭』，燒起香烟來代替焚香，用幾根長烟管綁在一塊，捲起來作爲『聖十字架』，『聖餐用酒來代替』，『聖福音書』則用甜酒的盒子。沙皇作這樣辱神的舉動，更使他屬下那班虔信的人們相信他是『反基督』，使舊信徒派越加熱心來推進他們的運動，在彼得時代，這運動發展得極其快。

彼得第一不願國人的反動，一定要使俄國近代化。一般的說來，他頗贊成宗教自由，且同情於西方那合理化的新教。但同時他對於哲學上神學上的諸問題又是門外漢，只好讓自己被那般顧問領着，去走相反的道路。於此我們可舉出很出色的例子證明他不懂休金(Huygen)的關於天文和物理的書，是第一本被譯爲俄文的書籍。不魯士將軍(General Jacob Bruce)彼得的砲兵學校校長，把這本書翻譯了獻於彼得請他出版，彼得令一個叫阿不拉莫夫(Abramov)的，管理國家出版事業，又是他的侍臣之一，拿去出版一千二百部。以後這位阿不拉莫夫先生，雖然會陪着彼得狂宴歡飲過，却這下子良心上痛苦起來，他

叫沙皇注意到書中違教的部分，且建議把這書和譯者都燒死。彼得因此就吩咐停止把它出版，但是寬洪大量地把那譯者赦了。

沙皇雖然對於宗教問題沒有一定的態度，但虧他不喜歡舊的傳統，才使自由思想能在俄國發達。他把那廝開明的人如普洛柯波維支 (Pr. Kopyevich) 者拉入教會來作領袖。這人是烏克蘭人，在羅馬的耶穌會學接受訓練，爲了某種緣故，他捨棄了天主教來替彼得作事。彼得把自己改革教會及近代化的計劃都交給他。名義上普洛柯波維支似乎是忠於正統教。他所批評的是羅馬天主教會，它的迷信，它的迫害近代科學思想等等。當關於休金的天文學那場爭論起來了的時候，他是站在不魯士一邊的。『如若哥白尼的弟子與科學家們能够用可靠的物理數學論來證明他們所擁護的地動說，那麼我們不該借聖經上的日動說來推翻他們，經文上的文字不宜死的去把握，要用寓意去了解。』在他的一首拉丁詩中，他反對天主教裁判伽利略 (Galileo)：

『可恥的教皇，爲什麼殘害那位聖者，

那自然之忠勤的僕人，爲什麼呵暴皇！

難道你不是抱着你的田舍不遭侵犯，

難道吃人的冥河，不還是烈焰飛揚？

你造作了仙仙神神，自爲裝點，

而他勤於其事不相過問；

他的皇座屬於上帝，而你的却是欺詐；

假不敵真時，你就獸狂！

『但是，』教皇講，『民可使由，不可使知，』

這是我的本分，同名異義，

開啓民的知識，是我背時。

哦，黑暗世界的殘渣，野蠻的蠢子！

伽利略的思想如日光之中天，

如山貓之精銳，可憐的，來加以判決！

但，山貓的目力，明明超不過卑劣的田鼠！

這類的批評，雖是用來攻擊天主教的，但也同樣的打擊俄國的正教會，因為就我們所知的休金天文學事件看來，正教的朦朧曖昧與無知的情形，實在比天主教更加利害。所以普洛柯波維支的批評，應該作為一種在某種掩護之下對他本教會的攻擊去了解。他的努力介紹民衆教育和研究近代哲學，可為所證。他博覽羣籍，培根笛卡兒以及當時號稱進步思想的著作，他讀得很多。他所收藏的書籍約三萬卷，這毫無

疑義地對於他的人民乃是一種偉大的文化上的貢獻。要把普洛柯波維支當作俄國啓蒙運動的前鋒，是名實兩符的。

這時代還有一位出色人物名塔提且夫 (Vassily Tatishchev) (1686—1750) 他是一位俄國貴族，富有批評天才及西方教育。他精通霍布士、洛克及貝爾 (Pierre Bayle) 的哲學。他的主要著作俄史溯源 (The History of Russi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一般人都認為太過激了，直到他死後因加撒琳第二的寬洪大量，才得印行出版。塔提且夫也該認為是俄國聖經批評家。他不肯把所羅門的雅歌作為宗教書，說那簡直是愛情歌。彼得很尊重塔提且夫的學問，但是當他與他爭辯宗教問題，自己因為學問不夠，爭不過那頑強的塔提且夫時，他就「用他的御拳打他」那史家這麼說，這是彼得和他的政治家及將軍們爭辯時的常態。

在塔提且夫的歷史中，他指出牧師階級對於俄人的歷史並沒有什麼可稱的貢獻。在教育上，他們什麼事也沒幹。塔提且夫說：「爲的便於抓錢得勢，牧師階級很利於把人民置在迷信和無知裏面。」塔提且夫頗同情自然神論者，他認為理性和自然法則足以領導人的行爲。所以道德不是倚賴於宗教，了解自然法則和有智知，就能產生道德。「是凡違反了自然法則的，上帝安排下了他的懲戒。」凡違背教會規律的不爲罪，而損傷人道的才正是罪！這是十八世紀的俄國開明思想，那時塔提且夫還不是公然的無神論者，但他却是個懷疑派，爲加撒琳第二朝中俄國自由思想的黃金時代打好了根基。

未講到這黃金時代以前，我們還要說到一位與普洛柯波維支及塔提且夫同時的人康特米 Antioch-Kantemir (一七〇八——一七四四)。他這人號稱是聰明，誠實，仁厚，是那新組織的彼得堡科學學院的初期學生之一，後來他奉了外交職務，出使於倫敦及巴黎二處。他既有天才，又與西方接觸得多，故對於教會非常不滿，特別是批評高級教士們他用詩歌來譏笑他們，這些詩歌並沒有詩的價值，但是充滿了尖銳的覺察，且暴露了這些教會職員們知識的低下，與道德的墮落。

受了英國自然神論及法國理性主義的影響，他由神學轉而入於哲學。他說聖經並不足證明科學的真理，默想也不能支配了理性。康特米將法國啓蒙哲學派，特別是把福特涅爾 (Fontenelle) 和孟德斯鳩的作品第一次譯爲俄文，又與福祿特爾通信。彼得第一死後俄國恢復反動局面，對於自由思想頗爲仇視，於是康特米的書籍大遭出版的困難。他又早死了，使他的天才不能盡量發展。

普洛柯波維支，塔提且夫和康特米，都是俄國啓蒙運動的前鋒，都是受了西方教育，同情於西方思想的，他們都很有知識，俄國人民落後，特別是教會方面，他們的目的要根據西歐的路線來改造自己的國家。雖然贊成教育，他們的道德支持力卻不夠強壯，不能公然反對俄國最大的罪惡，使千千萬萬人民痛苦呻吟的封建奴役。同時他們也不敢攻擊俄國的封建專制。他們是開明，但同時也是他們本階級封建貴族的忠僕。彼時俄國還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同時也沒有無產階級來壓迫他們。那時是不能有無產階級的，因爲對於資本主義發展之必需品自由勞動，只可以從農民得來，而農民那時還是被細綁在土地之上。所以普

洛柯波維支，塔提且夫，與康特米三人只能說是溫和的改良派，而不是革命家；不過他們始絡還是動搖俄國正教的基礎之最初人物，而俄國正教又是沙皇專制及封建貴族的基礎。由這方面說來，這幾個人也可以說為兩百年後的俄國革命作了前驅者。讀者一定要記住，宗教信仰及教會權威之削弱，乃是革命的發端。

俄國的福祿特爾派

當彼得第一時代，俄國貴族之西方化的過程，在加撒琳第二朝不但繼續下去，且更興盛。她自以為是一位開明的專制君主，她與普魯士的腓特列第二、奧大利的約瑟第一爭着羅致英俊知識分子於朝廷之中，以藝術家及哲學家代替了前代的優孟侏儒。此時法國不但以時髦及放縱作諸國的供給者，其思想也是極其豐富，別國的開明的專制君主都招待她的哲學家來作上賓。腓特列第二招待福祿特爾及拉美脫理居於波次但 (Potsdam) 加撒琳第二以她能招致底得羅到她朝中來，又經常與福祿特爾、達蘭貝爾 (L'Alembert)、格黎牧 (Grimm) 通信，覺得非常自傲。那時候，格黎牧被稱為是法國哲學的歐洲巡迴店員，最後他住在加撒琳朝中，終其天年。

在加撒琳的保護之下，福祿特爾的風頭一變而為當時俄國知識分子中間的一種運動。他的作品流行極廣，不但原文讀者多，在十八世紀下半與十九世纪初葉，凡他作品譯為俄文出版的有百四十版。若指出

當時全俄所出書共只有八千種，則此數之重要更爲可驚。除了福祿特爾之外，孟德斯鳩、盧騷、赫非體士，以及法國百科全書，讀者也頗不少。

法國啓蒙運動所生的效果，因人而異。在大多數人看來，它的意義就在於使人脫離教會傳統的束縛，於是一般人大概藐視教會，對於禁令和習俗也都漠不相顧。這使得許多教士階級和保守派的俄國政治家大爲恐慌。席黑巴脫夫親王 (Prince Sheherbatov) (1733—1790) 加撒琳時代的人，他的關於俄國的道德墮落 (On the Depravity of Morals in Russia) 把俄國舊道德傳統解體的現象描寫出來。他抱怨說局面糟到不堪，『對於神聖法則的信仰已經由人們心中消去，而神聖的神秘禮節（聖禮）被人藐視。』席黑巴脫夫責備彼得第一說他要洗除人民的迷信，殊不知他是熱心太過，他把彼得比之於一個沒經驗的園丁，他把弱的樹和強的樹同樣的刪砍，要開啓民智，自然要破除迷信，可是這樣的刪除，却已損及了俄國信仰的基本。『迷信減少，信仰也減退；對地獄之奴隸式的畏懼消滅，對上帝及其神聖法則的愛也不見了；因爲缺少別方面的知識，又沒有信仰以爲糾正，道德於是失了支持，而淪於罪惡。』彼得所開的端，由加撒琳踵而完成。席黑巴脫夫抱怨說，『由於加撒琳的作爲，信仰全被毀壞，即毀壞了良心與德行之永恆支柱。』他說她放棄了『上帝的法則之磐石』，而將她的政治與個人道德建立在近於哲學的基石上。

由於誤解法國啓蒙運動，加撒琳朝中的道德墮落情況，可以由一位朝中小教堂牧師的抱怨咒罵看

出來。這位牧師的道德上的勇氣很大，他在講道時說：『要永遠得救，必需倚賴基督的道理，但此道理現在被變爲寓言，當不了什麼一回事；爲我們請求解救，幫助我們，保護與翼蓋我們的人（聖母），沒有人去理會求援；上帝的聖徒沒人尊敬；神聖聖像沒人過問；大家都藐視畫十字架，那魔鬼都見而戰慄的舉動；使徒及神長老等的掌故都被丟開；永有好報的好行爲都被一掃而空；正當禁食的時候，大家吃肉；沒有人願意聽節制肉慾的事；爲死者禱告被人譏笑；自己本是地獄的子孫，反不相信有地獄。』

這類牧師派咒文雖指出大部分的人們毫無疑義地把新哲學當作了一種特許狀，可以人人按自己的意思亂來，但却不能因此便排斥加撒琳時代的福祿特爾主義運動整個的是淫縱蔑神的東西。加撒琳與她的朝臣都不是理論上的無神論者，加撒琳從小本是個新教徒，後來她和那傻子彼得第三結婚，爲的要符合俄國教會的傳統，她名義上接收了希臘正教。她切心的要求知識，真想作一個開明的君主。她把這一點在與福祿特爾及別的哲學家們通信中下過斷言，而他們也捧她爲新時代的希望。毫無問題的，她解除了俄國女人的許多束縛，把她們由長期的亞洲式的封閉中解放出來。她組織了俄國的第一個女子學校，爲未結過婚的母親們建立居所，又建築了產科醫院。

一七六七年她要把教會大加改革，把自己的意見寫成備忘錄，她把它提出神聖法院。她的意見如下：解放一切分離派，讓他們自作禮拜；縮短禁食期間；取消教會中一切迷信及虛偽的奇跡；不許聖像去拜訪人家；減少教會禁食的日子；把教會儀式簡單化，取消以前澈夜不眠的長時禮拜祈禱，改爲短期的禱告和

講道，准許主教們結婚；把牧師的衣服改簡單改體面一些；使離婚容易；遠親及異教的人可以結婚；取消爲死者禱告；以及諸如此類的改革。法院對於這些非常切要的改革都不奉行，告訴她說，任何對於教會傳統的攻擊，必致惹起另一分離運動，擾亂她的寶座，使之不能穩定。她所準備用來改造國家的『聖諭』也遭了同樣的命運。這些論文中反映出孟德斯鳩的法意（The Spirit of Laws）以及其他哲學家們的思想，這些都是她從她的法國哲學家朋友們學來的。以後她被法國大革命駭壞了，禁止將這些『聖諭』出版。她開始才知道這些自由思想於她的專制權威有害，於是她的開明的自由主義很快就變爲極黑暗的反動。同時她也越來越虔敬，自稱是『神聖的加撒琳』。

法國哲學被禁止了，她轉而注意共濟會（Masonic Order）也加以壓迫。這是免不了的，因爲俄國的大患即農民的惡運，並不能在她手上解除，反而加深。此時有一半的農民變成農奴，比奴隸絲毫不差。曾有位哥薩克領袖薄卡且夫（Togatchev）起兵反抗過的加撒琳那一沙皇的朝廷及其封建貴族，生活於億萬農奴的血汗之上，農民不識字，又有宗教的迷信，故不能知道那掀起了法國大革命的啓蒙運動，不過這些觀念總還是慢慢地開展。加撒琳現在瘋了似的來毀壞自己所作的工作。她從前訓練成爲懷疑派，藐視舊傳統的青年，現在她又盡力來使他們回頭信仰那含糊不明，已遭棄絕的信仰。這又行不通。在貴族之外，已經有許多人相信新思想了。這些人數目非常小，却也可說在俄國產生了知識分子。這一新的階層主張獨立思想，他們很嚴重的接受了革命觀念。即在貴族中也有不少的人成爲無神論者，有許多作了後來十

二月黨的核心。這十二月黨最初作有組織的革命反對專制政體。在加撒琳時代，嚴重的反宗教運動已經在俄國發生了。這一運動緊緊抓住了俄國的新成形的知識分子，無論加撒琳及其繼位者如何努力要剷除它，都不能够。

共濟運動

法國啓蒙運動及無神論的影響造成共濟運動的傳播，以及一些同類的神秘教派。對於這些，上層貴族頗為傾向，比信他們的傳統宗教還更利害。俄國的共濟運動有好幾個來源，一支是由德國，一支由英，另一支由於瑞典。最初共濟運動的機關始於十八世紀中葉，在彼得堡加撒琳衛隊中的軍官保護及支持它。因其隆重富麗的開幕典禮，這些軍官大受吸引去參加，認為這是啓蒙運動的另一形式，典禮完後，照例來一場豪飲歡醉作結束。當時一位新入門者形容這初期的俄國共濟運動說，這是一場『戲劇，其中以敬拜創造之神（Minerva）始，而以慶祝福神（Bacchus）終。』福祿特爾的自然神論觀念，頗能與共濟運動的思想合作，不過共濟的思想並不佔如何嚴重的地步。

法國革命使俄國共濟運動頗有改變。創始人是一個伊拉金人，這個人在一七五〇年因不滿意於共濟派（Freemasons）的平庸無聊，他轉而信仰法國的自由思想及無神論。及至法國革命爆發，他害怕得很，於是又溜回來。伊拉金碰見一位在俄國旅行的英國老爺，這位老爺把英國共濟運動的原理告訴他，說那

是一種虔敬奉神的神聖科學，沒有法國那些蔑神的百科全書派那種觀念，雖然百科全書派有許多分子在裏面。伊拉金打聽得共濟派有好幾種，於是他就和「大倫敦密會」發生了關係，以後又參加進去，不久就作了「俄國地方的大師」。伊拉金熱心的要把英國共濟主義弄到俄國來，想把這新的信條納入希臘正教之中。

其後又有一位福祿特爾派的叛徒洛普金 (I. V. Zopukhin) (一七五六——一八一六) 在他的影響之下，俄國共濟運動更加保守起來。這人頗有學問，文學的才力也不小。年青時他認過一些霍爾巴哈及底得羅的書，後來他又反對他們的無神教觀念，而逃入一種稱為「玫瑰與十字架」的神祕共濟會去，這團體是由德文的「玫瑰十字架」(Rosenkreuzer) 譯為俄文的。洛普金瘋狂的為它宣傳，很想把它和希臘教的神祕主義結合起來。這位前福祿特派，於此變成法國革命的死敵，他認為這都由於那蔑神者蔑神的緣故。他告訴他的同志們說：「盡量抗這狂野破壞的假自由，假平等，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破壞它。」他為俄國農奴制度作辯護，說那是對於人民最好不過的制度，他只要地主對於農奴人道一點，待他們好一點。他自己就捨身來作一位人道主義者的榜樣，準備着為他的共濟思想殉身。加撒琳第二對於他們的秘密信不過，下決心要把俄國共濟主義一掃而盡。總起來說，她這懷疑是錯了的，因為構成共濟運動機關的貴族們都忠於自己的本階級，能在危機到來時，自動丟了法國革命哲學來就這出世的神祕主義，所謂「玫瑰與十字架」。

另外一位人道主義的共濟員叫做那維可夫 (Nikolai Novikov) 他是在『玫瑰與十字架』中跟洛普金密切合作的一個人。他是一個新聞記者，民間文學出版家，又組織學校，及為貧民作慈善事業。他也有自己的宗教神秘主義，又同情於法國無神論的啓蒙運動，與其他俄國共濟員一樣，他也是忠於自己的階級，以及專制統治的人。不過當加撒琳第二開始進攻共濟派時，他也免不了要坐監。

俄國共濟運動就整個的來說，政治上是反動的，但私人方面有些共濟員，有少數密會仍然守着法國的傳統，像和那『九姊妹的密會』一樣。這密會由一位無神論者拉南德 (Lalande) 在巴黎首創起來，參加者有許多自由革命的思想家，如佛蘭克林 (Franklin)，赫非休士，底得羅，福祿特爾，達蘭貝爾，康多色 (Condorcet) 以反別的法國革命之積極的參加者。德國之進步的共濟機關，如『啓發』 (Illuminates) 也給了他們不少影響。那是一位前耶穌會教授威森浩普特 (Adam Weishaupt of Augsburg, Bavaria) 以及一位好動的阿多夫男爵 (Baron Adolf von Kniggen) 創立起來的，後者是威森浩普特之親近而熱心的助手。這些機關在德國宣佈法國的啓蒙運動。他們的活動傳入俄國，影響了共濟員中的進步分子不少。

* * *

在這時期俄國的一位出色的人物及革命思想家就是拉笛士目夫 (Alexander Nikolaevitch Radtschek) (一七四九——一八〇二)，他為着政治的哲學的真理殉身，結果是悲慘的自殺。這種情形在後來的知識分子上留下過不可磨滅的印象。

拉笛士且夫本由貴族出身，在聖彼得堡加撒琳的侍衛學校受過訓練。由於他的才力和勤勉，在十七歲他和十二個別的有爲的俄國青年被遣送到萊布齊（Leipzig）大學去讀書，這大學在當時號稱是德國第一流的學術機關，是哲學家萊布尼茲建立起來的。在萊布齊大學，法國啓蒙運動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俄國青年因此有機會一方面研究德國的深刻處，另一方面領略法國的聰慧處。

那時候加撒琳第二正在竭力講究自由，充當法國百科全書派哲學者們的恩主。青年拉笛士且夫熱心的相信她真有意思要依據近代觀念，重新改建俄國制度，使它成爲一個立憲的帝國。他研究孟德斯鳩又研究馬布力（Mably），把他所寫的關於希臘史及希臘人之福利與疾苦的意見（*Thou his on Greek History and On the Causes of the Wellfare and Misfortunes of the Greeks*）譯了出來。研究這大書的結果使他得到一個結論，認爲專制主義是人性中最不幸的現象。他又研究盧梭借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張，從赫非休士他得了完全不需要超自然的默示之自然學倫理，他的宗教觀念經過許多思想變化，依自己生活狀況的升騰，他遊疑於福祿特爾的自然神論及正教的神祕主義之間，忽此忽彼。他到底沒變成一個哲學上的無神論者。那時候無神論哲學家就在法國也是很少的。

一七七一年回到俄國後，拉笛士且夫漸漸失望，覺得那女皇依近代方法改造俄國並不可靠，他看出加撒琳作皇帝的是一個人，作哲學保護者的又另是一個。對於國家前途的失望，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來，其後美國革命感動他寫了一首自由之歌，被稱爲是十八世紀最革命的詩歌，不但是在俄國，就在西歐

也是一樣。在這首詩裏，他攻擊宗教與專制政府，說前者是壓迫人民的工具。

『昨天，今天和明天，永永遠遠』

它都是殘酷可恥的奴役的淵源。』

一七九〇年夏，當加撒琳對於法國革命運動之反動達於頂點的時候，拉笛士且夫用無名氏的名義發表了一本書從彼得堡到莫斯科，這也就是他反抗的極峯。據稱這本書是十八世紀末葉俄國進步思想之情緒與意見的百科全書。它描寫俄國那種可怕的落後的情形，貧困和不景氣。他毫不畏縮地暴露俄國皇帝的專制罪惡以及封建的農奴制度。它用小心謹慎的說法，主張建立一種民主的共和國。它的效力大極了，所有擁護俄國自由的人們稱之為獨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可是所有的反動派，特別是加撒琳第二，怒不能平。她自己就擔負起迫害這著作者的工作，吩咐把他抓起來。因為她以前和法國的自由思想接近過，所以她懂得這本書的真正目的。第一次讀完之後，她就寫：

『這本書的目的在每一篇中都可以看出來。她的作者已被法國的錯誤充滿浸透了。他吹毛求疵，找出事情來減少人民對國家與政府的信仰，使人民怨恨領袖及主腦人物。』這是起訴狀的第一點，其次就是犯教：

『作者是絕對的自然神論者（書中的幾頁通信）與東方正教的教義不相容。』

加撒琳之懷疑笛士且夫同情法國革命，且主張俄國也發生同樣革命，是很對的。根據上述罪狀，她

把他交給法庭，在法庭中忍受了長期痛苦，終身的監禁，隨後被判處了死刑。這種殘酷的宣判，破裂了這個思想家的勇敢精神，他懇求女皇免他的死罪，於是悔過取消他的一切政治宗教的犯教行爲。加撒琳見他已是意志破滅，「寬洪大量的」免他一死，改爲十年長期監禁在西伯利亞的伊利門大獄中（Ilimen Pri-
son）。一七九七年加撒琳死後，他的情形比較好一點。他們容許他回家，但不能在都城住。當亞歷山大第一初年暫時的自由主義時代，拉笛士且夫的公民權恢復，他又積極活動參與改造俄國國家的事務。除了別的改良之外，拉笛士且夫主張良心的絕對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政教分離幾件事。

改良俄國的希望還是來得太早了一些。反動分子見拉笛士且夫又熱心起來，就威脅他說，要再把他放逐到西伯利亞去。對於他那過受壓迫的神經，這一點是太難忍受了，於是在一八〇二年他以自殺了却那不幸的生命。他臨死時說，「後人會爲我報仇。」拉笛士且夫和一切後來者一樣，作了當時專制政體的犧牲者。這種專制主義抵擋不住思想的力量，只有用殘暴來壓迫它。拉笛士且夫並不是白受了罪的。他的死感動許多人來效法他，即在他那時也就有許多別的同志。人人都知道俄國人居住在巴黎的，即使是貴族，如加利森兄弟（Brothers Galitzen）都熱心參加對於巴士的大獄。另有位青年俄國伯爵司特羅干諾夫（T.A. Stroganov）甚至拒絕自己的爵位不要了，來參加雅各賓黨的「法律的朋友」俱樂部。並且俄國駐巴黎大使的秘書都布洛夫斯基（P.P. Dubrovsky）用大使名義在巴黎開一個印刷所，印行俄譯的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這些情形使俄國專制者非常怕，只借

教會的幫助和祝福來壓迫革命精神。在保羅第一在位的短期中，他繼續他那遭恨的母親加撒琳第二，盡其所能的剷除一切自由思想的痕跡。他甚至於禁止印行『社會』『公民』這些字眼，他說這是共和派的字，不該在俄國文字中採用。

在這種情形之下，俄國的革命思想既還沒有充分的力量撼動地上的專制寶座，於是轉而攻擊天上的權威，因為地上的專制者是假借他們的威力來統制的。正如馬克斯所說的名言：『對天上的批判，轉而為對地上的批判；宗教的批判變為法律的批判；神學的批判也變為政治的批判了。』

雖以保羅第一世的專制殘酷，還是有些勇敢的人們用文學的形式來攻擊天上的權威。其中有一位是青年詩人百靈 (I. P. Rim) (一七七三——一八〇五)。他與他的朋友別士突洗夫 (A. P. Pasternak) 繼續着拉笛士且夫的遺行；後者的兒子且成爲十二月黨運動的領袖。一七九八年百靈和別士突洗夫開始編輯發行聖彼得堡雜誌；雖在嚴厲檢查之下，這些編者還是能設法寫出關於『自然』『教育』等等的文章來，在這些文章中他宣傳人類的高貴。百靈寫了一首『人之歌』一方面反抗『天上的專制者』，另一方面則反對把人當作螻蛄看待的觀念。在百靈的詩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大聲疾呼，反對這種不稱的自輕自賤舉動：

『滾開吧！卑陋的觀念，

你奴隸心理的朋友，

高貴的思潮永不能

照澈於污濁卑暗的心中。」

百靈知道人是自然的產物，但他也是它的主人，以他的腦力能使自然的混亂狀態歸於有條有理。百靈一心相信人的智力，他的公道，他的團結，他期盼着將來公的理能：

「團結一切人類，

一切自然的子孫。」

他與他同時代的唯心論頗相調和，相信所謂抽象的公理，於是他就把上引的那兩句全部歌文都獻給它。法國大背教者霍兒巴哈給他這首題句話說：「公理是一切社會德行的基礎。百靈不願使自己的思想受人干涉，他甚至於要以自己的思想影響那檢查者。他寫一篇寓言關於驕馬的事。主人怕馬不肯往前衝，於是把牠的眼綁起來，結果兩個都掉在池裏了。寓言的意思在末了幾行中：

「呵，獸的主，人的王，

有眼能見光，

閉光是愚罔；

愚罔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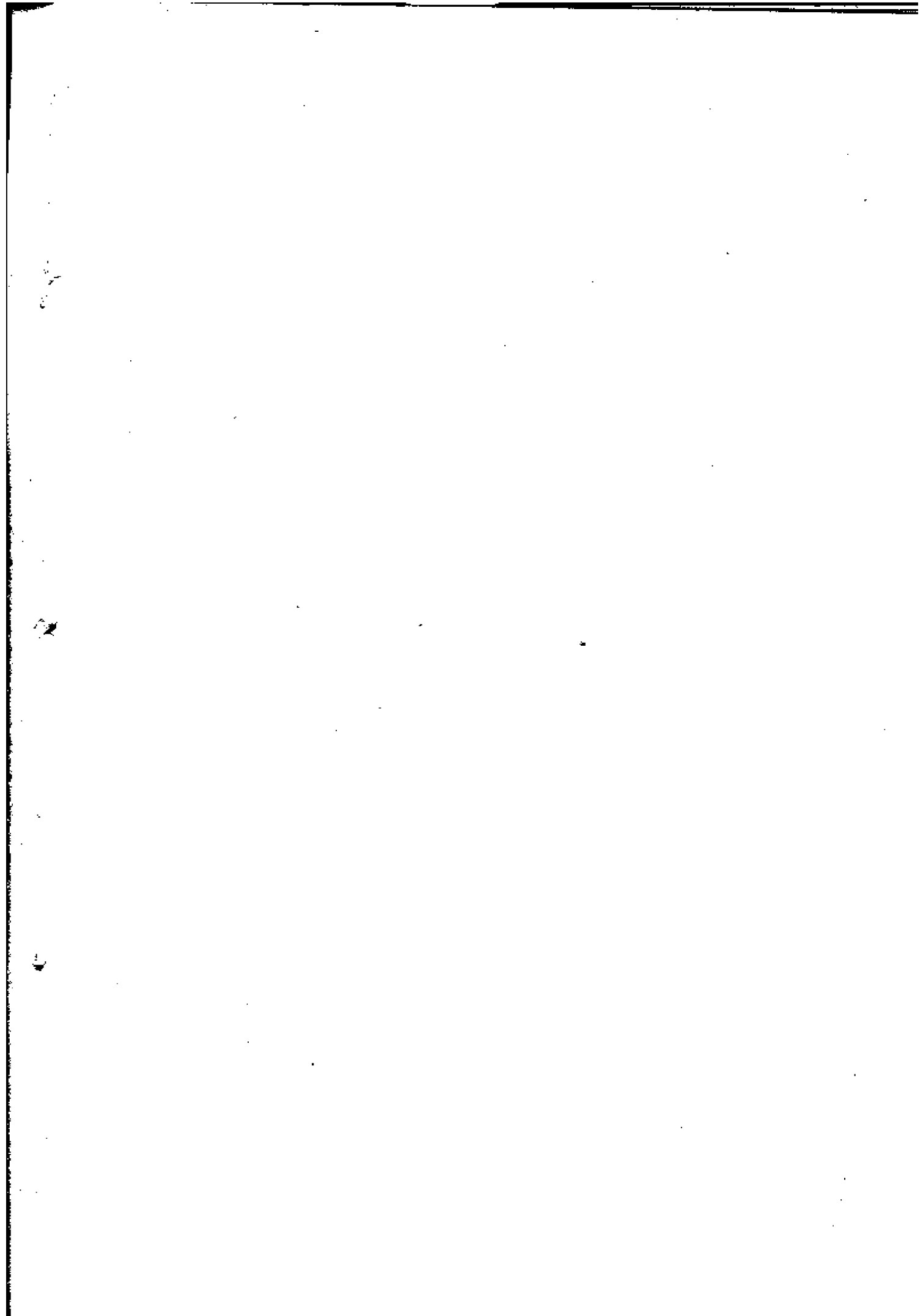
眞真不可嘗；

人與獸，無二致，

沒眼又沒光，

難駕難馭真上當。」

俄國的教會和政治領袖應當把這當作一種警告，可是沒有任何統治者肯自動地把自己的權位丟出去，除非是被革命壓迫着不能不那樣幹。這一點，俄國可說是古典的榜樣。正如寓言中那個蠢人一樣，俄國教會與皇帝要綑住人民的眼睛，這就弄出革命來。法國啓蒙運動的種子落在俄國這沃土上，在種種情形之下，俄國已經產生了一羣小小的，然而堅決的知識分子。這些人首先對於宗教權威和信條取了批判的態度，發展成爲反宗教的傳統，其後又變而爲政治上的反抗。在俄國革命的過程中，這些轉變可以看得出來。



第六章 宗教與革命運動

在歷史中，十九世紀是資產階級革命以及資本主義勝利時代。加撒琳只暫時允許法國革命思想在他國內活動，但他却永遠也不能再把它剷除，自由思想的波浪起初只在朝內蕩漾，後來慢慢展開，慢慢地深刻化，一天一天地深入廣布到民間去，最後展開而成了無產階級革命，掃蕩了俄皇的統治，且破壞了教會的權威。這一過程與有組織的宗教之間的關係，在下文將加以述說。

十二月黨運動

在俄國，十九世紀革命運動的第一階段是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黨暴動，那是尼古拉第一登基的時候。它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專制，強迫俄皇頒布自由的憲法。其中的領袖們都是貴族中的軍人分子，英法自由思想的從徒。其中有些個會參加攻擊拿破侖之役，自己曾親見西歐的情形是什麼樣子。拿破侖的敗亡，俄普奧三國的『神聖聯盟』刻下了黑暗時期的印記，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主義，發誓要保存專制與正教。在俄國這種黑暗反動特別明顯，一切封建農奴的舊制度都尚完全的保存着。在俄國，雖然時期已是資本主義生產形態應該發展的時候，却因為這種種原因被阻而不能前進。此時的十二月黨暴動，代表着俄

國各階級一般的普通要求。

在『神聖聯盟』所造出的霧圍之下，十八世紀的福祿特爾思想當然不能與旺發展。這時期俄國的高級教育史上記載的都是審判犯教及革除教授的事，罪狀是他們沒有按照上帝的旨意的精神來教授科學。地質學因為與聖經上的教訓不符被禁止了，教授哲學的時候，也受嚴厲的檢查，使法國啓蒙運動思想，無從進入學生的腦中。

這樣的反動和恐怖主義，使初期的俄國知識分子的發展受了很大的打擊，從而產生一種複雜的現象：弱者沒有辦法，只得趨於奴式的屈服；強健勇敢的分子，則更積極的走入反抗的地步，攻擊宗教上政治上的權威者。這樣不免產生了許多殉道者。其中有一位塞門諾夫 (S. M. Semenov) 一位牧師的兒子，至今為俄國的革命家所尊仰。他在神學院受教育的時候，就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在莫斯科大學時，這位青年成了學生中的領袖，近代民主思想之積極的宣傳者。他又參加了十二月黨的秘密組織，暴動失敗後，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

當時所有高級學校大部分的學生，雖在種種壓迫之下，還是與極端派同情，迫切的來讀那些禁書，特別是法國百科全書派哲學的書籍。甚至於那種貴族學校，如沙皇的侍衛學校，其中學生都是高級貴族的兒子，都被這種自由思想所傳染。大家知道侍衛學校有些學生都參加了十二月黨暴動。差不多在所有一切的高等學校，都有秘密組織研究極端思想。正如法國革命初期一樣，解放思潮首先起於反抗宗教權威，

繼之就包括了政治及社會諸領域。

十二月黨的領袖們莫拉維夫大尉 (Colonel N.M. Muraviev) 倍士特大尉 (Colonel P.J. Pestel) 對於宗教教會在將來政治制度中的地位頗有定見。他們準備軍隊的暴動，希望由此可以使革命成功。這些領袖們誰也不願使教會和政府分開，同時也不願使希臘正教失了固有的地位，即向日國教的地位。莫拉維夫個人本是個自然神論的自由思想家，但他和福祿特爾一樣，以為宗教在民間有它必要的作用，應該把它置於政府統率之下，作為道德統治的機關。倍士特是一個路德會的新教徒，他自己說自己『有一個唯物論者的心，但他的腦却不願跟着心跑。』無論如何，他是很贊成希臘正教，以為那與俄國人民的品格相合。

十二月黨所定關於新國家的憲法，其中有這麼一條關於宗教的條文，『人民的國會無權制定並禁止信條及教派。人民的信仰，良心和意見，只要不發生出非法的行動，不受人民的國會的干涉。但如有根據於惡行和作不自然舉動的該派，則依普通法律加以禁止。』該憲法又使希臘正教作為國教，且強迫每一人民在教會註冊即加入教會。他們還是很頑固保守的。

我們已經說過，這些十二月黨是出身於軍官及上層貴族，他們沒有什麼民主觀念，且不相信人民的創造力。他們以訓育者自居，明明人民自己能作，也應該自己作的事，他們都以為該由他們來代辦。所以他們的宣傳只限於少數上層階級當中。它集中於兩個會社，一個在北，一個在南。這些會社通稱為『慈善會

』(Union of Benevolence) 還有所謂啓發者 (Illuminators) 那一派的共濟會機關徒參入其中，以外還有一些和陰謀者有關係的人物，亞歷山大第一自己就是個共濟會徒，他在位時，被加撒琳禁制了的共濟會機關都恢復了，且又新添了許多。這些機關有的變成陰謀革命，推翻專制的方便之所，十二月黨的主要分子都是其中的會徒。

這第一次的有組織的革命運動，雖只限於上層貴族之中，但同時已經有了一種傾向，要推行一種廣泛深入的民主革命運動。如此類秘密組織，如斯拉夫人大聯合 (United Slava)，就有極明顯的民主主張。這是俄國南部下層社會的人們所組織，它的憲法主張貧富貴賤一體待遇。其中的領袖以為革命若要成功，只有全階級全人民都參加戰線。這一組織的創始者和領袖叫作波利索夫，一位非出身貴族的軍官。這人有一種出人頭地的品格，勇敢，堅強的腦力，仁厚而忠於自己的主張。他廣讀福祿特爾赫非佳士及霍兒巴哈等人的書，以此他吸收了法國啓蒙派的思想。他爲了這原因要讀法文，但又太窮，不能請老師，只好自己讀，因而得了這樣的結果。

他與一位波蘭革命家魯布林斯基 (Julian Lubnisky) 交好，從他得了斯拉夫人大聯合的觀念。這人幫助波利索夫 (Peter Borisov) 計劃使俄波兩國人民聯合，共同反對專制政體。這些人相信平民的力量，且願意以武力來奪取他們的自由。波利索夫說：「盼望一個生在帝王之家，享有無上權力的人來自動地把他認爲應享的權利取消，是不可理解的事。這位波利索夫是十二月黨中對於宗教問題採取嚴重態度

的一位，他提出一個問題，『要否認上帝，而無損於道德。』所以他和他兄弟安得烈（Andr. v.）在招集斯拉夫人大聯合社員的時候，主張要對生活有一種清教徒式的嚴肅態度，這一點，差不多是後來一般俄國由下層階級出身的革命家所公有的。

上層階級的十二月黨，一般的都按着自己的社會習慣對於道德取隨隨便便的態度，對於宗教也只是浮薄表面的。他們認為宗教是用來箝制平民大眾，是必要的，但上層階級却用不着它。他們利用人民的宗教觀念，來把他們的宣傳文字用宗教言語和聖經中的文字傳達出來。他們採用口頭問答宣傳法認為這是接近羣衆的好方法。莫拉維夫（Moraviev）北方的領袖寫了一本自由的問答（Catechism of a Free Man），其中的問題和答辭都採用宗教名辭，大量地引用聖經文句為證。例如問題：自由從何處而生？答覆是一切好的都來自上帝；上帝依自己形象創造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他與人以自由，要不然，若是人被強迫而為善為惡，則賞罰就都不公了。於是該問答又講到目前並不能人人自由，因為少數人榨取多數，文中說：『有些人自以為高，就凌壓別人，又有些人來接收這樣奴隸的觀念，把上帝賦予人的自由權利放棄。接着又問：上帝造出專制來麼？答：上帝是全善，永不會造出罪惡。下文又問：難道不是說過『只有上帝才有權力，凡現存的權力都由於上帝嗎？』答覆：凡罪惡的權力並非出於上帝。『好樹才能結好的果子……凡結不好的果子的樹，都要砍去丟在火裏。同樣的，命運必將加於牧師教士的身上，他們是穿着羊的衣服』等等。

運動失敗之後，領袖人物都被殺，別的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了。這一運動於是構成了俄國革命的初步，因此它對於宗教還是有聯絡，且以爲它在控制社會和人民上是必要的。這本是由於運動者本身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

那羅尼克運動

十二月黨運動的失敗，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教訓：社會革命若沒有廣大羣衆有意識的擁護及熱烈的合作，只憑少數上層分子由上而下的去製造，是不能成功的。俄國的羣衆包含了農民，其中一大半是貴族的所有物，是農奴，被網縛在土地上面。小資產者的手工業工人，小商人的數目比較甚少，缺乏知識且缺少組織。重工業和製造業還在初期。通貫莫斯科及彼得格勒的大鐵道，也是第一條鐵道，還剛剛成功。尼古拉第一的長期統治，是十九世紀俄國史上最殘暴最專制的時代。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有組織的革命活動簡直不可能。社會動力趨於地下活動，躲在那兒研究他們的問題，從哲學上尋求幫助。

在這時候，十九世紀的第二季，在俄國知識分子中間發展了兩種傾向的思想：一種是德國唯心派的哲學，如費希特（Fichte）、薛林（Schelling）、黑格爾；另一種是法國聖西門與傅利葉（Fourier）的烏托邦社會主義。俄國人採取了這兩種潮流，把它們加以綜合，以適應他們的國家意識和需要，其產物就是所謂

的那羅尼克或民主主義社會哲學 (Populist Social Philosophy) 這一運動有兩種趨勢截然不同：一種是向着西方，要按着西歐的方法以工業化、教育及取消或限制專制政體來改造俄國，這些人稱爲是西方派。另一派也是研究德國唯心思想和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的，他們却以爲俄國用不着步武西方，但可以發展及改良本國的專制政體，宗教傳統及農民主地公社制，據他們說，這種公社制可以發展成爲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這一種稱爲是袒護斯拉夫派 (Slavophilism)，由這一派出了不少的宗教擁護者，努力於抬高教會的威嚴。

西方派的觀念與此相反，他們反對正教，反對專制，繼承法國的傳統進行反宗教運動。此派的出色人物有倍林斯基 (V. Belinsky)，赫爾震 (A. Herzen)，杜密 (M. Bakunin)，培特羅洗夫斯基。這些人一開始都是黑格爾正統派，隨後慢慢都往左走，越來越恨教會。這些出色人物的行動，我在下文要一個一個地述說出來。

倍林斯基 (一八一〇——一八四八) 號稱爲革命的那羅尼克哲學之父。他出於鄉村牧師家與貴族毫無關係。因爲他的激烈思想從大學中被開除出來，他不停地奮鬥下去，以至於成了俄國之新發展的戰鬥的知識分子的領袖，變成了他們敬愛的偶像。他是空前的俄國文學批評家及出版家，他的俄文非常的精練，至今俄國青年還讀着他。他被沙皇的秘密警察懷疑注意，只因死得早，才三十八歲，方免於囚牢生活，及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那是俄國知識分子領袖的命運。倍林斯基是一位典型的俄國十九世紀青年

知識分子，他的思想變化很值得我們注意，因為當時的情勢逼得知識分子只能作思想生活，在當時重壓的情形之下，人除了作這個之外，什麼也不能幹。

倍林斯基很早就獨立思想，據他給他的朋友巴枯寧，比他更偉大一些的一位革命家，寫信他說：『可怕的教育使我受罪不堪。當別人還只能對事情發生情緒上的感覺時，我已經在那兒思想了；我還沒有作到宗教信仰者的地步，已經就是個無神論者和誹謗上帝的人；我還不能夠把習字帖抄得齊整，已經就來寫詩；當別人還在認字的時候，我已經在那裏夢想幻想。』這種情形不但倍林斯基有，也是一般性的俄國青年知識分子所共有的特徵。這些人『像一羣傻瓜，天使所不敢涉足的地方，他們都要亂衝進去。』在倍林斯基還年青時，他熱烈地抓住每一點西方思想；凡可以透過沙皇檢查機關在知識方面所設的防線，凡能偷過文化剿匪陣線的西方思想，都被他盡量吸收。

一八三二年從大學被開除了之後，倍林斯基與那位高貴的俄國人道主義者司坦克維支（*Stankovich*）往來，藉以繼續和西方近代思想接近。這位司坦克維支是一位出衆的人物，他鼓勵青年去獨立思想，將他們的腦力和意志引導朝社會理想方面去。司坦克維支的徒衆可稱爲是那羅尼克運動的搖籃，從那兒推行了將來羣衆之間的革命思想。

倍林斯基很快的接受了薛林費希特及黑格爾等的唯心派汎神論的觀念。他以出衆的明白的文學手腕，把這些思想推行及轉達於俄國讀者。此時他的人生哲學，據他自己所說的如下：

「一切上帝的美之不盡的世界，不過是一種永存觀念之一息，經由萬事萬物而表現，成爲絕對的總體，及無窮無盡的個體之偉大的現象。凡有血氣的物類，只當其知識啓明，感情奮興時，才能感覺到這宇宙靈魂的偉大。這靈魂的心臟是太陽，它的筋絡是天河，它的血液是純潔的以太（Ether）。這觀念不知休息；它永生而不滅；它不斷的創造以毀壞，毀壞以創造。它附體於燃燒的太陽中，於美麗的星球中，於遊走的慧星中；它以海潮的漲落爲生命的呼吸，以沙漠的狂颶爲呼吸，以葉的低咽，以流水的小語，以獅的吼怒，以嬰兒的淚珠，以美女的微笑，以人的意志，以天才的偉大創作爲生活……這觀念如此的生存着……」

於是倍林斯基叫驕狂的人們不要過於抬高自己：

「否認自己吧，抑制你的自我主義吧，嘲笑你那自私的「我」吧；爲別人的快樂而存在，爲着你的鄰人而犧牲，爲着你的國家及人類的幸福而犧牲；不要爲酬報而喜愛真理和善良，但要爲着真理及慈善的本身。忍受苦惱……以完成……你的永生，這永生只有毀滅了你的「我」才能實現……這就是那永存觀念的道德生活。」

於此倍林斯基還從頭到腳是一個唯心論者。十年之間，他宣傳、抑制、和忍苦。他把基督教當作了一種哲學。他又不喜歡法國的政治啓蒙運動。

好，十年之後的倍林斯基怎樣了呢？他還是熱心的宣傳理想，還是關心人民，整個人類的幸福，因爲他從不是狹義的國家主義的。但十年之間，他的觀念已經經過了一個辯證法的過程，他絕對地否認了他從

前那麼熱心承認的思想。唯心論的他，變成了唯物論者；相信上帝的人，變為公開的無神論者。現在他怎樣說：『在我心中起了一種邪惡，兇猛，而瘋狂的愛自由愛獨立的情緒，只有社會建築在真理和勇敢上，這自由和獨立才能實現……我現了解了馬拉(Marx)對自由之血的愛好，了解他為什麼熱烈地恨惡一切想剝奪人類自由的東西……漸漸地我變成了宇宙的公民了！我開始學馬拉那麼的愛人類；似乎我若能使它的最小部分幸福，我就不妨用烈火與刀劍來毀壞了其餘的。』

現在倍林斯基是一位絕不妥協的革命家了。『地上的太平治世不是由那唯心的高貴的吉倫特派（法國革命中的和平派）的溫柔熱烈的辭語弄出來的，乃是聖嬰斯特（Saint Juste）和羅伯斯庇爾那班恐怖派的理論和行為這雙刃利器打出來的。』一八四一年，他自命為是社會主義者。他說：社會主義的觀念，在我看來是觀念中的觀念，存在中的存在，問題中的問題，是信仰和知識的阿爾伐與峨眉加（Alpha and Omega）始與終。『他這種社會主義還是感傷主義的，烏托邦的。他所想的是無窮富之分的社會，在那兒沒有君王也沒有百姓，大家都是兄弟。他狂歡的預言說將來的那種時代，『基督要把他的權力讓給天父，而天父，即理性，要統治新的天國，君臨着新的地上。』既已自命為社會主義者，他就日夜不安的找方法使之實現，於是他找着了馬克思主義對於解決這問題的理論，他開始才懂得社會的階級性質，曉得那『新天國與新地上』還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制度的後面，而俄國才剛剛在朝資本主義社會走去。他說：『我知道工業是大罪孽的來源，但我也知道它給了社會大大的好處。在資本的統治下，在虐待勞動的情

形之下，它是無以復加的罪惡。」

信仰社會主義之後，他又來審查他所喜歡的宗教觀念。於此，他也是辯證法的否認了他從來的主張。這時使他寫着說：「在我看來，逃到彼岸去，逃入神秘主義，逃入一切低能兒半墮落者所逃往的地方，並不是出路。」他把年青時的信仰都丟了。他讀了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他研究孔德的實驗哲學，雖以後者的新基督教，也不能影響他，他的唯物觀念更加深刻化了。他說：「現在必需要把科學由超世哲學（Transcendentalism）和神學的空想中解放出來，指出在理智的限制中它能有豐富的活動。要把它永遠和一切空想的神秘的東西分開；這才是新的哲學，可是孔德不能作這個。」於是他注意於辯證法唯物論，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在當時初創出來的。

倍林斯基辯證地否認宗教，由他給哥哥爾的反辯的信中很生動的表現了出來。在那信中他責備那位大作家，說他對於宗教的變節態度。哥哥爾是尖利地批評俄國封建制度的人，現在他却逃入於倍林斯基所正在拒絕的宗教中去。他的信是在一八四七年寫的，那是他對於教會和宗教問題的最後表示。其中有不少的先見預言，下文我們可以讀到。哥哥爾在他生命將盡的時候，又回到宗教來，認為俄國要得救，需要有神秘主義的虔敬以及信仰希臘正教。他和後來的托爾斯泰與陀斯妥夫斯基一樣，相信俄國人民是根本富於宗教性的人民，對於這種人民，理性派的文明是靈魂上的致命傷。這種反動觀念使倍林斯基動氣，他就向哥哥爾爆發他革命的怒氣。

「照你的意見，俄國人是全世界上最有宗教性的人民。這是撒謊！宗教性的根基是虔敬，崇拜上帝。可是俄國人却在抓……的時候提上帝的名字，你要仔細看看，就知道他們本性上是深刻的無神論的人物。他們是迷信得很，但可沒有宗教性的痕跡，文化進展，迷信就會消滅，但宗教性往往自己能投文明之所好，法國就是個好例子。在法國的開明人物和受有教育的人物中，就有許多天主教徒，有許多已經脫離了基督教的人也相信某種上帝。俄國人並不這樣。他的本性就不近於那種神秘主義。他們的常識太豐富了，腦子太清楚太明確了，不會去管到宗教，也許就在這一點上，就建築着他將來偉大的歷史運命……」

這幾句話很足令人想一想。也許現在俄人的無神論運動，正是在實現倍林斯基的預言。無論如何，他的人格，他從神秘主義宗教突然變成革命的無神論的經過，很足以象徵他所發起來的知識分子運動。此外還有他的幾位同時人和他的學生，我們也要把他們舉出來，以證明俄國宗教壓迫，專制獨裁，及封建奴役所應得的結果。

赫爾震 (A. I. Herzen) (1812—1870) 也是俄國人民之革命的思想家兼宣傳家。父親是一位有錢而模模糊糊的貴族，他因此得受自由的教育。他的教員有一位是法國雅各賓黨人，由這人他了解了法國革命的意義。他是很早就開始讀法國啓蒙哲學派的書。他的父親對於自由思想很同情，故叫赫爾震不必對宗教抱嚴重態度。赫爾震本性就是感受性很強，對於凡自己所從事的一切，都抱着嚴重態度。所以他和宗教破裂，是很生動的一幕。

十二月黨暴動事件深刻的感動了他。他說：『關於那次暴動的情節，那次審判，以及莫斯科的恐怖，使我大吃一驚。在我面前有個新世界出現了，它把我整個精神抓住了。我並不知道這世界是如何出現的，但是，雖然我並不懂什麼，也不知道那些有什麼意思，我却很覺得我並不是站在那班放槍殺人，打了勝仗的那一邊。我又不能去站在監獄和鎖鍊的那邊。倍士特和他的同志們被殺的事，全把我的靈魂由兒時的睡眠中弄醒來。』我們還可另引一段證明這兒時的印象是如何的深刻。這是在三十年之後他寫的關於十二月黨事件的話：『罪人斬首之後，他在莫斯科克雷林的中央舉行莊嚴的宗教典禮，慶祝尼克拉戰勝了十二月黨人。典禮之中，沙皇一家子，元老院（Сенат），內閣諸部大臣，以及禁衛軍都在。由克雷林牆沿上鳴放大砲。我在十四歲時參加這神聖的典禮，在那污染了血的祈禱的神座之前，我發誓要為死者復仇，我要盡全力來和這寶座，這神壇，以及這些槍砲開戰。我的仇還沒報得，禁衛和寶座，神壇和槍砲，還是照舊的在那兒。可是三十年之後，我還是站在我那一輩子未曾丟過的旗下。』於此我們看出赫爾震還在十幾歲時，已經就是個革命家了。他以後年齡愈大，就加倍的恨那血的俄皇寶座，恨它的神壇。十六歲時他和他的同伴與終身好友俄卡烈夫（Nicholas Ogarev）發了神聖莊嚴的誓，願要犧牲生命為自由而奮鬥。這種莊嚴的舉動是當他們在麻雀山上樹林中閑步時舉行的。這山臨視莫斯科城。這兩位高貴的孩子見到這象徵自己國家的城市，免不了念及它所受的壓迫，於是起誓犧牲自己以謀它的自由。這就是青年赫爾震。

進了莫斯科大學，他很快就變成了革命學生們的領袖。此時從法國已經輸入了聖西門的烏托邦思

想，赫爾震及其朋友把它抓住，如同新的福音，大家都成了它的熱心信徒。

聖西門曾著述人類科學大綱 (Outline of the Science of Mankind) 以及新基督教 (The New Christianity)。在他的分析中，他說人類的秉賦根本不同，不能使之齊一。因此社會應該改變組織，使人人得有機會發展他的才能，但這機會却不是現行制度所謂近代文明所能供給的。聖西門提倡把現行社會制度取消，取消一切遺傳的政治勢力和財富，將政府歸於聰明有才幹的人手中。政府應共有三部：一是發明部，一是考試部，一是管理行政事務的……土地資本及生產工具應歸國有。勞力報酬應有差別，可以刺激人去領頭幹事，去生產。他以為人民既不是本來平等，所以該用社會化的宗教來團結他們。空想的聖西門簡直認為只有宗教才能使人去盡領袖職務，保障公正和誠實。

聖西門的話很投合赫爾震的和他那一羣的脾胃。於是赫爾震把自己由聖西門所傳來這種新觀念寫出來說：「一方面這表示是女人的解放，她的參加共同工作，相信自己的力量，與她平等的結合。另一方面肉體可以得其平。偉大的字彙囊括了全世界，這世界是人類之新的關係所構成的。這世界是健康的，美的，一個自然道德的世界，所以道德上是純潔的。」有許多人恥笑他這種解放女人，承認肉體權利的觀念，用一些卑污下賤的意思來解釋他。這全因為修道院派那些墮落的觀念，怕肉體怕女人所養成的。他說：「好的人們都了解，所謂肉體的清潔洗禮是基督教的逃避。活的宗教將代替死的宗教；美的宗教將代替鞭打的宗教；代替因禁食與禱告而消瘦的宗教。已被釘了十字架的肉體已經復活，無所用其為自己羞恥了。」

得到了調和的統一的人，知道他是統一的整個，並不是機械的湊合，像一個鐘錶，是兩種絕不相同，相互抵制的東西作成的。這樣，他本身中的仇敵就會消滅。

赫爾震變成了一位熱心的新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和共和派。他宣傳反對一切暴力和墮落。結果，他畢業之後不久就被抓去，放逐到邊遠一個東三省區的維亞特加城（Vyatka）。隨後他又受沙皇的壓迫，逃亡國外，在那兒他繼續他的社會主義宣傳，發行兩種雜誌北方明星（The Northern Star）與鐘聲（Bell），這兩個是他在倫敦時發行的，私運入俄的數目不小。用這種工具，赫爾震希望在他國家的黑暗情形中，放射出社會主義的光明，喚醒國人。

受了費爾巴哈那本出名的書基督教的本質（Wesen des Christentums）的影響，又讀了德國諸唯物論者如莫烈洗特（Moleschet）和布哈勒爾（Bueckner）的文章，接近了孔德派實驗哲學及達爾文的進化觀念，他很快地就走出了舊日的宗教神秘主義。極端的批評教會，和倍林斯基及同時的俄國革命家一樣，變成了無神論者。對於西方的革命，他已失望，他看出那些資產階級的矛盾，一手作一件事，另一手又破壞它，——『因為，』他說，『他們替這軟弱的可惜，流淚而不知將來的世界已經由他們的指縫中溜走了，他們在愁着自然地會發生的結果，而別的人却還在莫名其妙的情形中。所以他們這班人都還站在皇宮，教堂與朝廷那一邊。』赫爾震恨這一切堂皇機關，他對俄國知識分子喊出口號來：『到民間去！』『到民間去！』

教會此時竭盡力量在奴奉沙皇，盡力地設法轉移人民的注意，使之不去理會爲他們求解放的革命宣傳。赫爾震攻擊這種對於人民的叛賣行爲，他說：『我們不能再沉默了，看看那些啞叭的被蹂躪的牧師們在那牲畜式的奴役上，軍事化的居留地，以及一切各樣的殺人方法上撒着聖水，二百五十餘年來祝福強迫婚姻，把被主人打死了的農奴埋葬一點也不生抗議，這樣是不行了。』爲着保持無知者的迷信，教會又聲稱找着了什麼『不朽的聖人』的遺體。赫爾震非常生氣，就問：『既然誰都不信那些新造出來的聖人，沙皇也不信，他的大臣也不信，牧師與祭司都不信，爲什麼要這麼崇拜偶像和撒謊呢？撒謊既不是爲這些人，那麼爲着誰？』赫爾震於是答覆：

農民的靈魂像小孩子似的就會相信這些奇事。窮人們被貴族掠奪，被官府欺騙，被解放令（Emancipation Act）欺騙，永遠的勞作消耗了他們，不可避免的貧困蝕了他們，這樣的可憐農民會相信的，他太失望，太不快樂了，不能不迷信。當人類要求休息，要求希望時，當他極其痛苦時，他不知道在那兒可以放下頭去；過圍是層密的兇橫敵人，他自然要走到那暗啞的石棺，暗啞的聖人的屍體那兒去滴下一點熱淚了。於是，他受了這道體這石棺的欺騙，他得了安慰，他就不朝別的方面去想了。你們，這些強盜，你們將那些不幸人們最後的一件襯衣都奪去了的人，你們用這種方法不怕羞！你們要把他變成個精神上的乞丐，瞎子，把他們推入迷信的黑潭中去，你們是什麼黑黯的奴隸，人民的何等樣的仇人呵！

攻擊教會，以教會爲欺騙工具的態度，是一位忠實的革命家所不得不採取的。自法國革命以來，歐洲

的革命旗幟就停止了奉宗教的名義。宗教已是全在統治階級的支配之下，與近代科學衝突得明顯，再也不能拿來作宣傳革命的工具了。

巴枯寧 (M. A. Bakunin) (一八一四——一八七六) 是倍林斯基與赫爾震的朋友。在各方面說來在當時俄國革命家中，他是最有動力的一位。他寫了許多宗教與革命的關係的文章，他的觀念種成了俄國革命運動的反宗教傳統。

巴枯寧生於舊的貴族富家。從小受一位開明的父親的影響，幼時很快樂的過去。他愛他的父親，直到兩人的道路分歧了時，他還是那麼愛他敬他。巴枯寧受了砲隊軍官的訓練，在彼得堡的軍事學校畢業。他因為不愛那職業，就離了軍隊去研究科學和音樂。很早他就受了司坦克維支，就是那位鼓起倍林斯基去擔負公共使命的人的影響。這位先生的非常人格，感動了巴枯寧去注意生命中的嚴重問題。巴枯寧說：『和他在一起，人不能不覺得自己是更好了些，更高貴了些。在他面前卑劣瑣屑的念頭和下流本性就不能出現。在他的影響之下，最平常的人也成了有意義的人了。』和司坦克維支在一起，巴枯寧研究歷史及德國唯心派哲學，特別是薛林，和以後的費希德黑格爾。這些喚醒了巴枯寧去作一個宣傳者。他用技巧，熱心，與動人信仰的力量來宣傳這種新得的哲學，不久就有一羣青年人來繞在他週圍，把他當作先生，甚至於聰明的倍林斯基也給他魔住了。

費希德的告有福的人們 (Anweisung zum seligen Leben) 抓住了巴枯寧的富於感覺的靈魂。現

在他還只有二十二歲，已經是接受了費希德的忠告要去作英雄事業，要犧牲，服務，要愛。他給他姊妹的一封信，是一八三六年寫的，其中說：『最後我達到目的地了。我認出這些慾望的空虛，我覺得除了精神世界之外，並沒有真的生活，也不能有另一個目的。這條路也許不是容易走的，但它很值得人去走……所以對於世界，我是很沒意義的東西，一個零，一個教數學的教員，但對於我自己和了解我的朋友，我的意義就大的多了。我把那微小的自己救自己的自我主義殺了。把偏見取了，我是個人了！』這種宗教經驗在他心中先入為主，以後永遠都留下它的印象。這一點，爲他作傳的人司帖克洛夫（I. Stoklov）也看了出來，雖然這人也是位無神論者。他說：『這種宗教感情對於他的將來發展不能說沒有影響，不過以後這種感情變而爲它的極端反對方面，變爲戰鬥的無神論者。即使他規定自己的目標是攻擊宗教，但在他討論宗教問題時總是表現着很有興趣，這都植根於他的莫斯科生活的時代。』

因爲要滿足對於自由與精神真理的要求，他決定了去柏林大學，黑格爾及其同輩在那兒講過學的地方。這時是一八三九年，正當尼古拉第一的極端專制在絞殺俄國的任何自由思想，普遍的不滿廣佈在受壓迫的農民與遭鎖鍊的知識分子當中的時候。巴枯寧那數計地震的靈魂把一切的社會不安都刻記下來，於是他在上外國去找尋武器，與他自己早已深深感到的罪惡抗鬥。

此時在柏林革命的少年黑格爾派，以費爾巴哈爲首領，正在形成。巴枯寧熱心的參加他們。他的大胆的個性，他的勇氣，由費爾巴哈的哲學前提，得到最革命的結論的勇氣，都使他的教員及同學們吃驚。關於

這一階段他寫着說：『我在人中尋找上帝，在人類的自由中在革命中找上帝。假如我能夠，即使是一部分的，對於斯拉夫人的解放有點貢獻，對於我的國家的解放有點貢獻，我就有福氣了。假如我能為波蘭為俄國人而死，我就有福氣了。』

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的影響，巴枯寧變成了戰鬥的無政府主義者。他的社會要否認一切權力，因此他和上帝的觀念發生衝突，因為上帝是權力的來源。由這兒他發展了他的無神論：『教會與國家這兩種都是我的野豹（特別討厭的）（Peter's hares）。』凡是別的受政府控制及唯政府之利是趨的機關，他也是非常討厭，科學與學術的賣淫制度他也反對。『理論地學來的罪惡，也許比什麼都更糟。它像慢性的毒藥似的，侵入人的一切思想，感情，意志，心和腦，奉着那虛偽而誇大的『文明』的名義，創出一種最為剝削人民的理論。』

『宗教是搆統的瘋狂，同時因為它是傳統的，已經深入於人們之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的骨髓，它就更加強而有力。』巴枯寧常批評福祿特爾的警句：『假如沒有上帝，就該創造一個。』他把這話倒過來說：『假如有了上帝，就該把它毀壞掉。』他說人的進步就因為他有革命精神。他在聖經神話伊甸園中『人類的墮落』，找出來了這精神，因為他要承認自己，把自己由真的或假的上帝或自然的權能中解放出來，因為這一場革命，人類就脫了獸的領域，變成了人。『由於反叛和知識，即由於革命和思想，他開始了獨立的人類歷史及他的人類發展。』雖以這種反抗，人類還是會去對神祇屈服，這原因乃在於自然及其力量的

壓迫太大，使他覺得自己不能控制得住。於是階級區別一興起，宗教不免於變成統治和強迫服從的工具，服役於統治階級。要使人脫離上帝，要先去掉創造上帝的東西。宗教起源於對自然的軟弱無力，同時也由於對專制勢力不能抵抗。只有一個救治的法則，就是社會革命。

人類變成了上帝的奴隸，因此也就是宗教和政府的奴隸，因為政府是宗教所承認的。「如若上帝存在，人就是奴隸。」巴枯寧這樣說：「但人類能夠，也必然會自由，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在這兩難之間，人必須要挑一樣，沒有逃避的希望。」巴枯寧挑了自己的道路，專心致力於指示宗教如何的壓低了人類；它如何小視腦力，而腦力應該是求人類解放的有力工具，它如何激起懦弱，奴役的主要原因；它如何抑低人類的勞力，使它成爲奴役的根源；它如何講求服從將順，以爲美德，毀了人的驕傲和尊嚴；最後它如何的犧牲動物與人類，斬掉了同胞的感情。

巴枯寧反對那些唯心哲學派，因為要抬高上帝，就把人類的好品格稱之爲神聖的。他說：這樣幹「是無條件地承認人類自己不能創造這些，即是說若讓人類自己去，那麼人性本身是可憐的不公正的，卑劣醜惡的。」就在這一點，宗教與真正道德矛盾。巴枯寧拒絕了上帝，他信仰着自然及自然最高的產物，人。他說這是唯物論。他解釋說：「凡在實際的世界存在着，在人類及不在人類的都爲物質。理想只是人類頭腦的活動。但因為腦經純粹是物質，所以它的活動也和一切東西的活動一樣，是物質。所以我們所稱的物質世界並不拒絕思想，反之，却包涵它。」

巴枯寧解釋他自己如何由極端的唯心論，變到極端的唯物論與無神論。他引用黑格爾的辯正邏輯說：『既然唯物派的起點是物，物的否認必是心。與實際世界的中心脫離，與抽象地稱為物的脫離，唯物論邏輯他必然發展到實際的理想化。人類方面的理想化，達到完全而最後的社會解放。反之，既然唯心派的起點是心，以同樣的原因，這種教訓必然達到社會的物質主義，建立粗糙的專制主義，以教會及政府的形勢，實行卑劣而不公平的剝削……換句話說，在生活上，你往往碰見唯心派完全以實現最卑賤的物質要求為中心，而唯物論者却追求與實現最理想的目標和思想。』巴枯寧的結論是：『無論何處，宗教及哲學唯心論（後者不過是對於前者多少自由一些的說法）在我們這一時代裏當作是物質榨取的標幟，而另一方面唯物論的旗幟，經濟平等與社會正義的紅旗，則由實際的理想主義高舉起來。這旗幟的主人，飢餓的被榨取的大眾，雖在死的威脅之下，仍然奮鬥着，要實現每個人的最大自由和人權，要在地上使人類成爲一體的同胞……』

思想的陰謀

在俄國十九世紀的前半以傳佈很廣的『思想的陰謀』而結束。這詞句是當時檢察委員會中的人們起的，指着培特羅些夫基的案子而起的。這案子是關於一羣宣傳激烈思想的人們，他們的領袖是培特羅些夫基（N. V. Petrashovsky）。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震蕩了西歐一切皇帝王子們的寶座，同時也把尼古拉第一駭壞了。於是他開始來搜查俄國的陰謀。結果在一八四九年被他找出了『培特羅些夫基的一羣』(Circle of Petrashevsky)說他們宣傳激烈思想，志在推翻俄國現存制度，舉行了有名的審判。六十三人受了審，二十一人判了死刑。已經在他們經過了候死的痛苦之後，在行刑的幾秒鐘之前將他們放了，流逐到西伯利亞去，其中有一個就是陀思妥夫斯基。這樣，尼古拉想打破俄國思想的權力。

正如司坦克維支影響培林斯基和巴枯寧一樣，培特羅些夫基也是聚集了許多朋友們在他家裏討論社會哲學和宗教。『培特羅些夫基之羣』極其民主的，它的意義也就在這兒。三十年前，當十二月黨陰謀推翻皇室的時候，他們只容許貴族中的高等人物參加他們那一羣。培特羅些夫基的一羣却不然。被捕去的六十三人中，一個都不是出身上層階級的；他們都是教員，作家，小職員，學生，幾個地主，和店掌櫃的，總之，都是一班下層人物，十二月黨認為是不配有革命思想的。總共起來，培特羅些夫基的一羣，共有兩千人在他的影響之下。

培特羅些夫基 (N. V. Petrashevsky) (1811——1866) 的父親是醫生，祖父是牧師，他自己是聖彼得堡大學的法律系畢業生。從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九他被捕為止，他都在外交部任職。他的主要興趣則在於研究及宣傳前進的思想。他接受了法國烏托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傅利葉等的思想，他的家不久就變成了宣傳這些以及其他激烈思想的機關。培特羅些夫基急切的要教訓他的國人，準備那不

不可避免，迫在燃眉的革命運動。他抓住每個機會來作這件事，即以當時的嚴厲檢查，差不多使印刷品無法流通，他都有法躲過。特別的，是他和他的朋友們所著的外國詞典，其中載有文章，解釋各種主義，及一些哲學家的生活小傳。所以在講「自然主義」這名詞時，培特羅些夫基便著文解釋費爾巴哈的自然哲學，在「新基督教」中，就解釋聖西門在講蒙蔽主義（Obscurantism）及神諭（Oracle）時就批評宗教的迷信。在講樂觀主義時就提出十八世紀的唯物論。用這種方法，革命思想就借著參考書的形式而大大流傳於俄國社會了。培特羅些夫基並不覺得他要作政治工作，他並沒有什麼革命計劃如十二月黨人的。他是一個宣傳者，他相信等到時候一成熟，自有領袖出來建立新的制度。

自然，他是一般的批評教會及宗教制度的。一八四八年的歐洲革命危機，促成了培特羅些夫基一羣的運命。而思想的陰謀，雖以它過去在十九世紀第二季頑強地存在着，產生了許多聰明專誠的人物，如培林斯基，赫爾震，巴枯寧，培特羅些夫基以及其他等人等，至此也告了結束。在這一期中，反宗教體系已經堅固的建立，且一天一天的變為明顯的無神論。培特羅些夫基的一羣遭受打擊後，放逐與逃亡吞滅了一代的革命思想家，以備產生出更多，更民主的，更受羣衆歡迎的知識分子及政治領袖。到十九世紀末葉，那羅尼克運動分爲幾派，資產階級自由派，無政府主義，革命黨，和馬克斯主義運動。這些派別的立場與戰術各不相同，都是要推翻專制政府和教會的。

第七章 知識分子的尋求上帝及托爾斯泰的宗教無政

府主義

由於赫爾震巴枯寧等人的激動，俄國知識分子都發動到民間去，宣傳解放的福音，從舊傳統，舊宗教及舊的經濟政治壓迫下解放出來。這一運動，把許多青年和知識分子從他們的家庭，從他們的學校中跑出來，帶起自由的福音到民間去宣傳。在羣衆之中，他們發現有的人倒也熱心聽從，有的則屬於好奇心的鼓動，但一般的說來，他們只見有冷淡，無知，整個的迷信，而且超乎一切的，是那班工人和農民們雖以他們無間斷的工作，然而不見有絲毫效力，他們還是喪氣無望的窮苦。這些事實使青年熱心家們失望悲觀。

怎麼辦呢？要移去重壓在農民身上的羣山，是用得着比口頭筆下更強大的勢力的。有些少數留學國外的知識分子，見外國的工業革命與都市化所產生的結果，還有少數研究過馬克斯主義的人都贊成機器輸入俄國，使農民無產階級化，使鄉村新的階級生長起來，都市布爾喬亞快快成長。馬克斯主義普遍起來，最冷靜的頭腦也同樣地注意它，在產業工人中也有不少的回應。社會主義變為羣衆運動。有些不懂馬克思主義，由於感傷主義脫不了那羅尼克運動中的浪漫習氣，變得失望而趨於恐怖主義，陰謀暗殺俄皇，他的遺恨的部臣和他的警察領袖們。那羅尼克運動的剩餘分子為些小團體來作政治行動。其中的人民

自由黨，後來發展為社會革命黨，為許多知識分子，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及少數工人和農民所信奉。

別的知識分子因為階級利益限制他們不能參加革命運動。要不是各人罷手，去經營日常生活，就是逃入宗教哲學和美術裏去找安慰。這一點說明了一班半宗教的哲學信仰，如托爾斯泰運動，如一些神秘派，靈性派的發展。這班知識分子，上帝尋求者（God-Seekers）都是悲劇的角色。對於革命失望了，脫離了俄國正教，充滿了懷疑，但又急於要得到可以支持自己的信仰。他們拼命的要把『人生的目的和意義』這問題找到一個滿意的答覆。這輩人中，最出色的是托爾斯泰和陀斯妥夫斯基。自一九〇五年大革命失敗後，一般人更逃入宗教，更想找出一個由智力方面說來比較滿意的宗教。在這時候，甚至於有些馬克思主義者都支持不住了，都往宗教跑，都向教會投降。這種『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布卡可夫（Sergius Bulgakov，伯底葉夫（Nicholas Bortyayev））還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行動者，如盧那卡爾斯基和高爾基，都想把宗教和革命的目標聯合起來。於是他們變成了『上帝製造者』，因為他們不願復歸於舊日那模糊的正教，但想造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宗教，可以保存宗教的價值，而不需接收教會的信條。

人生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這是俄國思想界當前一個大問題。它變成了一切主義的樞紐，一切無神論，有神論，個人主義社會主義都要着它轉去。大學中的青年男女因此都要去服務，去犧牲，去自我表現。青年男女出身富家貴族的，往往打破家庭束縛，放棄社會權利跑到民間去，忍受政府和教會的壓迫，去為那些無知而迷信的農民謀福利，但反遭他們『不以為德，反以為仇』的待遇。

這些革命復燃的情形，每遭教會的壓迫，被俄國專制政府加以重大的打擊，一直到最後，這政府與教會被大戰與一九一七大革命掃蕩了為止。

每次革命的失敗，隨着必有一次精神的抑悶和一般的失望，表現而為宗教與道德的顛倒混亂。神秘之流趨於極端的宗教個人主義和神秘主義；別的變為冷酷的憤嫉，藐視世界及他們自己的精神意識。道德的頹廢，和一般社會的崩潰，就是這種沉悶期的特徵。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精神上的孤獨與道德性的失望，表現而為大學生自殺數目的增加；一九〇二年有十起；一九〇四年（革命的那年）有二十起；一九〇六年（反動開始的那年）有七十一起；一九〇七年（反動增長期）有一六〇起；一九〇八年（反動最高期）有二三七起。

日俄戰爭後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敗後，俄國知識分子的道德頹廢達到了最高點。既然覺得自己不能得到政治和經濟的解放，俄國青年於是起而反抗道德法律。一九〇七年阿威巴瑟夫（Artybasher）發表了一部小說叫山寧（Sannino），其中所藏就是這種反抗的哲學。經由山寧的口中，阿威巴瑟夫嘲笑為政治權利的鬥爭，主張毫無限制地滿足個人的快樂和慾望。他覺得人生要有什麼理論，要被什麼主張管束着，要注意什麼上帝的問題，要有什麼良心的主張和限制，都是費話。酗酒和淫縱都不是可恥的，世界上也無所謂罪惡。愛喝酒，愛女色，都是男性的，也是自然本能，既是自然的，就不能說是錯誤的。他說基督教教人違反人的本能而生活，所以『在歷史上，基督教就佔了很重要的位置，而耶穌基督的名將還要繼續地』

壓迫人類下去，像一場詛咒。」這種不道德的無政府主義，立刻就有青年們起而傲傲。有些青年男女被邀入專門會社，去「無限制的滿足自然慾望，」在國會中的人，說起來稱之為「山寧道德，」政府並不限制它，因為山寧主義在政治上是並不危險的。在這種試金的時期，只有少數人還保持着舊日的信仰，也就全靠這幾位保持信仰的人變為革命復活的領袖。

在戰敗期中，知識分子就去自我分析，自我否認，去抱一種彌賽亞式的，預言式的希望，有一個好的世界來到。

俄國教會對於這種將來新俄羅斯的領袖，青年知識分子所有的覺醒，要不是不去理會，便是公開壓迫。所以革命成功後，革命領袖們對於教會一點好感也沒有。在這時期，也有極少的幾個牧師們反對教會的舉動，但很快就被那萬能的教士領袖把嘴封起來了。

事實上說來，現在蘇聯已經不能說有一個單獨的知識分子的身分存在了。革命已經把這一羣分散，精神上退了兵，走入宗教和頹廢中去了的，都逃到西歐去當寓公，他們不能與自己的人民共甘苦，他們的工作也於人民無用了。這種逃亡是這類人的悲劇的最高點。這時在流亡中，他們的文學都是宗教哲學的表現，這般流亡者的心理。這種文學都是極端國家主義的，神治主義的。它認為教會是革命後唯一殘存的理想機關，它詛咒無產階級革命與蘇維埃政治，那是反基督教的。這些逃亡的知識分子，預言式的認為蘇聯要倒臺，他們等着，等到多久呢？十五年已經過去了，一代新人物，以他們的新思想新希望出現，遲早那

這一代的知識分子也許會回頭，至少他們的文藝工作也許會對這新時代有用。可是他們很不容易受人喜歡和了解。

托爾斯泰的生活與教訓，在俄國宗教史上自有它特殊的地位。有一個時期，它也影響了一部分的知識分子，這班受影響者，多半是本身的階級利益和性情使他們不能參加革命的人。有些傳教派也受他的影響，不過後來這些又回到他們的正統傳教派去了。革命以後，有些托爾斯泰派利用時機，努力推行一種運動，要實行他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吃素會組織起來了，他的通俗宗教文學傳播了，於是興起了一羣托爾斯泰派的農村公社，依共產主義的理想而進行。

托爾斯泰派之無政府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宣傳，起初不受蘇維埃政府的干涉。但自列寧一死，接着政策改變，在蘇聯托爾斯泰運動就成爲無關重要的東西，現在簡直沒有什麼復活希望。不過另一方面，在他國家裏，托爾斯泰的影響倒是更大，因爲在那些國家，情形更適於這種理想。廿地就把托爾斯泰的觀念適用於他的運動中，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主義者也奉托爾斯泰爲他們的先知。

若是我們轉看托爾斯泰的宗教教義，尋找它的來源，就知那都是他的時代和他終身思想生活的經驗。他的主要工作都在一八六一—一九〇五之間，這兩個年份，刻下了一個時代的開始和終結。它的開始是農奴解放，它的結束是一九〇五年革命。這一時代的標誌，是農村紳士階級的崩潰，與都市資產階級的成長，同時變鄉村貧農爲無產階級。托爾斯泰深刻的感到了這一轉變的時代。他的出身，他的教育和社會

地位，都決定了他屬於那與他的時代同命運的階級。他的悲觀主義，他的神秘性的不安，他的要求脫離他的階級生活，沒入平民中去的原因都在這兒。他預感到洪水的到來，所以激烈的反攻着政府和教會的虛偽，攻擊那時代的經濟與社會制度，那建立在殘酷的壓榨都市和鄉村的貧苦大眾身上的制度。在這方面他是站在革命的一邊。但他的反抗是與眾不同，有一種藝術的悲劇的表現。

列寧及其他革命家們，既不同情於托爾斯泰的神秘主義，也不贊成他的無抵抗的辦法，但他們都異口同聲承認托爾斯泰暴露及攻擊他們共同敵人的特殊能力。托爾斯泰對他同時的制度的批評，與從事勞工運動者的批評的不同點，就在於托爾斯泰是立足於主張訓育的天真的農民身上。他把他們的心理轉為他的批判和教訓。因為這緣故，托爾斯泰的批判是有如此的感情的力。如此的熱情，是如此的令人折服，新鮮誠懇，大無畏的剖露事情的根柢，發現羣衆痛苦的真正原因。鉅萬農民初從農奴制度得了自由，而這自由乃不過是新的破滅，新的餓死，新的無家可歸，流落於都市流亡者中間。這種突然變化，所生的情形都在他的批判中表現出來。托爾斯泰真誠的表現他們的情緒，在他的教訓中包含着他們的天真的簡單，他們的不懂政治，他們的神秘主義，他們的逃世願望，他們對於罪惡的無抵抗主義，以及他們那無補於事的對於資本主義與金錢的咒咒。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包藏着鉅萬農民的反抗和失望。

托爾斯泰的宗教發展

論托爾斯泰的人們有些稱他爲一個藝術家和文學天才，有的則說他是一位宗教哲學家 and 宣傳家。不過，若仔細考察這人的生平，就知道他由兒童時代起，已是有宗教性的一位夢想者，一位新宗教的先知。在他的一八五五三月五日的日記上就有一段如此說。在這一段中他說他已經找到了一個新的宗教，與一個發展相應的基督的宗教。這宗教沒有神秘主義，沒有信用觀念，也不把什麼將來的恩惠許人，但它却能給人以恩惠。他以為這宗教必須要有歷世不斷的努力才能實現。這宗教的基本觀念是有意的努力，以宗教結合大衆。

凡仔細讀過托爾斯泰的讀物作品，同時又稍稍知道一點他的生活的人們，必都會承認如下一件事：他的作品無例外的都是文藝形式的自傳，清清楚楚的表示他的偉大靈魂。在他初期的作品：兒時童年青春期中間，我們已經能讀到他的精神奮鬥與努力，想要形成幾條關於行動上的準則，使他的青年生活虔敬而富有意義。不過這些高尚的觀念主張，常與他尖銳的良心，他精銳而批判的智力，及他生理上的熱性相矛盾。簡單說來，在他心中就如在浮士德博士心中一樣，有『兩個靈魂』彼此互鬥。哥德使他那位大英雄秉賦了善與惡的動機，托爾斯泰也在更寫實的形式中，用他小說中的英雄們表現出這種現象，也就表現出他自己的經驗來。在安娜卡倫琳娜 (Anna Karenina) 的伏康斯基 (Volkonsky) 哥撒克人中的俄冷尼可夫 (Olenikoff) 黑暗的權力 (The Power of Darkness) 中的尼基塔 戰爭與和平中的別蘇基 (Pierre Besouky) 復活 中的涅克陸朵夫 (Nekhlyudoff) 特別是塞捷斯神父 (Father Sergius) 中

的卡沙茨基公爵 (Duke Kosotaky) 這些人生動的表现出托爾斯泰自己精神上的混亂激動，及其最後勝利三十年來他都把這些經驗藏在文藝的外形中，直到他的懺悔出世，世人才都清楚。在這樣的聲明之中，托爾斯泰公開了他那被熱情蹂躪的內心。他用如下的譬喻來表現他的失望時期：

『故事上說，有一位漫遊家在一個野原上受了驚，被一隻猛獸追趕着。他逃跑的時候，在道中遇着一口古的枯井。但在這井底，他發現有一條大蛟龍躲在那兒，專等有誰掉下來，落入他的掌中供他吃。他更加害怕。失望之中，這不幸的漫遊者發現井中有一個樹枝倒掛着，於是他就攀着那樹枝，在兩頭危險之中懸掛在那兒。誰知他忽然又看見有兩隻老鼠，一黑一白，在咀嚼他所攀掛的樹枝。他於是知道自己已是命中註定要死了，那樹枝不久就要斷，他就要掉在那蛟龍的口裏了。在失望之中，他見由樹枝上掉下了甜蜜，他忘了自己的危險，且自去吃那甜蜜去。托爾斯泰說：『就這樣，我就懸在我的生命樹上，準知道那蛟龍無論什麼時候會把我吞掉去。我却舔着地上快樂的甜蜜，但它終不能使我滿足。因為我知道那一黑一白的老鼠——黑夜同白日——在促我走入崩潰。』

不過托爾斯泰並沒有對失望屈膝，他告訴我們，他如此的尋求光明，要脫離包圍着他的黑暗。他弄得筋疲力盡，結果想要自殺。正在這時期，他發現了俄國那天真的農民們那種赤子般的信仰，這是他那受了創的靈魂的香膏。於是在懺悔中寫着：『我找到真理了。這真理就是，人因為自己的行為是惡的，所以喜歡就黑暗而避光明，這一點是福音書證明了的。凡作惡的必恨光明，除非他的惡能改掉，他是不就光明的。』

我現在知道人若要找着生活的意義，那麼人的生命必須要有目標，且不作惡，並且人還應該思考自己的生命，懂得它的哲學。」

於是托爾斯泰開始了他的宗教活動。不過這並不是一種運動，像馬丁路德等等所作的，而為思想上的改造，如盧梭等的行動是。托爾斯泰和他的同時人們並不合作，這些人是要謀俄國的社會經濟的解放的。他反對社會革命運動，在革命上他是被稱為以不抵抗主義緩和羣衆的革命情緒的人。

既不與革命領袖相通，他就接近和平主義者。他們彼此之間有相互的影響。其中最奇特的是他和一位農村先知的結識。這位蘇塔葉夫 (Ivan Sutaev) 是一個農民，屬於特佛爾政府 (Government of Tver) 之下。在夏天他就到彼得堡去作石工，冬天自己讀新約聖經。這樣，他得到了他的宗教真理。對於他真正的宗教就是愛，日常生活中的愛。他反對那些聖禮，因為牧師們業此為生。他主張取消私有財產制度。他把白己的財產分散，燒燬了田契房契等等。他不肯繳租稅，拒絕當兵役。當他的小兒子被選為後備兵士要宣誓，他就說：「你不可以起誓，」給他槍，他不要，說：「你不可以殺人。」（這些都是聖經中的話）他以為沙皇是好的，但被大臣蒙蔽，於是他去彼得堡求見，都被拒絕。

這人和托爾斯泰的所見和行為是多麼的相同呢？托爾斯泰承認自己由不識字的人們那兒學習了許多。和蘇塔葉夫一樣，他相信只要有福音的真光能照亮那些有知識者的黑暗心腸，一點點能與有權力者的心接觸，他們就會自願去接受革命家們強迫他們去接收的，而天國會降臨在世上了。托爾斯泰不願

承認社會的階級性質，同時他也看不出他和蘇塔葉夫這種個人努力的枉費。托爾斯泰式的居留所，不但在俄國，在世界各地的也已經無所保存。他們最多不過沙漠中的小小沃原，能使在資本主義文化的沙漠中漫遊的人們稍得休息，但草原決不能改變沙漠。遲早當他們的熱心一枯竭，這沃原就專變為沙漠了。

第八章 共產主義的宗教觀

共產主義的宗教觀乃是共產主義哲學的一種產物，與俄國革命運動的反宗教傳統是一系的。

在前幾章，我已指出法國的百科全書派唯物論哲學如何將俄國知識分子的宗教信仰及傳統慢慢地剷除了；它的影響如何如何地一天天擴大；最後無神論如何的變為革命知識分子的體系等等。由於費爾巴哈以人神同形論來解釋宗教，黑格爾的哲學與法國的唯物論，合流造成了馬克斯的辯證法唯物論的前途。

馬克斯對宗教的態度並非感情的。他並沒經驗過由祖傳信仰分裂的那種痛苦；雖然他祖父是個猶太的拉比（教師），他却不信希伯來宗教。他父親從事律師業務，是一位自由思想者，受法國啓蒙運動的影響不少。他由他自己的宗教脫離，變為一個新教徒。馬克斯的處理宗教問題，是以哲學家及歷史家的態度。他揭出了它的社會經濟的性質，稱之為『人民的麻醉劑。』

恩格斯與馬克斯是共同創造辯證法唯物論的人，所歷宗教的變化，脫離家庭信仰的掙扎，都比馬克斯更為可憐。他父親是個有錢的創造家，是熱心的傳教派，這人竭盡心力要把兒子弄來跟從他那一派。年青的恩格斯與之反抗，參加了革命運動，脫離了他父親的家庭。這些少年時的經驗，使恩格斯比馬克斯對於宗教及玄學問題，更加敏感。

馬克斯認為宗教乃是一種社會現象，立在某一特定人民的經濟基礎上的上層意識建築。在他們的德國意識形態 (German Ideology) 中，馬克斯與恩格斯說：『人類頭腦中的模糊印象，必然的是他們的物質經驗的昇華，與物質情形是有關係的。』

因此，宗教只是社會經濟生活的產物，經濟生活才是基礎。支配着經濟基礎的階級，自然也就支配着它的產物，利用它以求自己的利益。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統治階級被新興階級推倒，正如封建制度被城市資產階級推下去一樣。民主主義的鬥爭，採取了宗教觀念鬥爭的形式。因社會科學的發展，人類自不需要宗教觀念了。

馬克斯和恩格斯把黑格爾哲學倒過來，將辯證法唯心論變為辯證法唯物論，這哲學理論決定了他們對宗教的態度。他們之所以如此，其始是受了費爾巴哈的影響。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指出宗教的內容和主旨全是人，神學是被顛倒了的人類學，所謂神的本質就是人類的本質。不過宗教並不感覺到它的人的內容，它倒以為是相反的，不承認它的人的本原，即不承認上帝是依人的形象所造，反以為人是依上帝的形象造的。對上帝的意識，不過就是對人類的意識。人能抬高自己超乎個人的限界，但不能把自己抬高到超乎其類的地步，不能超乎那種人類的法則和主要特性。人能夠思想，想像，感覺，和愛，如一個絕對的神聖存在，即人類的存在。

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識。這就是使它神聖的所在。宗教所謂最初的（上帝），其實乃是次一位的。因為

上帝不過是人的客觀存在。宗教所置於其次的（即人）應該稱爲是第一。對人的愛，並不是後天的，乃是先天的。只有那樣愛，才是真實的，神聖而可靠的力量。如若人類的本質就是人的最高本質，那麼對人的愛必就是人的最高而第一的法則了。人類就是上帝（*Homohominid deus est*）這是世界史之最高的實際基礎及轉寰之點。正義，真理，善，在它們的本身都有它神聖的本質，在它們的質性中也是如此。對於人不會有比它更高的存在。這些就是費爾巴哈反宗教論的主要觀點。但他不能否認宗教，只不過將他擱在一個更高的人的基礎上。費爾巴哈以爲他的宗教解釋乃是一個進步的步驟，走向更深刻的自我表現。但他的學生們却超過了他。馬克斯和恩格斯形成他們的辯證論哲學，認爲宗教的將來，會因爲科學一天天昌明，人類智慧與能力從階級榨取下解放出來，而與人類的無知軟弱同歸於盡。馬克斯說：『上帝的萬能，乃是人類在自然和他們所自造的社會經濟關係前無能而軟弱所投出來的幻象。直到人類間人與人的日常關係，及人與自然的關係都能達到完全可理解，完全明白的地位時，這種現實世界之宗教的反映便可消滅。社會的生活過程，即生產的物質關係永不會失掉它的神秘翳目的作用，除非它能變爲生產者自由結合的過程，在生產者有意識有目的的控制之下。同樣的恩格斯也在他的反杜林論中講：『如若人能够不但期待着去管理，且能實際的諳練操縱社會過程，那麼，一切至今還在反映，而爲宗教的外面勢力，都會消滅，同時宗教反映也會消滅，因爲已經是沒東西可反映了。』

列寧是費爾巴哈馬克斯及恩格斯精通的門徒。他同意馬克斯恩格斯的意見，以他們的觀點證之於

俄國的實情和背景，斷定宗教是階級榨取之最惡的工具。階級消滅，宗教自不能生。以此，他努力喚醒民衆去作革命工作。與宗教徒派就走到衝突的地步。『馬克斯主義永遠認爲一切近代宗教和教會，一切各種的教會組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工具，用來作爲榨取作爲麻醉勞苦大衆的解說。』一方面列甯是反對一切宗教，毫不妥協的，同時他又深知宗教植根於社會經濟條件裏面很深，所以他反對只是限於智的討論方面。『對宗教的鬥爭不宜局限在抽象的觀念宣傳……這一鬥爭必定要在階級運動中引起具體的作用，剷除宗教的社會根株。』

這些根株是什麼呢？勞苦大衆的社會沒落，及其對於資本主義之盲目勢力的無能都是。『恐懼創造了上帝；對於盲目資本主義的恐懼，因爲它的行動過程，勞苦大衆不能事先預見得到。無產階級及小雇主們每有牽動，都會招出突然的料想不到的破滅災害，把他們變成乞丐和娼妓，結果只有餓死。——這些都是近代宗教的根株。』宗教生活在勞苦大衆的社會經濟關係上面，由於自然界人不能制的盲目力量，遂使宗教信仰更加深刻；而宗教乃成爲一種麻醉劑，使資本的奴隸能得到暫時的解救，然而也在於犧牲了人類價值，才能得到。

宗教之別的根株，是以往的社會政治機構及其模糊的觀念、習慣和傳統。這些東西本身也就是過去社會經濟構造的上層建築；現在又與新的交融。舉例如回教人待遇婦女，如基督教的大節日，聖誕節及復活節都是根源於公元以前古代農業人民的自然崇拜。最後還有宗教之認識論的根株。這些都是有社會

性的，因為人只能依實際經驗來思想。人的意識分裂而有了抽象的『觀念』，由此觀念產生了觀念論的哲學，宗教是與這種分裂有密切關係的。

列甫認為毀滅宗教的工作本應屬於資產階級，這階級推行了工業革命，將社會建立在實用科學上面。列甫說：『與宗教鬥爭，乃是屬於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工作。在西方，當資產階級民生革命以及應用資產階級的力量來壓迫封建制度和中世紀主義的時代，這工作頗由民主資產階級推行了不少。在法國和德國都有資產階級反對宗教的戰爭，在社會主義以前很久就有了。』不過資產階級一登臺就不反宗教了，因為它們看出用宗教來統治那不馴的羣衆是很有價值的。於是它很快就來求教會幫忙，甚至於在法國，資產階級戰鬥的無神的古典國家，他們的革命領袖都與天主教妥協。

無產階級的領袖不能像資產階級領袖們那麼幹。他們要有新的生命觀，使大眾知道宗教並不是必要，人生哲學中不需上帝是可能的。這種理論不但不會破壞人民的道德，且使他們更能有社會經濟的意識。要使讀者明瞭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宗教不能相容，我們不可以不了解共產主義的哲學原理。

共產主義的人生觀

以理性的觀念建立起人類和宇宙的關係，就謂之人生哲學。因此它的首要任務必須要達到一種存在的理論，或最後實在的理論，這種哲學家們往往稱爲是玄學的或本體論的問題。其次人就要決定究

竟經驗和感覺可靠不可靠，結果就是知識理論或認識論的問題。最後就是人生的目標和方式的問題，這包含了有關於社會生活與行為的發展的理論在內。

共產主義的人生哲學，建在一種系統思想稱為辯證的，歷史的，經濟的唯物論上面。本體論及認識論的問題，在辯證法唯物論中討論，社會宗教及倫理問題在歷史的唯物論中討論。經濟問題則在經濟唯物論中討論。三者合在一起：辯證法，歷史，及經濟唯物論，又總稱馬克斯列寧哲學。共產主義的宗教理論就由這裏出來的。

辯證法唯物論和一切別種哲學相似，首先就得弄清楚它對於實在的觀念，及說明它發展的法則。與一般觀念相反，辯證法唯物論的「物」或「實在」，與舊機械論或原子說唯物論不同。它認為這種機械論與近代自然科學矛盾。舊日的原子唯物論及其宇宙的無形的「磚塊」，辯證法唯物論是不接收的。生命和心腦是不能歸入於機械動作的。昔日牛頓主張因果說，以為這是動的不斷連續，現在不再適用了。近代的相對論，近代的遺傳論，定量論，以及心理生活的性質等等，都把那舊的轟掉了。

辯證法唯物論的淵源有長期的發展史。恩格斯已經指出來，辯證法唯物論是法國唯物論，烏托邦思想，以及大哲學家司賓諾沙至黑格爾的綜合。辯證法唯物論主張自然的或物的一元論。司賓諾沙相信只有一種本質或自然，那他也稱為是上帝。這本質是實在的，獨立於人類意識之外，先於人類意識的。它有許多性質，其中有兩種：外延（Extension）和心神（Mind）是人類經驗中所知道的。這兩種性質不同，但它

們是不可分離的統一體。辯證法唯物論也承認只有一種本質或自然，這自然永恆的動，但不是機械的活動。辯證法唯物論所講的動，是相反的或矛盾的動。心神或精神的性質是經常存在於自然間，但它在物的高級組織出現，成爲意識。

列寧對於本體論及認識論的問題用過許多思想。他在辯證法唯物論及主觀哲學、感覺論哲學之間，下了很分明的界說。保有對於世界的主觀知識，而忽略知道它的客觀刺激的可能性，這種觀念對於他，等於是說，有思想沒有腦經。他說一個唯物論者是把「物當作先天存在，而以意識、理智和感覺當作後天存在的東西。」列寧問是否世界的存在對於人類及人類經驗是獨立的。他的答覆說，在人類經驗沒存在之前，世界早已存在了。因此，實在是獨立於人類意識之外的。據列寧，物就是在我們的感覺機關上起作用，產生感覺的。它是對人類心腦獨立的存在着，又被這心腦反映出來的客觀現實。

既承認了客觀世界的存在，於是空間與時間的問題立刻走了出來。康德和一般觀念派哲學家們，都認爲人類智力所秉賦的了解，自有它的格式，就是空間和時間。另一方面，辯證法唯物論雖也承認這些觀念的相對性，但以爲否認空間時間之存在的哲學是沒道理的。

辯證法的法則

從哲學的意義上說來，辯證法就是自動，而不是普通機械的，被外來的力所推動的動。它是由於內部

需要所促起的動，這種需要乃是宇宙與物之存在的內在法則。列寧爲辯證法下定義，以爲那是知識的理論，是研究宇宙動的法則的方法。他說：『辯證法是一種活的，淵博的學問，它的外延不斷的增加，它的內包也層出不窮，可是它是近於現實的。』

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辯證法始於黑格爾，可是超乎黑格爾，它用這種法則來應用於對實際世界的研究，而不用於一個想像中的絕對精神，即黑格爾思想的對象。列寧說：『它是在自然界的現象及過程中，認出兩種互相抵觸的相反傾向。』它可普遍應用於研究自然，社會，以及人類的心智活動。所以馬克斯列寧主義主張人能够知道客觀世界，因爲它是被人類心智中起作用的法則控制着，後者也就是同一自然中的一部分。

在辯證法過程中注重的是自動的問題，在自動之中，某一現象或物體因爲內部的矛盾，其本身孕育出另一與自己相反的物體，這一新體量的成長起了質的變化，新舊兩體取了突變的形式，產生出另一新體來，既不是前一新的，也不是舊的。換句話說：自動過程中有連續性，有突然間期的破裂。這些破裂是這一過程的主要部分。它們表示新綜合的開始，自動連續性的繼續。共產主義的革命理論就建築在這一法則上。其中含有階級分化，矛盾利益的理論，如封建地主及教士，與資產階級及農民的利益相反。在法國革命中所表示出來的就如此。

在生物學範圍中的突變現象，能使某一種在進化過程中的物類發生突然的有機變化，這突變很可

以用辯證法法則中的「突然破裂」來說明，這破裂是經過了一個慢慢的進化的準備階段才發生的。這些突然變化，在化學變化中也會發生，交互滲溶的原素突然破裂，又以新的綜合形式與別的原素滲合。據定景論，則陰陽兩電極的行爲也是辯證法的；在那兒就有着連續的現象，及突然的間歇的破裂。

恩格斯以辯證法的觀點精細的研究了自然科學。他指出來說，辯證法的三大要點同樣可以應用於自然研究，社會研究，及人類心理研究，這三種法則：（一）是由量到質，由質到量的變化；（二）矛盾同一律，（三）否定的否定。馬克斯應用這種假設，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他指出資本的量的堆積，轉爲經濟階級對立的質的變化。每一階段都有它自己的特質，例如小雇主與大資本家就不同，而手工業者與大工廠工人又不同。馬克斯的階級同一與階級鬥爭的理論，把辯證法法則的性質表現得精透無倫。理論和實際之統一，行動與思想的滲合，是共產主義的基礎。

辯證法和宗教

宗教的辯證法的發展，也就是經濟社會生活之辯證法的發展的反映，在一種定型了的社會中，矛盾的生產關係產生出矛盾的對立階級，這兩階級之經濟的矛盾，不能不反映到他們的意識生活，其中包含着宗教在內。這樣的形成宗教上的對立，不但在組織上，也是教義上的。正如封建國家主張奧他克拉西（Autocracy），資產階級主張德謨克拉西一樣。新教徒的教義也與中世紀寺院派及教皇派的教義不同。

矛盾破裂而爲十七十八世紀的宗教戰爭，和其他和平形式的鬥爭，其結果產生了適用於資產階級的基督教及改革了的天主教，它的教皇的權力實等於現在英日的皇帝。於此有人也許要提出這樣的意見，以爲如果如此，則無產階級鬥爭的勝利，自然也可以弄出適用於無產階級的宗教，甚至無階級社會的宗教來，但宗教和其他上層建築不同者也就在此。宗教的心理起源是人的軟弱，對於不可知的人事與自然的畏懼，因此它的內容中天然就存在了兩種象徵，兩敵對階級的東西：一方是不可知的萬能權威的上帝。有指導一切，裁奪一切的恩與力；另一方是兢兢業業托庇於上帝蔭下的小民，有服從，柔順，畏威，懷德的義務。無產階級的徹底勝利既能解除這種心理上的宗教根源，而經濟社會的組織又足以保障。使野心的支配階級不能產生，來利用及鼓吹這兩種宗教內容。尤其是把它們結合在一起，成爲一物的兩面，似乎宇宙就是這麼形成的。這樣宗教自然要消滅。其所遺下的好的部分，如對人類的偉大感情，將由人人自由向人類供獻勞力，從人類取得熱情及友誼的酬報來，擔負及表現了。

第九章 教會和革命的衝突

前一世紀的末葉，俄國歷史上最initial的罷工鬥爭開始於彼得堡紡織工人中，很快就蔓延到各都市各工業部門去。這些事變把政府駭壞了。沙皇的政治家中有些遠大眼光的人，看出在俄國勞苦大眾的生活中，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祝巴托夫（Zubator）俄國祕密警察的領袖有如下的一段話，很中肯要。他說：『工人階級是如此偉大的集合力量，是革命家們從來沒有過的利害的鬥爭工具。在十二月黨運動中，在到民間去運動中，甚至於在學生的羣衆暴動中，都不曾有過這種力量。全國的技術都操之於他們的手上，就在這種生產過程中，工人們不斷地越來越接近在一起，這使那力量更加龐大可驚。他們的根底本是農民階級，他們原是農民之子。在上面因為需要特殊知識，所以與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很接近。這些工人階級被危害國家危害現存制度的社會主義宣傳所鼓動，對於現存的制度是一種嚴重的威脅。』

怎樣才能抵擋革命家們的宣傳呢？明明白白，光把他們放逐或監禁起來是不成的，總得作點建設事業。於是政府就想到了教會，及其龐大的牧師與和尚軍。他們覺得這些人大可以遣去活動，把工人們的心理從革命者的影響之下拉出來。在這位祕密警察長一般的指導之下，他們組織了工人互助會，工人文化教育協會之類的東西興起來，作一些類似美國工人青年會的事。會演講有口才的牧師們，都被打發到工廠區域去。他們所擔負的工作就是向那些天真熱心的工人們宣傳，使他們相信沙皇是他們的朋友及

保護人說他會支持他們抵抗資本家，說他有權力，所以工人應該對他忠實，且信仰他。

在一九〇三——四年間，出產了大批的通俗文章，關於社會問題，有十萬份是無代價分送給工人們去閱覽，並把內容講給他們聽。這些小冊子多半都是牧師教士中人寫的。題目都是什麼『工作與財產』、『社會經濟生活與福音』、『富與貧』、『最高權力』、『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錯誤的道路』、『工人問題』、『將來的社會制度』諸如此類。

這些小冊子的內容如下：（一）社會並不像一般教會的敵人們所稱，是與純基督教一樣的東西；（二）社會主義理論上是矛盾的，實行上是不可能的；（三）工人的福利，可以不需社會主義幫助就達到。爲着要在工人的感情生活起影響作用，他們成立了一個音樂組織，其中有羣衆歌詠班，由工人組織，有音樂隊作特殊的演奏。

這種反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及羣衆領袖之一就是加朋牧師 (Priest Georgy Gapon)，他受彼得堡秘密警察的指導來工作，他招起工人羣衆成隊遊行到沙皇皇宮去。一九〇四年年底，在普迪洛夫鋼鐵機器廠爆發之大罷工，參加工人有十五萬人。要避免革命的行動，於是加朋提議把罷工者的冤枉訴之於沙皇，那位廣告上的朋友去，沙皇一定會聽從他們，幫助他們的。

幾千幾萬普迪洛夫鋼鐵機器廠 (Putilov Steel and Machine works) 的工人，被這位牧師的宣傳鼓動起來，走向沙皇的住所去呈遞他們的請願書。那時是一九〇五月九日禮拜日。工人們帶着聖三角旗，

十字架，聖像，旗幟，沙皇的像片；他們唱着讚美歌，準信沙皇會聽他們的。他們的請願書如此的開始：

「我們聖彼得堡的工人和居民，我們的妻子和我們無助的父母，來到你我們的主的面前，尋求真理和保護。

我們窮苦，被壓迫，負着不能忍受的勞苦，我們被人藐視，不當爲人，只當作奴隸對待。

我們總是忍耐着苦惱，可是我們越來越被丟入窮苦，不公道和無知無識的深淵。專制與武斷勒死了我們，我們要窒悶死了。我們再不能忍受了，主，我們的忍耐已到末日了。

我們已經達到生不如死的地步了。」

下文請願書中講着關於時間，關於工資，關於改良現狀的要求，接着是一大堆要求改良的項目，要沙皇把這全國的緊急要求實現。要改良的共分三種。在政治方面，這綱領要求設立代議制的政府，它們是：

(一) 關於免除人民貧困的；

(二) 關於去除俄國人民的無知識及喪失權利的；

(三) 關於反對資本壓迫勞工的。

請願書的結尾是一番求告。

沙皇的答覆是誰都知道的。幾千幾萬死傷者爲俄國的自由而犧牲，而仁愛沙皇的神話也永遠在俄人面前打破了。對於這件由於教會牧師造出來的罪孽，教會如何辦法呢？它並不說一個字反對這種殘忍

的大屠殺。它把罪過全歸在工人及革命領袖身上；它讚美沙皇之堅決的保存專制統治。

一月十六日神聖法院發表了一篇文告，痛責罷工人等竟敢遊行到沙皇的皇宮門前來。在這篇文告中我們讀着這麼一段：

「在首都及俄國其他都市中發生了工人罷工及街上搗亂的事。俄國正教人民自太古之初就忠於他們的信仰，忠於沙皇和祖國，而現在他們被國內國外的惡人，祖國的仇敵所鼓動，拋棄了他們不安的職業，決定了去當搗亂的野人，好像他們被壓迫着似的，要以武力來謀求他們的權利，在平和的人民中惹起仇恨和混亂，使許多人失掉了麵包，使許多人遭了不必要的死亡，死時心裏帶着怨恨，嘴上帶着詛咒，毫無悔改的念頭……」

「我們的敵人要動搖正教及沙皇專制權力的基礎。」

文告中叫人「畏上帝，敬沙皇」（彼得書第一章十七節）「服從凡上帝所賜與的權力」（羅馬人書十三章第一節）……「按着上帝的命令勞苦出汗」等等。

這文告發佈在一切教堂及各地。接着是牧師與主教們聚會的宣言，決議通電讚美沙皇能堅決地壓迫一切破壞專制勢力的企圖，並對他矢忠，稱牧師們要擁護他到底。

按照這種精神教會繼續努力反抗革命活動，組織他們的反革命團體，稱為「黑百人」（Black Hundred）來採用一切可能的活動方法，以破壞革命運動。主教們發表文告勸人抵制革命者，忠於沙皇及現存

社會制度。教會所用反對革命的方法，以上不過是幾個例子罷了。他們使人看得明明白白，他們對於那日益緊張的革命運動所取的是什麼態度。

這時的教會很是一種不可侮的勢力。據一九一四年的報告（神聖法院的），在前俄羅斯帝國的領土內，共有五七一七三個教堂，二三五九三個小禮拜堂；有一一二六二九個牧師之類，五五〇個修道院，四七五個尼庵，五五二五九個居家人。教會的財產非常的大。有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當國有銀行實現時，它的存款是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除了幾百萬的武裝軍隊之外，還有這二十萬的牧師軍，都不能挽救沙皇統制於危亡。一九一七年二月，當沙皇被廢了的時候，教會與克倫斯基政府合作，防止布塞維克派得到政權。這計劃失敗之後，又用全力採用一切方法來反對布塞維克派，因為他們準知道布塞維克的得勢就是教會的死亡。

直到白軍及武裝干涉者都已失敗，布塞維克已經建立了堅強的蘇維埃政府之後很久，教會還是抱着這種態度。所以對於共產黨、俄國教會或教會的殘餘，還是他們最可怕的敵人，這敵人會抓住一切機會來推翻蘇維埃政府，把歷史的車輪轉過，開倒車回去。

在過去十五年中，教會反對布塞維克的歷史是很可憐的。但我們也要說一說，使人可以更完全了解共產主義之所以絕不妥協的，是反對宗教的理由。

一九一七——一八的教會大會與大主教職的重行建立

教會動員反攻革命始於教會大會，所謂的梭波爾（Sobor），那是在一九一七八月十六開的。首先由全國各地選派二九名凡俗人，二七〇名牧師人等，此外還有教會的統治階級。這些人的階級出身，決定他們對革命事變的態度。其中有十一個親王及伯爵，十個將軍及軍官，一三二個前沙皇官吏，二二個大地主，六九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代表，其餘都是富農，製造家，及小資產階級。教士們中有十個總監督，十七個高級主教，五三個主教，十五個僧院總管，七二個高級牧師等。

簡單說來，代表大會的大多數凡俗人及教士，都屬於決不能同情於革命的階層。這些人認為他們的本分就是用一切所有的勢力武力去反對革命。

梭波爾所急欲解決的問題就是參加政治與否。有一派人主張積極參加選舉，組成一個似乎是教士黨的東西。另一班人以為這太危險，情願維持舊狀。

一九一七年八月末，柯尼洛夫將軍（General Kornilov）向莫斯科進兵，要建立軍事獨裁。他給梭波爾送信，去請求他的幫助。梭波爾中有許多分子主張歡迎他來，且要梭波爾與他站在一條線上。這問題於是拿到秘密會議中去討論。幸虧這次軍事行動很快地也很不名譽地就被剿滅了，才免得梭波爾公然加入這將軍的行動去。事後他們發表文告，籲求「統一與兄弟之愛」為那些打敗了的篡國者求恩。

梭波爾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作成一個新的教會機關。從前的神聖法院已經是破舊不堪了，即使梭波爾最保守的分子，也不願意把它重建起來。爲了防止神聖法院大檢察長所有的討厭的關係，就把這職務完全取消。臨時政府設立了一個臨時的敬神部。

關於新的教會統治機關的問題，討論得自然是很久也很熱烈。有一派以高級主教安東留 (Antonius Khrapavitzky of Khar'kov) 爲首領，主張建立一個集權的強力的中央機關，情願集中權力在大主教之手，而以神聖法院作他的諮詢機關。

另一派不贊成大主教制度，指出集中權力有專制政府的危險。這種民主意見一直佔着上風，直到十月當布塞維克派勝利時，突然急轉直下。按照教會的慣例，若是皇位空虛無人，大主教應該暫代職責。

梭波爾急得要命。他們怕在職務未完成之前已經要遭解散。關於大主教問題討論了又兩禮拜之久。已經有六十個人關於這問題發了言，還有五十個已經掛了號有話講，但是等不得了。就宣布討論終結，選舉大主教。他們覺得仇人就在教會大門之內，所以不得採取快的非常的手段。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梭波爾通過一條決議，這決議作爲教會憲法的根基。其內容如下：

(一) 俄羅斯正教教會的最高權力——立法，行政，司法——都屬於梭波爾。梭波爾由主教，教士及凡俗人等組織而成，在一定的會期召集。

(二) 重建大主教，爲教會行政之長。

(三) 大主教與主教平行，而居首位。

(四) 大主教與教會行政各機關對梭波爾負責。

梭波爾的權力雖有明定，大主教的權力和職責却沒定出來。教會的行政各機關是什麼也沒講。選舉時按老法子，選三個候補者，然後由抽票來決定誰當大主教。票數最多的是安東留高級主教。他是主要的主張恢復大主教制的人，也是代梭波爾右翼的。其次是高級主教阿森留 (Archbishop Arsenius of Novgorod)，第三位是票數最少的梯洪 (Tikhon)，莫斯科的總監督。十一月八號，當城中正在巷戰搶奪克雷林及要站與城市的時候，梭波爾齊集於救主大寺院，使九十多歲的老和尚阿勒色斯 (Alyeks) 抽票。結果梯洪總監督當選為大主教。

梯洪當選，使梭波爾右翼很失望，特別是安東留的朋友們期望着安東留上台的。並非因為梯洪是自由派，教會倒不覺得他是犯教人。他們以為他的能力不夠，不能擔當這種時期的重任，這嚴重的時期是用得着像安東留這種無情的鬥士的。梯洪這人說是很善良，沒有野心，容易受週圍人的影響。所以梭波爾決計替他選強的力堅決的人們組織一個最高教會大會及神聖法院，他君臨於這些機關之上，靠它們的幫助來處理事務。

這麼組織成功之後，教會自信它能夠應付社會革命後所產生的問題。雖有許多困難，它們仍然自以為可維持它昔日對全國人的威權和權利。它一點也不能有所覺悟。

教會的反革命的進攻

重定大主教職，對於革命是一種挑戰行爲；它表示出梭波爾中右翼反動派的勝利，以及教會之缺少真正自由的傾向。大主教職對於革命輿論是一種進攻，因為它顯示着教會中君主的存在，且將在民間宣傳君主觀念。梭波爾中佔勢力的反動派，希望大主教職位之恢復能準備沙皇復位的工作。他們全不懂時代的徵象，也不相信社會革命竟能成功。共產黨布塞維克派得勢，他們準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麼，就大無畏的把它推行出來。革命政綱之推行，更加重了梭波爾反革命的目的，他們此時還全不知道實際情勢，全不理工人的正常要求。

革命爲教會造出了兩個問題。第一教會與國家分離。社會輿論是要求分開的。教會却反對。它提出一個意見，使教會脫離政府的控制，那是在沙皇時代他們嚐夠了的。而同時却要保有在當時它所享受的一切特殊權利，甚至於還要多。臨時政府寧願教會與國家慢慢分開。但這問題還要有立憲會議來決定。

另一個立待解決的，是教會與學校分離的問題。梭波爾絕對的反對這點，在俄國教會本沒有作教育的工作，它從來就不是什麼教育機關。它是反對世事學問，那樣它以爲會減少虔敬。不過教會雖深恨普及教育，却也不能禁止它的廣佈。因爲近代生活需要它。俄國人若不能好好受教育，就不能維持自己抵抗西歐國家。所以政府就着手來組織通俗學校，雖以教會多方阻撓，這些學校還是反對教士的。因爲要抵抗這

一點，且要抓住民衆，於是教會，特別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後，來大批組織教區學校，藉以控制通俗教育。爲這目的，它由政府收入大宗款項。一九一七年共有三七〇〇〇教區小學，房舍值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此外教會又建立了許多神學校，和幾個高級神學院所謂的精神學院。

布塞維克突然得勢，使梭波爾大吃一驚。它們不能低首下心把自己的大權獻出去，於是大主教對革命政府及新社會制度公然宣戰，決計戰到最後，死而不悔。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大主教下第一道文告於教會，其內容就是上述的情形。它攻擊革命的破壞不止，反攻它對於教會的攻擊。它以地獄的火及開除教籍來威脅企圖爲害教會的人們。文告中的要點如下：

「你們所作的不但是殘忍，它簡直就是撒旦的舉動。這種行爲將使你們來生要遭受地獄的火，使你們受人世間世世代的詛咒。

「以上帝賜我們的權力，我們不許你們走近基督的聖禮，如若你們還用着基督徒的名字，即使你們出身於正教，我們都一體的咒滅你們

「我們也請求你們正教的信徒們，不要與這種人數中的怪物發生任何關係，遠離那惡人。」（哥林多前書五章十三節）

文告列舉着「這人類的怪物」的惡行，主要的是婚姻與學校的世俗化，沒收教會房產與土地，佔領城市時轟炸克雷林，把彼得堡救世主的禮辱沒等等。末了又請信徒們幫助教會組織神聖的防衛會。

梭波爾極其熱烈地歡迎這文告。有一位梭波爾分子「希望這一下子同撒旦的奴隸分裂，就是從敵人手裏救回國家與教會的起頭。他說：『我要提議稱布塞維克主義爲『撒旦主義』和『反基督主義』。』其中有勢力的分子公然說：『俄國人要得救，只在於有一個聰明的正教徒的沙皇。只在於能選出一位聰明的正教的俄羅斯沙皇，才能使俄國走上歷史的軌道，恢復秩序。我們若老沒有一位聰明的屬正教的沙皇，就不能有秩序的。』

這種坦白的表白，很明顯的指出在革命鬥爭中，教會是站在那一方面。雙方都準備開仗，雙方都利用自己一切所有的武器來戰鬥。教會大大施展其開除教籍的本事，不但政府中的人物，即凡與革命政府合作服務的，都遭同樣的待遇。它組織羣衆示威運動，求助於無智羣衆的瘋狂。梭波爾派定了它的『參謀部』，來籌劃一個進攻的保衛計劃，組織教會的力量準備戰爭。有些將軍及朝臣們脫下他們的軍服及鍍金制服，穿起黑道袍來，有些則去當牧師甚至於當主教。梭波爾參謀部鼓起人們一切努力去反對新政府，有不少的牧師和主教們去幫助組織白軍。在城市裏（街道上說起怪魔怪樣的東西來）舉行怪魔怪樣的示威運動，到教會的神聖祠閣巡禮去。教會裏敲出報警的鐘聲，彌撒祭時舉行特別禮拜，及羣衆大會，『護衛信仰』的團契建立起來，一切羣衆宣傳方法，都盡量採用來嚇嚇革命勢力，逼迫他們到『坎諾沙堡來』（Come to Carossa）（即對教會屈服）似乎教會就要勝利，革命政府就要放棄使教會與國家分離及沒收其財產的計劃的樣子。因爲弄得教會大發脾氣，來公然反抗的原因全是經濟上的損失。有時因爲過分

反對遭人恨惡的和尙們牧師，而生出羣衆的暴亂行爲，也使教會借此博得一點人們的同情。可是真正的問題藏在底下，還是經濟的及政治的兩種哲學之正相反對的衝突，又使這場戰鬥理想化。

革命派的反攻

大主教的咀咒發出去了不幾天，政府發出它的答覆：那是有名的律條『關於良心上的自由及宗教會社』（一九一八年一月廿三日）。它把俄國國家與教會之千年來有機的聯繫切斷了，給教會在蘇聯安置了一個新的根基去自營生活。

和別個政教分離的國家如法比較起來，這法律有許多獨特的革命的特點。

和美國一樣，它承認一切宗教在法律之前是平等無所輕重。任何宗教規矩及禮節只要不妨害公安，不侵犯他人的自由都可以使用。它比美國更澈底的地方，是完全將國家政府世俗化，取消它的一切宗教規矩及行爲的痕跡，這一點倒頗像法國。可是它所獨有的一種特點，是一切學校凡教世俗學科的地方，全不許教宗教課程。

此外還有一點，即沒收教會一切的財產，這並不是單獨對教會的。政府不過把它——教會——和別的機關與私人企業一視同仁罷了，如工業公司，銀行，大地主，以及別的大私人財產都沒收的。

其實這對於教會的宗教意義上並沒有什麼打擊。因為教會的祈禱禮拜的房子還是不要租金的，由

他們集合使用，只有產生收入的教會財產被沒收，去爲人民的福利而使用。最受影響的只是修道院及上層階級。還有教會的中央行政機關，這班每年享受財產收入，享受政府補助金的人們。財產國有，使教會失掉經濟上的權力，從而削減它的政治勢力。最後這法令不但剝奪了教會的財富及政府的補助，且使教會不能以團體資格去聚集財產，換句話說，就是取消了教會的法人資格。

簡單說來，革命政府證明了它自己對於教會毫不妥協，正如它一般的對於舊社會政治經濟現狀一樣。它不能自己跟自己矛盾。既要沒收一切私有財產及公司財產，當然不能對於教會的財產不動。自然，如一切法律一樣，它的實行是以便利爲主的。若果教會的領袖們明白公理，知道社會革命之不可逃，它總可不至於要受那麼多罪來處置自己到適宜的地位上去。可是事實上教會與政府之間有一條鴻溝，不是任何東西所能過渡的。每一方面都得犧牲它的主張才成，主張既不能犧牲，則鬥爭只有繼續下去了。

政教分離的蘇維埃法令公布後，梭波爾以爲政府立刻會有斷然的行動來實行這法令。於是梭波爾參謀部根據兩條路線來發布命令及組織保衛工作，（一）不與政府機關合作，（二）羣衆行動反對這法令。可是蘇維埃政府很聰明，它不立即大規模地實行沒收，只對於某些寺院，特別是寺院土地是如此，（貧農們都急切的把這些土地得來。和尚們簡直沒有什麼希望能得到農民的幫助和同情，以保護修道院的土地。

教會本身在禮拜方面並沒有感受到這法令的壓迫。爲着禮拜用的財產在當時都是免費的由集會

團體掌管，政府只要他們組織一個負責的董事部來管理這房屋。他們沒理由來反對這種辦法，所以他們鼓不起羣衆來。至於因爲缺少政府的幫助，使教會的中央機關、學校及出版機關不能活動的情形，羣衆們都不去理會，因爲他們與這些機關沒關係，且又沒受教育，不懂這些機關的重要處是什麼。

有一陣子，關於在公共學校停止授宗教課程的事鬧了不少風潮，有些人竟違犯了法律去維持這種課程。可是慢慢的因爲政府及教會都不能給教士們錢，他們只得把自己的熱心丟了。很少有牧師能夠有那種意志和能力去當不要錢的教員。

生活的本身就要求合作抵制政府定使人民多多受罪，並且有許多牧師，自己就受過教會中從前那些王公的壓迫，他們自不能如人所願的忠於大主教。常常有拋棄訓令不守紀律的現象，使教會抵制政府的力量軟弱下去。一九一八四月份離法令下了之後才幾個月，梭波爾覺得不能不用高壓手段來制裁「某些主教牧師和尙們及俗人，這些人不遵從，反而抵制教會權威，在教會與政府的關係方面加害於教會，使教會及其僕人、徒衆和一切所有物都增受困難。」決議定他們爲「上帝的敵人」，要開除教籍。

這種嚴厲態度表示出一般下級人們在堅持不合作態度時所遭受的苦痛。慢慢的教會的抵抗力動搖了。

蘇維埃政府意外的發現了教會假造「不朽聖人」之遺體的真情，得了不少的幫助。前文已經講過，俄國的大修道院因爲要招徠巡禮者，就造作會使奇術的遺體，特別要是本地聖人的不朽屍身爲的是真

正聖人的屍身是不會朽的這種觀念也許起源於基夫培可拉修道院(Kiev-Pechora Monastery)那些洞居隱士興起來的在那一帶的天氣頗適宜於保存木乃伊別的修道院以為自己的隱士必也是同樣的聖人，於是也來謀求這種風頭，他們甚至於用臟或別的東西作像藏於銀棺材裏。

一九一八年十月俄倫斯克省(Olenky Province)的亞歷山大司維斯基修道院(Alexander-Svirsky Monastery)的財產目錄被獲從此發現亞歷山大司維斯基的銀棺中所藏的不是那不朽屍身，而是那聖人的雕像。這場發現弄得人民大怒，於是要求把所有的不朽屍都來察看，且把結果發表出來。最大的欺誑是梯洪察當斯基(Tikhon Zadonsky)以及聖塞爾基(S.P. Sergius)的遺骨，他兩人的祠龕是一個俄國巡禮者拜訪最多的地方。塞其也夫修道院(Sergievo Monastery)現成了博物院，也是最富的一個修道院。

革命政府自然利用這些事實來削弱教會的道德勢力，隨著成效。教會沒辦法只好向政府求和，政府不理。梭波爾在一九一八六月十五又集會，對於情形仍不能有所改變。既已不能鼓動羣衆來抗拒政府，惟有希望聯軍干涉，及內戰能打敗它以恢自己的勢力，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間是戰爭最利害的時期。

教會與一九二一年的大饑荒

一九二一大饑荒，穀物失收，使蘇維埃政府又遭逢了生活力的嚴重試驗，而它的敵人們又希望他能倒台。教會也是這麼的希望，於是羣逆獻計於大主教，利用這國家的禍災作政治資本。

饑荒愈加利害起來。有些主教和凡俗人在報紙上宣傳，要把裝飾教堂的金寶變錢賑災。於是全國報紙都提到這問題，一般進步的輿論都主張把教會國有的財貨移去援救饑民。大主教心血來潮，於是在二月中下了一道文告於教會，吩咐將無用的珍珠、寶石、斷金、爛銀在教堂中可找出來的，都移去作賑災費。這似乎是教會所能作到的最大好處，但並沒多少結果。隨後政府就把這事業拿過手來。二月之末，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一條法令：

『爲着進行與伏爾加流域的饑荒及種子問題鬥爭，目前迫切的需要動員一切國家的財富作工具。爲此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除了關於博物院中物品使用之法令外，更決議如下：

使各地方蘇維埃，在本法令頒布後一個月中，按着財產目錄及契約，將讓與宗教信徒們使用的教會財產，金器，銀器，寶石等移用，但不可妨害禮拜時所必要的一切。將以上物品移交人民財政委員會，指定它們作爲中央賑災委員會的款項。』

這法令又吩咐移取財貨時要有保管這類財貨的信徒，代表在場監視。這些財貨要專爲賑災之用，且要公布賬目。

對於這法令梯洪大主教又發出文告於教會（二月廿八），與以前的公告大不相同，以前是同情於

挪用教會剩餘財貨以賑饑荒的大主教指斥這法令說是污神瀆聖，號召忠實信徒用一切方法來抵制它，不合實現。這次宣傳鼓動的熱烈，頗類一九一八年抵制分離法令時的舉動。但是蘇維埃政府的法令以人道爲基本，人民都擁護它。

大主教的抵制既是根本不對，所以他的政策不能不失敗。政府推行法令毫不留情，把教會領袖們的一切抵制都打成粉碎。遣派去移用財貨的委員會，都受命極其小心的挑取品物。凡禮拜時必用的都不取，免得說侵犯了他們的信教自由。所取的剩餘財富非常之多，但存留的還是多到使人看不出它受了損失。

由於大主教的抗命，政府和教會間的衝突處死了許多人，還有許多被判長期徒刑，這些都是牧師，教士，及在教的平信徒。全國教會變成了無政府狀態。大部分教會人士，特別是災區的，都討厭大主教的舉動。牧師甚至於主教們，本來忠於大主教的都感覺痛苦，有些硬漢們竟公然出來批評大主教所執的理由。在列寧格勒一羣自由派牧師們在維登斯基及倍爾可夫牧師的領導之下起來了。他們聽說大主教被幽禁莫斯科，許多教士被判處死刑，於是他們到莫斯科去與克拉尼尼次基牧師 (Priest Krasnitsky) 及安東寧主教 (Bishop Antonine) 會合。五月十二在莫斯科牧師行刑之前一日，他們去見大主教責備他說，教會的恐怖及無政府狀態都因他過去幾年中的反革命行動而起。他們逼迫他退位，且發出文告要求教會與新社會制度講和。

這文告主張對政府和平合作，澈底的聲明昔日教會對於蘇維埃政府的舊政策，這文告於是把教會

及政府間的戰爭作了一個結束。五年以來教會堅決的站在反政府反新社會的立場上，用一切所有的方
法，幫助蘇維埃政府的敵人反對政府。它成爲革命政府最利害的敵人，最能持久不下的。可是一旦它的戰
線被衝破了，它就免不了要投降。一般教會叛徒最後到底反抗了他們的教會統治階級，而自縛教會以投
於蘇維埃政府之前。那些戰敗了的教會領袖當然恨透了他們，當他們是賣教賊和布塞維克，叫他作『赤
一牧師』。

活的教會運動

這班進步牧師所發出的文告，一般牧師，尤其是鄉村牧師，羣起響應。這些人本是在那些教會封建主，
即主教之下受了幾百年壓迫的教會，本身起了革命。以前全不能組織起來，參加教會行政事務的小牧師
們都來開始組織。大主教既不能管事，於是教會大權落於那幾個革命首領進步牧師之手。這班人用了『
活的教會』的口號，在這名義下出了一種刊物來向羣衆宣傳，他們組織了『白牧師會』也叫『活的教會』
主要領袖是列寧格勒的牧師克拉尼次基。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在莫斯科成了它的憲法，其目的如下：『
保障正教教區牧師有自由處理教區事務的權利，且不要倚賴社會上經濟統治者的幫助。』

此時的『活的教會』等於一個牧師工會，爲着牧師界的權利與經濟利益而存在。它的仇敵就是和
尙的教職制度，它要求白牧師或結了婚的牧師也能被選受高級教職，因爲過去幾百年來結了婚的牧師

都在他們的和尚封建主人之下過日子，而教會高級教士與一切反革命派勾結抵抗政府。使下層牧師受了無量痛苦，所以他們都熱烈的要求解放和獨立。

爲的避免反動派與起活的教會派，與一些同情於他們的主教們合作，改選一個新的統治階層，由結了婚的牧師充當，此事在梭波爾聚會之前就舉行。許多反對活的教會的主教們都被令停職改派。

一九二三的梭波爾承認了活的教會的改良辦法。以後按照政府的規定，教會要取消君主制採用共和制；教會要與一切反革命派分離，凡政治上負罪的教士都令解職。至於教會的教條及宗教事務，政府不去過問，政治上的都毫不妥協。

梭波爾無條件的服從了這一些，且又自己表示對政府澈底忠誠及同情，斥資本主義爲犯罪，稱社會主義是聖明。它取消以前的咀咒，承認政教分離的法令，承認教會財產收歸國有，甚至於限制牧師公民權的事也承認，說是懲罰以往的反革命。

五月三日梭波爾會中定爲聖法：教會與政府修和。自此以後，教會中牧師主義只能盡力按蘇維埃政府規矩辦事。隨後政府採行六日休息制，取消教會節日的法定性，以及一半教堂都被封閉，這些事使教會弄得雖有若無，無人理會了。

一九二九年戰鬥的反宗教宣傳使教會更加削弱。新法令禁止教會作一切社會活動，禁止作宗教宣傳，只許禮拜。它的鬥爭算是完全失敗了。

第十章 反宗教運動

在蘇聯的反宗教運動，當現在的戰鬥的無神論者組合（即 Union of Militant Atheists 還沒組織之前很久已經有了。當革命最初幾年中，有幾隊抱無神論信仰的人們開始向宗教宣傳家挑戰，要他們來討論教會與革命，科學與宗教等問題。此時發表一些攻擊宗教的書和小冊子，司法部又出了一種雜誌名革命與宗教。由這雜誌，政府發表反對教會的意見，爲政教分離之實現而鬥爭，暴露教會用聖人遺體的欺騙及同類的事。

漸漸的，自動的無神論宣傳的團體興起來，散在各地，既無共同綱領，也沒有統一的組織。最初無神論宣傳的羣衆組織，以別士波什尼克（無上帝派）週刊之發行開始，那是一九二二年底。不久就刊行附有圖畫的月刊，名無上帝者當道，要大規模組織無神運動的意見，得了大的黨機關報如真理報的擁護。一九二四年組織了一個「別士波什尼克報之友」的團體。這些朋友們將別士波什尼克傳播各地，且替它寫文章。在各地地方也有反教會反宗教的宣傳。

一九二五年春，這班朋友們在莫斯科開了一個會議，討論擴大組織的種種方案和計劃，特別是目的和策略的問題。在無神主義運動中原來有兩種不同傾向和宣傳方法正在發展。一派注意於反教士運動，暴露教會之惡意的階級作用，他們不注意宗教哲學及文化的問題。另一派則特別注意於文化啓蒙，講究

科學及唯物論的人生哲學。這兩派各持自己的主張，不相上下，至今還是如此，雖在會議中及黨中都已承認雙方的重要性。一九二六年，黨發表了一種理論根基，所有反宗教宣傳都須根據於此。這些理論，以簡潔明白的形式說明作反宗教宣傳的正確方法之基本條件。它們講到：（一）對於宗教性質之正確的了解；（二）對於宗教之主觀方面及客觀任務的正確估價；（三）正確的把握反宗教宣傳的條件，把它和當時的政治經濟問題聯繫起來。

它們批評如下幾件事：忽略宗教之主觀的精微處，把反宗教宣傳通俗化與簡單化，他們得了一個特出的結論：說是要使人民脫離宗教，倒不一定在於啓蒙，而在於羣衆之積極的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只有社會主義，而不是無神論宣傳，才能消滅宗教。等到社會主義成功時，無神論宣傳才可以幫助達到消滅宗教的目的。

這些理論又明白又坦直，是黨中最有權威的文件。其中的基本條件，共產主義無神論工作者至今奉爲運動的綱領。

根據這些原則，無上帝者組合（Union of the Godless）進行他們的工作，隨後幾年中它的組織普及全國。在這一時期，關於宗教問題的討論風行全國，宗教興趣及反宗教興趣同樣的高漲；有些地方宗教勢力竟能超過無神論的勢力。這種現象，由於生在經濟政策似乎要恢復資本主義的時代，一般人民對於社會主義失了信仰，加以作反宗教宣傳的青年們又缺少對於這問題的經驗所致。自一九二七年後，無神論

者組合乃改變策略，集中在蘇維埃社會有組織的社團中作系統的教育和訓練；在紅軍中，在工會中，在教員聯合會中，在學校中，在青年人團體中，在鄉村讀書會及俱樂部中，都這樣作。

在這時期，組織了第一次的反宗教博物院，展覽會，反宗教壁報，電影，戲劇，及無線電播音。一九二九年又通過法律，禁止宗教宣傳，只許有反宗教宣傳。因為宗教宣傳往往就當作反蘇聯宣傳來用。一九二九年又開始大批的封閉教堂。許多教會沒辦法，只得解散教堂，或與別的教堂合併，以減少費用，及避免很高的課稅。

一九二九年的大進攻與五年計劃同時開始。全國人民都熱心注意於工業化與農業集體運動，而不去管宗教及反宗教宣傳的事。六日星期制及取消教會節日，更使宗教與都市及工業中心的生活絕緣。不過在農村中，舊禮拜日還是正式的星期日。

一九二九年六月全蘇聯反宗教團體大會開始。改定自己名稱爲戰鬥的無神論者組合，主張以積極參加五年計劃，爲自己的工作計劃。無神主義的羣衆組織，今後當作建設工作的前鋒。在共產黨總的路線之下，爲全國工業化，及鄉村中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地方無神主義團體被改起來，組織集體農場，幫助購買農業機器與牽引機；且以自己的工作及生活作則，吸引別的人們放棄他們的宗教迷信。

該組合的中央會議，發起捐款保衛國家，爲此要建造一架戰鬥飛機，一架坦克，和一隻潛水艇。全都取名爲別士波什尼克。

這種工作，自然和別的蘇維埃社會團體所作毫無不同。無神論漸漸失掉了它的特殊性，及建立新的無神論哲學的目的。它的領袖們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正在努力恢復它的工作，使之適應於第二次五年計劃，以達到完全建立社會主義及掃除階級社會為目的。

該組合數字的勢力

戰鬥的無神論者組合所發表的統計數字，指出自一九二六年組織成功後的發展。下列的數字表示得很清楚：

年 數	地方組織數	人 數	與一九二六年比每年發展的百分數	
			組 織 數	人 數
1926	2,421	87,033	100,0	100,0
1927	3,121	138,402	130,0	160,0
1929	8,928	465,498	370,0	535,0
1930	35,000	2,000,000	增 加 十四倍	增 加 二十三倍
1931 1,31	50,000	3,500,000	二十倍	四十倍
1931 5,31	約 60,000	5,000,000	二十五倍	五十七倍
1932	65,000	5,500,000	二十七倍	六十九倍

此外在青年組織之中，共有會員二百萬人，為十四歲以下的小孩。女孩佔百分之四十八，男孩佔百分之五十二。在成人組織中，婦女是百分之三十，男子百分之七十。

依年齡而分的百分數如下表：

十四至廿二……	百分之四十五。
廿三至四五……	百分之四十五。
四十六以上……	百分之十。

在工業都市中，依職業而分的工人，為百分之五十，學生為百分之三十，其餘百分之二十為雇傭人。非黨員人數佔百分之六十，若論種族與語言，在這組織中，總有一百種不同種族和語言的團體。

這一大羣公然的無神論者，在實方面却大不相同。只有很少的分子是活動的，不過百分之十。別的人只管付了每年的年會費就完事，那費少得很，大約五分至十分錢。這種大數目，無論如何，表示幾百萬人，大部分是青年人，不再理會宗教這東西，而輕易的自命為無神論者，那在他們是很體面而很正當的事。我們可以放心的說，對於宗教不關心的人，已比登記了的還多，至少，全國人民有一半是不理會從前那些宗教禁制及習俗的。這不一定說他就準相信無神論，他們也許這樣，也許又會加入某一教派，或甚至跑到正教會中，看他們的主觀經驗，及教會的文告是否合他的需要。

無神論青年運動

作無神論運動的人們很知道這運動的將來，都要看他們如何的訓練兒童及青年們。宗教已經再也不能使十八歲以下的兒童們受系統的宗教訓練。雖是家庭中的宗教教育不受限制，但很少的父母們能利用這一機會。法律也不禁止小孩進禮拜堂，但受系統宗教訓練的究竟沒有。

起初蘇維埃教育制度聲稱是無宗教的。意思說，在他們的課程中簡直不拿宗教當一門課程，但望教自然科學、教歷史、教文學的教員們在教材中指出反宗教的內容。例如講到人種起源時，便要講到人不是上帝所造，而是由低等動物演化出來的。講到自然現象時也是如此。在講歷史時，要講到牧師、教士制度，及『神聖裁判』制度的罪惡等等。至一九二七年，無神論者宣傳反對無神論學校，而主張反宗教學校。教育人民委員會最後只得服從了。不過在許多實際問題上，仍和從前一樣。這是無神論熱心家的一般意見，認在這一方面，學校一點不幫忙，去推動他們的運動。

這種中立態度有好幾種原因：第一，蘇維埃教育家認為系統的反宗教課程對於小孩子是太消極了，其次，大多數教員沒有受到這種訓練。最後，學校課程已經過於充滿了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以及一切其他課程等。所以反宗教宣傳只能容納於以上所講的方法中，系統的研究也只可在自動組織的團體中舉行，如青年無神論者細胞，那是戰鬥的無神論者的青年組織。

在這細胞中的工作進行也算不熱烈，主要的是教員們太忙，缺少有訓練的人才，同時黨中領袖以為宗教已經大被遺忘，對於那些熱烈參加黨的工作的青年，它已經不能為害了。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是反宗教最利害的時代，學校也這樣。戰鬥的無神論組合青年的部分已有會員二百萬，也有自己的定期刊物。小孩子們被鼓動起來去組織各種運動，反對鄉村流行的惡事及迷信。教會節日酗酒的事，本是教會最大的惡德之一。這些節日每當夏令，大大的妨害收穫的安全。反對酗酒的，事自然與反對教會及其節日的事扯在一起。小孩子一方面這應反對，一方面就作了節制運動的前鋒。共產黨青年運動已發展到三百萬人。這些青年都是無神論者，都要活躍地參加反宗教運動。但因他們都全投入五年計劃建設中去，故參加戰鬥的無神論者組合的很少。

紅軍中的無神論

蘇聯紅軍早已變成傳佈無神論之極其活動的中心。入伍人都是有系統的受了共產黨無神論宣傳的人，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當離開軍隊時都聲稱自己是反宗教的。

從最初起，紅軍就是戰鬥的反宗教的。內戰時期，它與教會的友軍戰爭，而教會宣稱天命在他們那一邊，組織許多牧師軍來抗拒紅軍。在打敗這些神聖軍隊之後，紅軍中就成立了一種特有反宗教的傳統，那傳統增加它的戰鬥力。

內戰之後，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間，紅軍訓練部的教育綱領列入與牧師等作宗教辯論一項。其後這一項變為特殊研究班的正常課程。這些課程都注意於宗教的階級性，教會的反革命任務，以及正教教義的反宗教立場。

五年計劃開始時，紅軍來訓練它最好的分子，擔負五年計劃的工作。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間，二十萬人受特別訓練來擔負鄉間各種工作，一萬人作反宗教宣傳在鄉間破壞舊神祇的威權。

紅軍中又進行特別注意於各教派的和平主義者，這些人是在軍中非武裝部工作的。現在的努力，要使這些人變為無神論者，及放棄他們的和平主義。

弱小民族中之無神論

蘇聯共和國是一個廣大的國際，其中共有二百以上不同種族及不同語言的團體。這些團體中，有的如烏克蘭人，如韃靼人有幾百萬，還有別的，特別像高加索山中人，一共只有數千人。高加索山脈橫界小亞細亞及歐洲之間，從古以來就有許多逃亂的種族躲在那兒去。這些剩餘人民，爲了躲避敵人，就在狹小山谷間寄居着，殘存下來。

許多這類小的文化落後的種族及語言團體沒有文字。蘇聯政府就擔任了供給他們文字的責任。在過去十年中，已經造出了三十二種字母，已經有八十種語言文字所寫出來的文學。在這些民族中，已有七

十種以上的有了印刷機，同時也用於作反宗教宣傳的事。其中很重要的一步，是用艱難的阿拉伯文字書寫的土耳其文，改用拉丁文書寫。起先的本地文學，差不多全是宗教性質的。自引用拉丁文之後，情形就大變。反宗教文學已流行。目前蘇聯有無神論的報紙，用十四種不同的語言印行；反宗教的書籍用二十二種語言印行。

在蘇聯弱小民族中的工作，是處在很重要的地位，因為這些小民族還是非常幼稚，而他們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都被堅強的宗教迷信與禁令束縛着。許多小團體的宗教及民族本源都相同，他們所有的文化都是宗教的，他們的領袖都是祭司及藥師。這一點使弱小民族中的反宗教宣傳很不易進行。對於這些人，要他們放棄宗教就等於要他們放棄他們的民族。蘇聯政府小心翼翼地由這些民族中挑選優秀青年中最活動的分子，將他們攔在專門作這種訓練的學校中受訓練，去和一些罪惡鬥爭。當然，這種訓練全是斷然反宗教的，而他在弱小民族中的知識分子領袖都是無神論者。

在這些小共和國中，工業化的過程進步得很快，土西鐵路 (Turksib Railway) 聯接土耳其斯坦及西伯利亞橫貫廣大富域，其中出產煤油，煤，及非鐵質金屬，發展很快。在喀沙克斯坦 (Kassakistan) 及達格斯坦，五年計劃的進行已增加其產量至百分之五百，其他共和國的增加也都類此。集體農場運動的效果也與工業化相類。這一類的進化過程，自然免不了那些保守派的抵抗和鬭爭，因為那就是反他們的宗教。弱小民族中的無神論散布的情形，在最近全蘇聯無神論運動大會中的記載上可看出來。起初第一

次會議開於一九二六年，那時只有六個民族參加。一九三一年，數目已增至九十七，現在則已有一百了。回教徒起初是瘋狂的，與他們的宗教膠結，現在則已大部分脫離，主要的是由於社會經濟的原因。對於回教女人，是由千百年的壓迫與奴役解放下來，對於男人則是由封建地主之下解放。參加了集體農場之後，以前半奴隸式的農場工人就獨立起來，在他的生命中開始了新的生命，於是他馬上丟了從前那叫人們當奴隸的宗教了。

回教女人，特別是中亞細亞的女人，已經興起來丟掉她的巴蘭牙(Parandja)一塊大的布，當女人出門時用來蓋住她的頭面和身體的。這東西就象徵着她們已往的卑下地位和奴役。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日舉行了莊嚴的年會，大羣的女人們當場把她們的巴蘭牙取掉，且有的把它燒了。一九三二年光烏別克(Uzbek)的女人，有十萬取銷了她們的而網。這就是等於放棄她們的宗教，及招徠回教瘋狂者的壓迫。結果許多女人捱了打，有十四個竟被殺掉。然而她們還是勇敢前進，為獨立奮爭。在一九三〇年選舉時，二六、一六五烏別克女人佔投票人數百分之十六·二，參加選舉，選出三八九〇女代表參加蘇維埃佔總席數百分之十二·九。在弱小民族中的反宗教宣傳，也就是社會革命，他的結果是散佈很廣的。

無神論者國際

共產主義者本是國際主義者，它的工作各方面都是有國際眼光的。反宗教運動也是這樣，後來組織

了無神論國際。國外都稱之爲『無產階級自由思想者國際』。它的目標是『國際地開展一種鬥爭，反對工人運動之教士化』(Clericalization)。反對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的傳教活動，反對基督教和平主義，反教會參加於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九二五年夏，德國及捷克斯拉夫無神論者組織了『無產階級自由思想者國際』。它立刻與蘇聯的無神論機關接頭。一九二六年蘇聯的無神論者組合參加了這國際，取得了領導權，就努力於反對第二國際社會主義者的改良派辦法。鬥爭的結果，改良派自由思想家都退出，而去加入所謂的不魯塞國際，與資產階級自由思想者結合。而無產階級自由思想者國際就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前進。

起初它的中心機關在德國。這機關遭德國反動政府禁止之後，暫時遷到莫斯科。戰鬥的無神者組合的中央機關來。國際的活動在於與各國支部交換經驗，及比賽作反教宣傳。一九三二年蘇聯有二百五十個地方無神論機關與國外發生關係。其中八十個青年機關與捷克斯拉夫同樣多的機關訂約比賽。同樣的訂約，在德荷南非洲澳大利亞南美日本都有，共有通訊的三十一國，以世界作通訊工具。

這國際頗注意於在蘇聯工作的國外工人在他們中間宣傳。在莫斯科某一大工場內，一百五十外國工人就有一百加入無神論組合。在別的城市別的工場，也有同樣的情形。

這國際進行研究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宗教運動，特別是美國坎拿大拉丁美洲以及別的歐洲國家。研究的結果，用三十種不同的文字發表。各地要這種材料的很多。

無神論的原因

在蘇聯若是羣衆一經組織，他們就要與舊宗教舊傳統斷絕。在紅軍中，在工廠中都如此。一工廠中有十二萬工人，其中非黨員工人有百分之八十四。一是無神論者。黨員則人人都是無神論者。一九三〇年在白俄調查了二十個城市，二二五個鄉村，有百分之九八·五的工人是無神論者。在農民社會中平均無信仰者佔百分之六五·四。

用教師命名，婚嫁及安葬諸事，與宗教信仰無大關係，多是社會習俗的問題，現在也很快的減少，特別是教會結婚，以前是到處一致，並且是很花錢的舉動。目前只需要在政府民事機關註冊，這註冊也頗類一種典禮，能滿足一大部分的人，而所費很少。如下一表，可以顯示出以往脫離宗教的情形。所舉數目，都以九個月為一期，由每年正月至九月一日：

莫斯科總數數目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1. 不用宗教典禮的	三三·〇%	三八·一%
2. 用宗教典禮的	五九·七%	五七·八%
3. 不知道的	七·三%	四·一%

葬禮數目

1. 不用宗教典禮的	三〇・一%	三三・三%
2. 用宗教典禮的	六六・八%	六五・七%
3. 不知的	三・二%	一・〇%

結婚數目

1. 不用宗教典禮的	八一・六%	八六・三%
2. 有宗教典禮的	十五・六%	十一・八%
3. 不知的	二・八%	一・九%

這種與宗教脫離的原因要不是受了宣傳，就是對教士牧師輩失望，為宗教不能防止戰爭與饑餓而失望。調查工廠的時候，我讀了九十六個工人的自傳，其中講出他們與宗教脫離的原因。其中有七個因為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經驗使他們脫離宗教；十個因大戰，二十六個因紅軍宣傳；三十一個因十月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九個是為對教士失望，且反抗教會欺騙；五個因無神論宣傳；最後五個，因為個人經驗才放棄了上帝觀及教會。

類此的情形有幾千幾萬，都不是哲學上的原因，而是由於失望與迷信被科學打破了的緣故。在某村中有一羣學生，借教員的幫助買了個孵雞器，村人都好奇而留心地守着它。後來小雞出來了，大家就才懷

疑上帝之說，且有人當場把聖像拿來燒掉的。類此的情形各處都是。科學與機器，推翻天真農民的信仰，覺得科學的事實證明世間並無上帝。

第十一章 集體化及無神論宣傳

在一個小農國家，其中有千百萬個別小農，擁有少量土地，全引用農業的原始方法，於此要施行社會主義是不行的。蘇聯主要的人口仍是農民，有百分之八十或一萬三千萬人民，都是留居在百萬小農村中的農民，這類小村莊都過於窮苦，不能有文化活動。幾百千年來，他們困處於窮之中，一字不識，充滿迷信。只有教會是接近他們的機關，而教會則專門把他們束縛在無知情形中，以鞏固己身對他們的統制力。

無產階級革命掃蕩了沙皇及教會的權力。蘇維埃政府將沒收的土地都分給農民永久使用，只課他們一種單一稅。這種分裂的土地仍用舊法來耕種，很不能生產多餘糧食，以應城市的需要，及充實出口貨物。年復一年，農村生產與都市增長的需要大不相符。於此若不是鼓勵及發展那些富農（苦拉克 Kuznetsov，即拳頭）就只有將貧農集合起來，用近代機器及更有效的方法來耕種。若用前法必是要出賣革命了，所以共產黨領袖都決定了採取後一項辦法。經過黨中內部極深刻的鬥爭，布爾塞維克走上了十月革命以來最大膽的一步。大的工業化的國家農場及牽引機站，要試驗新的方法，變成運動中的領袖。政府願以此來解決都市的糧食問題，並且在鄉村開闢社會主義的路。

五年計劃中的全國工業化與農村土地集體化，要同時並進。這一巨大的計劃，同時也就是文化革命。

被強大的牽引機所拖動的犁頭，不但只耕透幾千萬畝 (Acre) 肥沃的土地，且要同時打破當地的迷信宗教禁令和習俗。鄉村中的宗教本不過是一種農業敬神禮，以年中工作期與教會及聖人們的節日聯合起來。人們相信沃土和豐年都要靠賴那些魔術的禮節和教會祈禱。可是現在農業科學及近代機器，俄國聞所未聞的東西，竟被應用到一羣原始的全無教養的人民頭上來，破壞他們一切所喜的。它重重地打擊了他們的所謂財產本能，而破壞了他們的宗教社會習慣及觀念。它惹起貧農及青年們的興趣和熱心，而撩起保守的富農之決死反抗。

反宗教運動相信牽引機是剷除宗教的東西。有些集體農場農民投票贊成封閉教會，這種農場稱為是無上帝的。共有四百個農場參加了戰鬥的無神論者之中央組合，這數目是到著書的時候為止。

集體化對於宗教的影響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莫斯科舉行了鄉村中反宗教運動領袖代表會議，到會共有一百多人，都由蘇聯各地各鄉來的。此類的會，著者曾參加過幾次，聽他們很坦白地報告村中宗教情形。有的說，宗教習俗對人民仍有很大的力量。有一位從列寧格勒省來的代表，報告他的幾個調查，有一個是進步縣分的調查，有一個是落後縣分的，有一個是個別農民家庭的，表如下：

神像的

有利

無害

有害

未決

第一表	七七	二八	三〇·六	一八	—
第二表	九八·七	二六·三	三九	三〇	六
第三表	一百	八二	—	七	十

右表第一表是進步縣分，第二是落後的，但已開始拋棄他們的聖像，如第一表。他們大部分覺得宗教有害，不過還不能斷然捨了它。第三表多屬比較富的，不肯加入集體農場，只得靠神像保護。在列寧格勒還有一縣，有廿七個集體農場，包含九一二家戶口。其中有百分之九七·四有聖像，百分之三·一，是無神論。這些農場保留五二聖人節及教會節，只是兩處地方葬禮中不用牧師的。這些教會節，很妨害農業科學化，政府爲的不能突然強迫農民也只有任他們，禮拜天在鄉村的是休息日，而城市已改六日制了。

反宗教宣傳現在漸漸的在剷除農民的宗教信仰。農場中使用機器，惹起農民的好奇心，於是他們也來作科學實驗。莫斯科省有二十個農民，走十八英里路，去一個鄉鎮講座那兒，問一位共產主義講師：人與宗教怎樣到世上來的？在另一個地方，幾百工人在聽完一堂生物學講演之後，列隊去看顯微鏡，直到半夜兩點鐘才看完。反宗教宣傳家們很巧妙地應用科學知識來推翻神學。天真的農民若要上帝就不能要科學，若要教會與宗教，就不能要集體農場和社會主義。這種說法不但是無神論者講，連牧師們也如此說。

借宗教口實來反對集體農場的，多半是富農。那些人反對合作，因爲那是他個人的損失，其餘則是最落後的農民。從前曾受地主壓迫，剝削作了農奴的，這些人以為加入集體農場，無異又回到農奴制中去。同

時教士牧師也散布謠言，反對集體農場，用欺騙和虛偽的辦法來愚弄村民，在中伏爾加流域各縣，出來了什麼『由基督來的信』，叫信徒不要參加那非神的集體農場。在這幾縣共有二千和尚及尼姑，却沒有一個學校。蘇維埃政府解散了修道院和尼庵，使和尚女尼都流入鄰境去，繼續鼓動。因為集體農場中有反宗教宣傳，且破壞一切舊習俗。它是一架機器，毫不顧惜地在一切舊迷信及舊習慣之上蹂躪。集體農場頗影響農民的心理。機器的活動能除去個人對於宗教力量之恐怖，這不一定說農民馬上就把舊信仰丟得乾淨，但他却以為集體農場與機器足以抵制得過。在中亞細亞一個集體農場裏，有位訪問者問一位烏別克農民：『你相信夏坦（Shaitan）（惡鬼）還存在麼？』

『呵，是他還存在的，他可以抓住我，但不能在集體農場裏抓住。』

『爲什麼不能在集場裏？』

『因爲在那兒我們有許多人。如若我有了知識，當了工程師，他就不能抓我了。』

在工場中也有與此差不多相同的情形。許多工人是剛出土的天真農民，而對着偉大的機械文明，很多人感覺着它那強有力的挑戰及其創造的偉力。他們熱烈地參加進去，在工作中感覺着自己的力量。『我們建立一切，世間沒有上帝，』這是他們所說的。於是他們脫離了宗教。

人民脫離舊的宗教，不一定就表示他們老是无神論者。常常有人脫離了舊教，又歸入另一種教派去。有些神秘派的農民認爲共產黨秉政是反基督當權的顯徵，他們於是離家別土往各地浪遊，這是彼得第

「最初使俄國近代化時農民中所起的反應之重演，往往是被和尚牧師鼓起來的。這些人被逐出教區，無家可歸，只是浪遊着，爲人作洗禮，作禮拜儀式等事體。他們混在市廛中，夤緣得入人家庭，使農民及小手工業者聽他們蠱惑。另有些牧師及分派徒則入集場去作記賬先生，店員，有時能成會員。他們既有組織能力及機巧，很快就擠上了領袖地位。有時蘇維埃及農場因缺少人才，那時公然的牧師等也引用他們。」

反宗教宣傳的新策略

以上一切事實，使無神論領袖們不得不來改變他們的活動，採取新的工作綱領，以便更有效地抵擋捲土重來的宗教力量。大家覺得依工業化的進展，希望宗教自行死去乃是不妥當的辦法。它不了解舊宗教的組織力量及意識，在極其困難的情形之下，它都能表示很大的活動力。宗教是不可以聽其自便的。有些焦急的分子，就主用壓迫手段來對付那仇視國家的教會分子，但壓迫只引起更大的瘋狂離家主義。於是政府及黨就堅決禁止這類辦法。

唯一有效的，只是極活動的反宗教宣傳。目前無神論領袖及新活動的綱領所採取的是這種立場。農村宗教工人的全聯大會很明白地把這立場定出來：

「在社會主義大勝利之前，在某一定期間中，萬萬千千勞苦工人已經脫離了宗教，拋棄了宗教習俗，在宗教節日作工，封閉教堂及聚宗教會的場所，農民們自動地來組織無上帝的集體農場。這一切情形，要

求在農村中加深反宗教宣傳。而同時有些機關及有些作反宗教工作者，採取了一種最有害的觀點，以為宗教已到自己的末日，所以不需要反宗教宣傳了。」

這些機關就是那些在與宗教鬥爭上採取中立態度的學校，決議又推論如下：「一定要在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根基上，在科學知識的根本上，使勞動者與宗教之分離深刻化。工人大眾中的辯證法唯物論之發展，乃是一條長遠的路程，它不會自己來到，必需要廣大的在政治上作反宗教的教育工作。」

論到戰鬥的無神論者組合時，決議上說：「鄉村中的反教工作，全不能適應這一階段上的需要。該組合並不注意於組織游離了宗教的羣衆，在它的羣衆活動上也不能應個別的農民及集體農場會員的需要。」

關於改良鄉村工作的提議，首要將反宗教羣衆活動提高到科學調查研究方面，使它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蘇聯工人所遇見的問題能起適應作用。目前的反宗教宣傳必需以社會主義建設，科學與技術的建設為起點，使人民了解自然與社會。

要達到這目的，決議令組合的中央會議為任何反宗教形式預備教訓及方法，如教科書，演講，及展覽會。書中的主題必須引人興趣。注重如下一些問題：「取消都市及鄉村間文化問題上的相反標準，」「取消勞心勞力間的差別，」「魚場工作與宗教鬥爭，」「農業工程與技術的最近進化，」「集體農場之經濟與組織的改良，」「收穫增進與宗教鬥爭，」「國際教育及種族合作」等。這些問題都是極其重要的，

五年計劃的成功就靠在這們上面。這一計劃的成功，就是蘇聯無階級社會的成功，及共產主義的建立。

現在的反宗教運動中十分缺少人才。組合的領袖們抱怨黨和政府，把最好的工作者及脫教者吸收了去，而打發無用的來幹反宗教工作。其實沒有別項工作比反教宣傳更要緊。

勇敢的反教宣傳，的確是把農民從幾千年的惰性中喚起來，他們眼睜睜看見昔日的神與教堂被誰為欺騙，受攻擊，眼見自然的力量為人力所解放，眼見機器驅使大自然去工作，他們常然要奇怪的問，如若真有上帝，他怎能容人侮辱他的名和他的聖堂呢？為什麼他不打死無神論宣傳者？上帝滿不在乎麼？睡着了麼？或者他不過是幻象呢？農民再看聖像，看看他目睹的神，於是他記起他祖先們的長滿了大鬚子的面孔，立刻他就會省悟到原來這神是人造的，他的像乃是人的像呵。世上沒有上帝，只有人，他就變成別士波什尼克了。

教會以為把上帝取消後，一切道德制裁必會消滅，事實恰得其反，情形是更好了起來。革命是在農民身上發生，打破了他的財產本能，和他的生活基礎。他永不能再回到舊的去了。舊的已亡，但新的將來却也不能把握得定，現在還不能作結論。

蘇聯的宗教與無神論之研究

第十二章 反宗教宣傳的組織與方法

無神論者社會的活動綱領與方法，很快地發展為一個複雜的系統，正如西方的近代教會所有的一樣。它有戰鬥的無神論者組合的中央會議為監督，中心地點在莫斯科，另有地方組織分佈於全國各地。此外有國內國外的宣傳部，與中央會議發生關係，在蘇聯境內的弱小民族中進行積極活動，且幫助全世界無產者進行反教工作。

其重要部分為羣衆宣傳運動，教育，出版，海陸軍，工業，農村，青年與兒童，宗教及工作方法的科學研究，宣傳員的訓練，博物院與圖書館，應用美術於反教宣傳，特別是演戲，電影，及無線電。

在革命與教會鬥爭的最初階段，特別採用羣衆鼓動方法，最常用的是演講及辯論，其次有反宗教表演，露天集會，羣衆宣傳的直接目標，是暴露教會的反革命活動，以及宗教之反科學的性質。

着色的壁畫應用很廣。它的目的在將教會的迷信及牧師的醜惡暴露出來，加以取笑。反對飲酒宣傳，通常總是與反對教會節日的宣傳並行，如聖誕節日及復活節日，照例總是狂飲多吃的日子。像「保護你的孩子抵擋宗教與酒精」這類的廣告畫是很常見的。畫中的牧師常是醉鬼，一手舉着十字架，一手抱着伏得加(Vodka)酒瓶。本來那班牧師照例都是酗酒的。教會總不反對賣酒生意，有些俗人及牧師提倡的

節制運動還遭它反對，創始節制運動的被他們革出教籍。

五年計劃的應用，及農業集體化，使反宗教宣傳得了新的推動力。現在的廣告畫及標語，就都是用來使人民了解教會是反對蘇維埃工業化，反對集體化計劃的。這類羣衆宣傳所常用的方法，是將詩句印在包糖紙，香烟盒。諸如此類的上面。有一種流行的糖包紙上印了如左的詩句：

牧師是我們的生死仇人！

用兩隻眼牢牢瞪住他要緊。

讓我們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來答覆教皇的誣蔑謗陷。

用文化趕跑宗教和酒精。

無線電也用來散佈關於『宗教與五年計劃』這類講演。克雷留克(N. Krainik)的兩個講演都譯爲英文，以便在國內參加五年計劃偉大建設的說英語人等也能閱讀；內容都講到宗教是社會主義的阻礙，與之不能相容。社會主義實現時，它就要完全消滅。

工廠俱樂部也舉行演講會，以引起工人對反宗教問題的興趣。莫斯科汽車工廠公佈一季中的講題如下：

1. 斯賓諾莎的反宗教及教會鬥爭。

2. 工人之重受社會教育及反教鬥爭。
 3. 科學貫穿了原子。
 4. 作為戰鬥的無神論之馬克斯列寧主義。
 5. 關於宇宙起源的近代理論。
 6. 地上生命的起源。
 7. 關於達爾文主義及生物學的近代鬥爭。
 8. 人類起源的工作及任務。
 9. 腦經及意識。
 10. 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宗教起源說。
 11. 布爾喬亞科學危機中之辯證法唯物論的鬥爭。
 12. 宗教及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末日。
- 以上都是以近代科學來批評宗教的，如宗教節日的羣衆宣傳，也持同樣的批評態度，茲舉例如下：
- 無神論聖誕節文告：
- 「對教會的鬥爭，就是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 「在十二月二十五號那天，基督教會慶祝他們的上帝的生日，教主耶穌基督的生日。」

「這一個節日，所謂的聖誕節，是野蠻人的，奴隸的，偽善者們的節日。牧師告訴我們說，這一節日最初是基督徒開始慶祝的。其實在基督教還沒出世之前許久，已經有許多人在這時節慶祝上帝救主的生日。一切的上帝之流如俄細利斯（Oris），塔麥斯（Thammas），阿冬尼斯（Adonis），米什拉斯（Mithras），都是古代農業人民頭腦中想像出來的東西。

「算命，用假面，聖誕樹，聖誕鐘，這一切都是野蠻期留下來的遺跡。彼時人們在週圍大自然中裝置精靈，彼時『野蠻人對於自然力非常無能，由此生出對於神，鬼，魔等的信仰。』（列寧語）於是野蠻人，自然之不可救藥的奴隸，屈伏於他所自造的神前，當他們被自然威力所壓倒時，就求它的恩典和幫助。

「技術的發展，使自然壓伏人的力量減削。但因為一種新的桎梏加於人身上，人榨取人的桎梏，使對上帝的信仰不但不能減，反有所增。

「被壓迫者與壓迫者鬥爭之無援無助的狀態，免不了使他們期望死後能得到更好的生活。正如野蠻人之畏懼自然力一樣。列寧這麼說。

「從來就不曾有過耶穌基督這人。這點甚至資產階級學者也得承認，雖然他們是最怕工人羣衆的無神論的。

「羅馬帝國之非人的榨取，使羅馬奴隸及貧民腦中產出了基督救主的觀念，以及死的生活。那都是階級壓迫的結果。

「基督教所謂的地獄和樂園，都有古奴隸社會的痕跡。

監獄是『絕對的黑暗』，即通常位在城外的奴隸監獄。樂園是『永遠的恩福』，『永遠的無事幹，是沉陷慘苦的奴隸們的主要希望，借以脫離可呪詛的勞苦。

「所以基督教從起初就是奴隸的宗教，屈服與忍耐；於此聖誕節，烏有的耶穌基督的誕日開始。

「聖誕節不但是野蠻人與奴隸的宗教，且是偽善的。當資本主義國家中，百萬勞苦工人失業，飢餓，流落在聖誕節日的嚴寒中，千千萬萬人因失望而自殺，當殖民地農民賣兒賣女以度旦夕，聖誕節的歸榮於上帝全是虛偽的。

「牧師叫着『平安歸於地上』，在基督降生時開始，『榮耀歸於至高的上帝，平安歸於地上：』而資本主義國家軍事工業正在日夜進行，爲着歸榮於上帝，而製造槍砲毒氣等等以剿滅人類。

「比這種宣傳和平及好意更大的嘲驅，是不會再想像得到的了。在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和平及好意，只有死亡和剿滅在喧突着，外面却用張狂的神聖禮拜，偽善的說教，可愛的歌詞，聖誕樹，馬槽，天使，聖尼古拉，以及此類的迷信來粉飾得漂亮。

「蘇維埃學校的主要工作是要教育出一代強壯，健康，新的人類來，要有鋼一般的神經，鐵一樣的筋肉，適合於建立共產主義之用的，這樣的人，却老是被穿道袍的階級敵人及十字架所反對。」

無神論者羣衆活動的結果頗不一致。凡在系統的反宗教宣傳進行之處，宗教節日工人不來參加的

日見其多，社會主義設建的社會競爭及突擊隊也大有進步。研究辯證法唯物論的興趣也有增加，參加各種地方無神論組織的社會活動也不少。

最軟弱的一環是婦女，參加組合的婦女只有百分之三十。

常用反教宣傳方法之一，還有反教競賽，及恢復集會。這些通常是在宗教恢復節，如禁食節，如大的節慶日，像聖誕節時舉行。一季一季的可以看出地方反教組織在使人民不參加宗教節日這一工作上成功與失敗的現象。在禮拜時他們就準備演講及音樂會，有時候很能吸收羣衆，使他們不上教堂去。這些工作的缺點是除了這類節日活動之外，這些反教組織往往沒有年中經常工作。中央會議要征服這些缺點，常給他們預備每禮拜的文告及活動綱領，又預備三個經常巡視宣傳員，三個巡視組織員。他們帶着無神論的文件到各縣區去巡行指導，並常帶着反教展覽品及電影，這是能吸引羣衆的。

特殊教育活動

因為缺少宣傳及組織人員，反宗教的領袖們就創辦了一種反教教育，在這裏，專門的及尋常的宣傳員可以受訓練。反教運動的創始者有好些是受過神學教育的，普通宣傳員中，有許多已往是牧師與和尚。這些人只能爲用於一時，終需換用工人，並那些在各方面都忠於黨和革命的人們。

十年前，十二次黨大會關於訓練反教人才作了一個決議，「在共產主義教育整個系統之中設立特

殊課程教授宗教的起源，發展，宗教史，宗教派別，宗教組織，同時還要研究人類社會，被壓迫者與壓迫者的階級鬥爭，暴露了資本與宗教宣傳的實際關係，並把這些和上述宗教課程連接起來。『這一決議，在反教教育的發展上有非常大的貢獻，並且指出了如何進行的方針。

最初研究宗教的研究班是一九二一年由雅羅洛夫斯基（E. Yaroslavsky），俄國反宗教運動之一位出色的領袖，所組織的。一九二五年共有三十六門反教課程，及六個研究班在各高級學校開辦；一九二七年發行了第一期的反宗教（Antireligioznik），是一種月刊，其作用正如傳道雜誌及神學雜誌對於牧師們的作用一樣。其中有批評的文章，講演大綱，以及關於宗教哲學的書評。這一雜誌，使反教宣傳能有統一的組織使組織上能得有利的指導。在反宗教中有各種課程及綱領的大綱，由教育部所派的專門委員會將其詳細寫出來，這委員又預備三種教科書：一種為工人，一種為農民，另一種為紅軍。同時也有函授課，授以『學作一位無神論者』，這工作很有發展。有了這類文獻之後，反教學生增加得非常之快，研究班，宣傳團，宣傳學校，夜校都激增起來。一九二七年又開始預備蘇聯境內弱小民族的反宗教綱領。

一九二八年黨中央委員會決議在共產黨學院及赤色教授學院設立宗教研究講座，訓練宗教專家。在博物院作受理人，在反教宣傳員訓練學校作文字工作者及教員。同樣的講座在列寧格勒，卡爾柯夫（Klaskov）以及別的較大的大學中都有。因此興起了初等中等高等的宗教教育，不光是研究基督教，也有其他東方各教，如猶太教，回教，佛教以及原始沙門拜火等教。正教人是至多被認為是政治上最危險的。

分子。但所反對的却是一切形式的宗教，共產黨綱領是要剷除一切宗教的。

一九二九年向着宗教大進攻時，蘇聯採用許多系統的反教訓練的方法。所謂的無線電大學，也舉辦起來，經常有二萬聽衆。此外又有三十五個所謂『禮拜日大學』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那一季，在各大學的大禮堂中演講。聽講人數沒得記載。在莫斯科，演講期將盡時還有五百聽衆，那表明全國聽衆的數目必是很多的。

『反教大學』的額定學年是兩年，其目的在訓練地方組織員作反宗教活動，訓練宣傳員，演講員，遠足會領袖，鄉村及集體農場中的俱樂部工作員，以及兒童與青年組織的領袖。

高級研究院則按照四條主要路徑作盧加日夫斯基 (A. I. Lukachewsky) 是研究工作的指導者，他製定四條路線如下：

1. 抓緊戰鬥的無神論之列寧主義的階段，與關於宗教問題之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曲解；無情的批評考茨基，枯諾 (Kunow) 及別個社會法西斯蒂的工作；開始對於蒲立罕諾夫之宗教論的批評；完全暴露機械的唯物論者與孟塞維克唯心派的錯誤；無情的暴露托洛基關於反宗教宣傳問題的理論。

2. 研究宗教之死滅的過程。何種事實能幫助將宗教放棄，何種能阻礙它？集體農場中的宗教與無神論，新舊工人中之無神論與宗教。

3. 研究反宗教宣傳之科學方法的發展。如何在各種宗教信徒中推進工作，工作的內容，方法與形式。

4. 研究國外諸國的宗教。研究國外凡關於宗教哲學歷史等等的一切問題。

這一大綱指出共產黨領袖們已經注意到研究宗教對於社會的影響，同時用實驗工作及在各弱小民族與農村工業集團間的遠足旅行與調查來加以糾正。一九三一年共有十九個此類的遠足隊，有五十人參加，調查了三十四縣，十九氏族。這種自然要改變以前對宗教問題之庸俗而淺薄的態度，為過去反宗教宣傳所常犯的，其主要的原因由於忽視人民生活中宗教所佔之較精微的方面。

反宗教文獻

十月革命以前，反宗教的甚至於批評宗教的文獻俄國就沒有過。一九〇五年革命後，書籍檢查曾經寬鬆了一下，羅伯霖 (Robertson) 的自由思想史，列基 (Lecky) 的理性主義史 (History of Rationalism)，芮南 (Renan) 的耶穌傳，布拉得刺夫 (Bradlaugh) 的科學與宗教都被允許翻譯過來，許其出版，還有一些西方各國自由思想運動中的其他名著也譯過來。所以革命之後，共產主義的作家們免不了碰着一件全新的沒人動過的問題。寫的東西往往不好其所攻擊的神學理論，多半是有些神學家已經放棄的，所根據的學說也都不是能經得住歷史的試驗的，如法國唯物論者的反宗教說。只有所選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的宗教觀的文章，主張在社會經濟的階級關係中尋找宗教的根源，才有真的價值。此外還有幾位也還好。

量的方面，俄國所出關於宗教問題的書籍，比任何國家都多。過去十年中發行了一千二百種反宗教問題的書及小冊子，此外還有許多短文，共發行總冊頁數是四千萬，那麼每種應有三三五〇〇〇冊。別士波什尼克週刊據最近的記載，共發行四七三〇〇份（每期的），而別士波什尼克帶圖報有二〇〇〇〇份，蘇聯書報之所以發行得這樣多，因為都由地方反教組織代為分布的，並不一定它們都經人讀過。在目前似乎蘇聯讀者既不注意於宗教，亦不注意於反宗教問題。領袖們常用各種方法去引起讀者對於讀反宗教書報的注意。

反宗教博物院

無神論領袖們很認識博物院是通俗教育機關。過去五年中在蘇聯開了一百以上此類的機關，此外還有所謂旅行展覽會。

俄國最大的博物院在列寧格勒，地址為昔日的聖以撒大寺院（St. Isaac Monastery）及卡善大寺院（Kazan Monastery）。幾年前，這兩個大建築還是用於作福禮拜，敬神，但是日就窮困的諸教會團體，已不能供給那筆很大的維持費，所以只得將它洩氣，使之歸於博物院部管理，此後被拿來作反宗教之用。

在莫斯科也有幾個博物院專為反宗教宣傳之用，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央反宗教博物院，地址為昔日的司持拉斯挪埃尼菴教堂（Strastnoi Convent Church），位於城之正中央。它是一九二九年

十一月開辦的。頭一年的遊覽者有三四七一人，自此以後，是該城最出風頭的博物院之一。

別的蜚聲全國的博物院，爲昔日有名的特羅錯塞基也夫修道院（Troitzko-Sergievo Monastery）在莫斯科北約六十英里，還有基浮培却拉修道院（Kievo-Petelhora Monastery）位於尼泊河岸（Dnioper）上，緊靠基夫城。這兩個古老的修道院，是從前俄國最富有最受尊崇的所在，是俄國正教的麥加與麥定那，每年有千萬朝山巡禮者去上香。

培却那修道院是俄國基督教的搖籃，塞基也夫是北方的壇坫，由於聖塞鳩士之聖潔與愛國生活而得名的。既富且強了之後，它的內容就腐敗下來。後來經革命暴露了它的欺騙罪惡，政府爲防止劫掠，便把它接過手來。現在它們都成了博物院，陳設着以前教會的輝煌財富。塞基也夫之動人處在於聖塞鳩士的屍體。以前欺騙的說是『不朽的』，但是蘇維埃政府當着牧師們開出那聖棺來，屍體原是一樣的朽腐。這朽屍就這樣地陳在那兒，象徵着教會之永存不朽。

基浮培却拉修道院的吸引遊者，在於它的地下瑩窟。在那兒俄國正教的神父們居住過，死了就埋在那兒。有些作成了木乃伊，因之才起了所謂不朽之屍的欺騙。這兒有許多珠寶珍物，如珠衫，王冕，杯子，舊油畫，壁畫，舊寫本等。來巡禮者很少，大都是來遊覽參觀教會之腐敗與欺騙的。

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新加設備的博物院中，科學與宗教展覽並行。宇宙的進化觀念及種族起源陳列着，與聖經中的宇宙論對照。在聖以撒大寺院穹籠中，掛着一個大的福可（Fico）鐘擺，稱爲是世界最

大的，用以證明地球是繞着中軸在自轉。在莫斯科中央博物院收集了各級顛骨的模範，以及其他人猿遺體，來證出人類的猿的起源。最注重的還是在階級社會中宗教之階級作用。它指示出教會與沙皇之密切聯繫，及其反革命的工作。當然，宗教裁判之恐怖，伽利略及布魯諾等的犧牲，都用雕像及嵌工極生動的表現出來。關於教會及沙皇勾結的情形，都用原來材料及檔案來證明。

展覽物品常因反教宣傳的需要而變化。目前莫斯科中央博物院正在準備新的物品，來證明宗教之反對工業化。

展覽設計有專門學者及藝術家專司其事。有專門的工場製作展覽品，且預備旅行博物院的展覽品。這些博物院頗收集了許多有價值的繪畫及雕刻，以作宣傳的左證。

無神論運動者近又努力在人類及人種學博物院發展特殊反教工作，以指證宗教的階級性質，也有自然科學院的特殊工作，以指出宗教與科學之不相容處。也有天文的展覽品，同時有演講以證聖經中宇宙說的謬妄。

所有諸宣傳方法中，博物院是最令人相信的。它們可以將反宗教的內容生動起來，且以小心選擇的，對症發藥的材料及原來的事實作證據。

在一般見地高明的宗教分子看來，這種博物院實在不算反教的，因為其中所指證的事實，大都久已為高明智益的宗教家所承認了。只在那些頑固的基要主義者（Fundamentalist）以及那些死不肯承認

宗教之社會的起源和解釋的人，才會感受打擊。但是在蘇聯所處的情形之下，那邊宗教尙未有近代主義運動，宗教還躲在曖昧的神學及正統教中，所以正統教的代替者是無神論。

反宗教博物院在各大城市及鄉村都在舉辦，利用大寺院及教堂來作院址，工作進行上所缺乏的就是人才。現在各高級學校正在訓練專家，以補此缺。

反宗教宣傳之武器——美術

反宗教宣傳往往偏於理智方面，而忽略情感，遂免不了偏於枯燥及呆板，宣傳家們近在努力於運用美術於宣傳中。首先所用的都是電影及戲劇，成效頗著，但真有藝術價值的很少。劇中的宗教分子不是混蛋，就是白痴，以證宗教是反社會的。

電影的成功更大，有許多是很有藝術價值的。但它們大都是反對牧師，而不及於宗教的社會根本。在中亞細亞喬治亞及阿塞巴揚 (Azerbaijan) 的影片，多映演回教族中的禁庭制，賤視女人的習俗，及其罪惡。在遠東則又映演土人中宗教習俗之野蠻的迷信。

科學電影如腦的機構，人與人猿，也常映出來。

反宗教宣傳最大的困難是音樂，至今還不能產生出很大的結果，來捉住反宗教情緒的霧圍和想像。總而言之，宗教在蘇聯可說是遭了極大的全線上的進攻，究竟它能否抵擋這場實驗，是很大的問題。

呢！

第十三章 前途的瞻望

戰鬥的無神論運動的戰略家已經計算過，在未來的十年內，有組織的宗教之在蘇聯，其權力將全部被擊破，其所賴以吸取營養之根柢，也將同時趨於萎縮。而且，戰鬥的無神論運動的本身，也許因為已完成了它的使命，也有趨於萎縮的必要。這是若干觀察者的意見。

據我們的估量，問題可沒有這樣簡單。第一，有組織的宗教之消滅，決不會像反宗教的戰略家所想像的那樣快。即使戰鬥的無神論運動能把所有教堂全都封閉，但仍有少數的忠實分子會在暗中組織宗教團體，招集少數熱心的新信徒，給宗教以一種新的誘動力。此外還有許多的宗派，其存在並不像正教會那樣，須憑着設備完美的建築物。而且，據最近的觀察，宗派主義之在蘇聯，仍然有增無減。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怎樣清理現有的宗教團體。政府中比較有頭腦的人，也知道光是使宗教儀式的舉行感覺困難或不可能，那是不能把宗教根本剷除的。他們已知道，要根本剷除宗教，唯一的辦法便是把產生和培養宗教的條件根本消滅。

試問這一些條件是什麼呢？據共產主義者的意見，這些條件大概是屬於社會和經濟方面，而是產生於階級社會之無政府狀態，它的榨取，它的不穩定，恐懼，危機，以及個人主義超乎社會的團結；此外還有近

代社會所常被侵壓的災禍，如戰爭，天災，疫癘，水患，地震，遭兇，橫死，愛與友誼的失望，最後，還有關於宇宙之神祕問題，及生命何從而來，歸回何處等等問題，產生了宗教所由生存的條件。多數有思想的，感覺靈敏的，而又比較孤獨的人，仍時常在神秘的境界尋求精神上的安慰，並欲設法解決人生的奧秘。上述許多促成宗教發展的理由，在無階級的社會中當然是要消滅，或者大見減少，但不能根本剷除，因此，宗教的一些舊根柢便會存在，因而產生出一些新宗教。

論到宗教與無神論之將來，這仍是一個有神論的問題；宇宙間若有上帝，人自然會去找他，敬他。若沒有，他只是人類的最大幻象，至終必為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所顛覆，因這社會乃是建立在沒有上帝這一假定之上的。事實上，許多年以前以及現在，都已有有人把找上帝的工程拋在一邊，而要從美育與社會方面，為宗教重定價值，認它為對於宇宙與人類社會之一種虔敬的和仁愛的態度，這種態度，無論是主張有神或無神的，都應當盡力加以保持的。

一世紀以前，偉大的人本主義者富樓巴黑（Ludwig Feuerbach）與孔德（August Comte）曾竭盡其力，要想創立一種無神的宗教。但這種人本主義者的運動，經過了一世紀的存在以後，並不能引起人們多大的信從，而且也不會激動這運動去解放這一般被利用的勞苦者。又如新近成立的「倫理文化社會」以及其他相同的運動，其目的都在於保存崇拜中之倫理的與美的價值，却不承認有神的存在。雖然用理智之力去尋求上帝是要使人失望的，但是有思想的人仍在這樣的努力，他們的方法雖有變改，但其目的

則一。

人類如果沒有一種指示其行程的人生哲學，或一些宗教所能給予的感情上的激刺，那麼，他們似乎是不能生存的。宗教的感情方面的原素，在各種原素中常是比較的顯著，且是比較的受人的歡迎的。在過去，宗教很明顯的是一種麻醉品，是一種催眠劑，並且爲了這緣故，在今日仍然受許多人的歡迎，——雖然在知識上，他們相信歷史的宗教信條的玄學及倫理，已失去了它們的社會意義和理智意義。宗教中所含有的美，以及它的神秘的，優美的藝術，使宗教仍有極大的吸引力，即使對於無神論者也有這樣的影響。著者所以能明白這一點，那是得力於多年觀察莫斯科的音樂生活的緣故。現在有許多神秘的偉大音樂，仍受了共產黨聽衆的極端歡迎，在今日還沒有別的東西能奪它們的地位，因爲現代的作曲家還不能創造出無神的音樂作品來。

無神主義者的意識，不免太理智化了。它是生存於沒有感情的領域中，是不適於人性的。查反宗教宣傳的力量，乃在於它的倫理方面的勸導，而不在於它對於宗教的玄學及教條之批評。一般已脫離宗教關係的民衆，現在是被社會主義者建設的程序所激動；他們已信仰『五年計劃』這個宗教了，因爲這宗教能給他們以更光明的更快樂的將來，而且它的實現是人人所能共同努力的。此外還有一種國際共產主義的要求，能激動人們作偉大的鬥爭與犧牲，所以在多數共產主義者的心理中，這種主義的要求很能代替宗教。但是，人們不全是共產主義的熱情者與鬥爭者，大多數人對它仍會漠然視之，而且需要其他的靈

感與教育，否則他們就會養成一種反社會的習慣，而將爲害於社會了。還有，社會之中常不免有人，在人生鬥爭中處於失敗，喪志，或疲憊的地位，他們所需要的是安慰，而不是主義。試問他們應當向什麼對象或什麼人，去尋求精神上的安慰呢？

共產主義的制度，到現在還不會發展什麼足以代替「牧師的眷顧」及「基督教會之組織」。其實這一類宗教組織，無疑的是各式社會中人所需要的。因此，人們就需要這樣的組織，去代替以前教會的工作，使民衆有了感情上的流動，能得各種的靈感，倫理的教訓，及個人的眷顧。試問在蘇維埃的社會中，誰應當擔負起這些責任呢？直到現在，此中一部分的責任是由各種非宗教團體所分負，並沒有什麼單純的團體專門辦理這些職務。

蘇維埃的劇場與藝術團體，已大半在擔任給民衆以倫理訓練之責任。無論是戲劇，電影，無線電，藝術展覽會，音樂會，馬戲，隨帶餘興的酒店，除了它們的美術價值之外，還有一種鮮明的道德及教育意義，向人類最有價值的智力與感情挑戰。共產主義的領袖，對於蘇聯藝術的高尚旨趣中的許多可能性，是完全感覺到的。第二次五年計劃不但打算建築更大的藝術學院房舍，以訓練新的藝術家，它並且要用羣衆舞蹈及歌唱來推行社會交際，使廣大羣衆能積極參加，因這能改良戲劇場中觀衆的被動性。特別在一文化與休息公園，「在愛美劇社，音樂會，俱樂部，以及其他類似的地方，都是這樣的。因此教會以前供給羣衆之美的感情的需要，現在因此得了滿足。在劇院中及音樂會中，並沒有很明顯的無神論的宣傳。反之，過去的藝

術之精神的遺產倒是盡量被採用，且以世俗的方式把它們表現出來，表面上雖與原物全不一樣，實際則能應付羣衆之倫理的與美的需要。地方蘇維埃機關所屬的紅十字會，保嬰會，救母會，及別的機關，現在已代替了以前教會牧師的職務了。

戰鬥的無神論運動後來也許會消滅，但也許更能變成一種以共產主義理論授之羣衆的通俗機關，而特別注重於其倫理方面。這種機關是很需要的。以前的反宗教宣傳者，現在不知不覺地當了教員及倫理教師了。最活動的熱心分子都去當學生，學習宗教的歷史及心理，又深明共產主義的原則。這種青年，在別國也許已作了神學的研究者，而在蘇聯則作了共產主義的理論家。在目前，他們的工作止於批判宗教，但生活的需要會一天一天的要求他們對於行動與生活之積極理論作正面的陳述。他們於是變成了一種專門授人以共產社會中的生活道德的人。

戰鬥的無神論者聯合會頗具一種野心，要建立起自己的組織來。他們以教堂作爲宣傳的機關，並且建築新舍，以求適宜於他們的工作。生活上的需要，逐漸逐漸地造成了一些組織，去擔任以前的教會所會擔任的職務。但此中最大的弱點，就在於缺乏一種通一的，美化的，象徵的崇拜性，——即能激發民衆的想像力，並具有靈感性，而能給以所需要的感情上的彼此關切的。有現在的俄國，所謂『紅角』(Red Corner)者，其中放着列寧及其有名的領袖的半身像，掛着絲絨的紅色旗，及金繡花紋。共產黨有紅色葬儀，紅色洗禮，紅色婚禮，以及其他。這些不過是一種尊隆的儀節，而與宗教的含有超自然的拜神性者全然不同。

這樣一步一步地，新的生活便能創造它自己的社會方式與文化方式，去替代那些被遺棄的教派與遺傳。因此，我們找不出什麼理由，可以證明舊宗教以前的組織爲什麼不能放棄，而代以一種新組織，——那就是把過去模糊的教派及意識，在形式與內容上綜合起來，使能比以前更進步些。否則在數百年以後，當人類分析無階級社會之上層建築時，必會指出它們不過是昔日所謂宗教的這東西之殘存的外形而已。

自從革命爆發以後，那以前把俄國人的社會生活同他們的宗教組織及意識聯起來的種種束縛，曾被人們視爲含有永久價值及權威的，但現在却沒有一件不受到挑戰了。坦白地說，我們對於以前成立的俄國教會，實在看不出它有什麼將來，不過它的壽命比共產主義者所容許的，或許要延長一些。但無論如何，教會的勢力既這樣地被挫弱，它以前的領袖資格既這樣地喪失，因此它在現代的蘇維埃生活中，就不再是一個危險的競爭者了。

在俄國還有若干佈道派的教徒，當他們的運動仍在活動時，他們便向民衆的知識挑戰，不過他們的對象乃是民衆之無知識與成見。但新興的蘇維埃青年，因爲平日受慣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訓練，故對於這般屬於基要派的，不敢改變其舊神學的佈道者，自會予以猛烈的反攻。

俄國的宗教的將來，乃是一個社會的心理的問題。原來有組織的宗教乃是一種社會的方式，而人類的靈性經驗就是在此中形成的。現在舊的模型已破裂，這個事實在本書的研究裏業已表顯。但目前的問

題是：新興的青年們會不會表現一種不同心理——就是缺乏造成靈性宗教的那些精神原素。這些精神原素，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是太平常的，而且是如同藝術的與創造的特性那樣稀少。如果宗教在俄國祇是一種教義，那麼在俄國就無所謂宗教了。如果宗教在它的主觀方面是屬於人類內在的靈性原素，那麼我們就要問，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怎麼能阻止它的人民擁有這些靈性原素呢？

優生學還不會發明一種方法，使我們能用以選擇含有靈性原素的人。我們也不知道這些原素究竟是否含有遺傳性。其實凡屬於宗教性的天才，其為一種生物學上的變形，正與其他任何天才相同。現在的問題，不是怎樣選擇含有靈性原素的人，而是怎樣為這些靈性原素準備正當的營養及適宜的環境，使它們能盡量地去發展，而不受到什麼限制。我們相信，在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中，人類的靈性原素比較在階級重疊的物質文明的社會中，自能更有關於選擇、發展及營養的機會與環境。

這些條件，也許會開闢一個所謂「社會之個人方面」的時代。這時代會告訴我們，人性中有什麼未加估量的潛力，而且因為新的原素的發見，我們就得用新的方法，去重估過去靈性文化中被遺忘的寶藏之價值。但是談到耶穌，他的歷史性既被否認，他的福音在現在這一代人的記憶中也很快地模糊起來，故我就以為，將來的俄國人也許會重新去發見耶穌。至於這重新被發見的耶穌究竟是被釘的人子，或詩人的耶穌，或花鳥與小孩的朋友，或即是所表現的道——這些問題，無人能加以答覆。至於十字架的神秘，以及無罪的受苦者等問題，也許永遠不能得到解決。那新的社會制度不能是一個無痛苦的、靜止的，或屬於

愚人的天堂；如果自然律繼續有效，那麼這個社會制度就有許多痛苦必須應付，人類自我意識的出現，在宇宙的陰影中乃是一種燦爛的光明。試問這裏邊會不會有一種『生命』？這個問題也許永遠是一個秘密——因此，便是信仰與默想的對象了。

青年的蘇維埃，在今日仍有未滿足的要求及興趣，因此他們便放棄現有的宗教教訓，以及反宗教的宣傳。他們需要能使其產主義的社會使命增益了情感與倫理價值之一種使命。這個使命，無論在內容與形式方面，都不會有什麼像那舊時的宗教組織。它當然會站在較高的知識平面上。在形式與感情上也會比較的更美化，而與現在粗魯的無神宣傳也會大不相同。我們相信未來的希望，不在於否認過去，而在於肯定新生——而無階級革命對於此點已有了準備。那未來的共產主義者的無階級社會，將成爲一個最適宜的環境，以便發展一種靈性的文化，這是以前的先知、聖者，或詩人等所從未夢想的。

